



现代外国政治

学术著作选译

让历史来审判续篇

吉林人民出版社

A 831.6/202



200014652

7523.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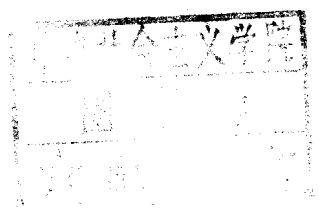
Rang Lishi Lai Shenpan Xupian

让历史来审判续篇

罗伊·麦德维杰夫 著

李援朝 黄元 译
郭建英 罗元

赵洵 校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为了研究和探讨现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种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和实践、各种共产主义流派学说以及其他政治学说，了解外国政治、社会和学术情况，我国部分出版社分别组织翻译一批有代表性的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供有关方面研究参考。本书是其中一种。

让历史来审判续篇

罗伊·麦德维杰夫 著

李援朝 黄元 译

郭建英 罗元 译

赵洵 校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7.5印张 2插页 166,000字

1983年10月第1版 198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4,800册

统一书号：3091·478 定价：0.96元

DG23/30

出 版 说 明

这本书是苏联国内持不同政见者罗伊·麦德维杰夫对其研究斯大林时代的著作《让历史来审判》一书的重要补充。作者从他占有的大量的资料出发，在书中进一步评述了斯大林执政年代所制定的方针政策，介绍了斯大林同“左”右倾反对派作斗争的一些内幕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探讨了斯大林搞阶级斗争扩大化等方面的原因以及斯大林主义与列宁主义的区别等理论问题。并对斯大林之后的二十五年国内外评价斯大林的情况作了概述。

本书作者能站在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立场上，来评价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对大量材料作了较客观的分析，并不认为斯大林犯了错误而托洛茨基就是正确的，并对那些借斯大林的错误来否定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行径进行了驳斥。因此该书对研究斯大林问题以及对苏联问题感兴趣的人来说，无疑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书中有关评价斯大林的一些观点，需要读者斟酌。

ROY · A · MEDVEDEV

ONSTALIN AND STALINISM

Translated by Ellen de Kadt

Oxford New York Toronto

Melbour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根据牛津大学出版社纽约1979年英文版译出）

英 译 本 序

自从罗伊·麦德维杰夫完成《让历史来审判》一书，第一次从苏联内部对斯大林时代进行了意义重要的研究以来，已经过去十多年了。《让历史来审判（续篇）》一书不仅是对这一研究的重要补充，而且其本身也构成一部完整独立的著作。麦德维杰夫确实假设读者对斯大林的个性和革命前的活动那段历史十分熟悉，因此，只进行了扼要的叙述。随后，读者就被带到1917年的动乱中去了。但是这样做是很适宜的，因为麦德维杰夫的目的是要突出某些问题，增添新的细节，对于他认为背离事实和错误判断之处进行更正。

《让历史来审判（续篇）》一书，在收集那些只能为苏联作者所利用的材料方面是得天独厚的。同时，生活在苏联的麦德维杰夫，也尽量利用了许多在西方发表的关于斯大林的文献资料。如果说，他经常对西方学者和苏联流亡者提出的看法持批评态度的话，那么，所不同寻常的是，他所利用的材料是如此广泛。在这个方面，他这本（除了一些短的节录^①以外）第一次发表的著作，是近年来出自苏联的比较令人瞩目的文件之一。

《让历史来审判》一书出版，并在苏联秘密流传之后，罗伊·麦德维杰夫就开始在莫斯科他的公寓里，接待了如潮水般的来访者，这些幸存者，专注于诉说他们自己的遭遇。这些

^① 见《斯大林政治传记新记录》，乔治·桑德斯翻译，载于罗伯特·C·塔克主编的《斯大林主义》（纽约，1977年）。

证据在本书中都作了详细的引证，其结果就是在色彩和真实性方面，都令人吃惊地对斯大林性格与行为作了评价。

一个寻求更有人性的社会主义的苏联作者，很自然地会在苏联的历史中，找寻代替斯大林的人物。任何一个从这个角度探讨问题的人，都一定对托洛茨基特别感兴趣，然而，直到最近，实际上是不可能掌握有关他的可靠的原始资料的。但是，由于在西方出版的翻印书刊正在流入莫斯科，所以，材料已经不成其为问题了。因此，当人们读本书的时候，可能会认为，这本书不妨取名为《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人们很容易想到：当麦德维杰夫第一次看到《反对派通讯》时，许多情节为之吸引。但是读者将会发现，书中并没有仅仅因为斯大林是明显地犯有错误的人，就认为托洛茨基是正确的那种态度。作者对托洛茨基的潜在能力和他的错误，都是冷静地加以审查的；对他后来对苏联历史所作的许多估计，也都是从经验的角度进行批评的。

人们对于在祖国历史上最困难的时期里，仍保持正直品格的人，总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在基本事实被弄虚作假的情况下，更是如此。麦德维杰夫提到了一些在苏联的著作中出现过的、令人费解的例子。

这本书是麦德维杰夫在过去十年间，对这些问题思考的概括。本书发表的年份，标志着一个特殊的日子，因为1977年12月是斯大林诞辰一百周年。因此，这部书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向诞辰日献礼，虽然麦德维杰夫预计，在苏联不会搞什么公开的庆祝活动。

在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若莱斯·麦德维杰夫^①曾惠我以

^① 他是本书作者的孪生兄弟。——中译注

有益的建议和帮助。要得到问题的解答，最好的方法，莫过于向作者本人或某个与他关系密切的人求教了。我还极其感谢伦纳德·夏皮罗和R·F·彼得，他们曾阅读了全文，并提出了不少宝贵的建议。艾琳·格雷戈里认真而又热情地为我打清了手稿，为此，我是由衷地感谢的。

艾伦·德·卡德

1979年4月 伦敦

序 言

1962年到1968年间，我写了《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和后果》一书。1971年该书在美国第一次出版。1973年春完成的、作了根本性修改的增改版，是1974年用俄文出版的^①。但是自从1973年以来，从各种来源继续不断地出现关于斯大林和那个时代的材料。虽然过去几年内，在苏联的出版物中越来越少地提到斯大林，但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也会发现一定数量的关于斯大林活动的有趣情节。当然，近年来，在西方对斯大林的研究中，已经出现了一些极有价值的东西，虽然必须指出，在这些研究中包含着不少有问题的见解^②。在各种期刊杂志上，还有西方作者和苏联流亡者撰写的大量文章和短小的论文。

鉴于1974年出版的《让历史来审判》一书篇幅已达一千多

① 《让历史来审判》(纽约，1974年)。对于这个增改的俄文版的出版，我极其感谢我的出版人艾尔弗雷德·A·诺夫。——原注

② 例如，罗伯特·S·塔克主编的《斯大林主义：历史的解释论文集》(纽约，1977)；斯蒂芬·F·科恩著《布哈林和布尔什维克革命》(纽约，1973)；苏联的流亡作者的著作中，令人首先想到的当然是索尔仁尼琴三卷本的《古拉格群岛》，这是一部极其重要而又矛盾重重的书；为纪念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二十周年而出版的文集中，有一些把作为一种政治现象的斯大林主义当作主题；关于苏联和苏共历史的一般著作，也为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见解。例如，G·博发写的《苏联史，1917—1941》(米兰，1976)，我们还应该提到新的俄文版四卷集《反对派通讯》(纽约，1973)。托洛茨基于1929至1941年间出版的刊物，它直到最近为止，对苏联历史学家来说是求之不得的。——原注

页，所以我认为与其修改它，不如完全写一部新书更为可取。这不仅使我有机会提供新的材料，而且使我能够讨论一些理论问题。这些问题在以前的著作中，都是没有提出过的或仅仅是附带地加以论述的。

校者的话

本书作者罗伊·亚力山大罗维奇·麦德维杰夫是苏联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历史学家，生于梯弗利斯市。他的父亲是红军的原师长、工农红军军事政治学院教员，于1937年苏联肃反扩大化时被处决。作者的主要活动是出版各种书刊，阐述自己的见解。他著有《让历史来审判》、《论社会主义民主》、《让历史来审判（续篇）》（即斯大林与斯大林主义）、《论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十月革命》、《肖洛霍夫文学生涯中的某些问题》、《菲·米朗诺夫和国内战争》，并与他的孪生兄弟若莱斯·麦德维杰夫合著《赫鲁晓夫执政年代》、《布哈林的最后岁月》、《谁是疯子？！》等书。此外，他还主编了《政治日记》、《二十世纪》、《观察者》等刊物，他在这些刊物上撰写了许多论文，报道了如“苏联入侵捷克”等重大事件。他主张苏联应该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改革，回到列宁主义的路线上来，因此被西方称之为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中的“社会民主派”或“民主改革派”。罗·麦德维杰夫原为苏共党员，1969年因出版书刊被开除党籍，他至今居住在莫斯科，从事写作活动。

本书原名为《斯大林与斯大林主义》，作者称本书为《让历史来审判》一书的继续或补充。故译成《让历史来审判（续篇）》。《让历史来审判》是一部巨作，全书80万字（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在本书中概述了上书的内容，并且补充了一些新的材料，也修正了他认为上书中叙述得不太妥贴之处，此

外，还加了两章：《战后时期》和《斯大林死后的二十五年》。所以这是一本简明扼要地阐明斯大林执政年代的书，也是《让历史来审判》一书的继续。如果读者能把这两本书一起阅读的话，那么书中收集的大量材料，对研究苏联问题的同志及对苏联问题有兴趣的读者，都有很大的参考价值。至于书中的观点，有不少值得商榷之处，我请专家和广大读者自己去思考、判断。

本书根据1979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纽约版）的英译本翻译的（译者为艾伦·德·卡德）。本书译者为李援朝、黄元、郭建英、罗元四名青年。一至四章为李援朝译，五至七章为黄元译，八章为罗元译，九章为郭建英译。他们虽然都是初次译书，但都很认真努力。在译制过程中，特别是建英协助我作了许多工作，特此致谢。我衷心祝他们成长。

我曾向国外出版界查询，得知本书尚没有俄文版，英译中的某些译法和我国熟悉的译法有出入的地方，都加了注释。译文中如有不妥之处，请读者指正。

赵 洵

一九八二年二月
二十八日于北京。

目 录

英译本序	(1)
序 言	(1)
校者的话	(1)
第一章 早年, 1900—1917年	(1)
第二章 在列宁的荫庇下	(22)
第三章 权力的积蓄	(42)
第四章 对农民开战	(79)
第五章 大恐怖	(111)
第六章 战争年代的斯大林, 1939—1945年	(140)
第七章 战后年代	(166)
第八章 斯大林之后的二十五年	(189)
第九章 结论: 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	(210)

第一章

早年，1900—1917年

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塔克在他的著作《革命者斯大林》中，提供了斯大林童年和青年时期的大量材料。他所描绘的斯大林，是人们通常所持的一种看法的最好的证明，即他的品质和个性的许多特点或基本特点就是在那些年中形成的。斯大林在他早年所表现出来的，正是那些使他日后成为暴君的品质。甚至在孩提时代他就非常固执、力求高人一等和决心成为有名望的人，当他的同学们挨打的时候，他就极端地蔑视他们，同时又十分害怕自己被打；由于经常遭到性格和他酷似的父亲的毒打，使斯大林形成了一种憎恨和报复的心理。从小他就喜爱读书，年轻的时候，对格鲁吉亚浪漫主义作家亚历山大·卡兹伯格的小说《弑父母的人》，印象极为深刻。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描写了沙米尔反对独裁专制的斗争。但是书中真正的英雄是柯巴，他是一个无畏的、不屈不挠的战士，他为年轻的朱加什维利^①提供了自己理想的偶像。斯大林开始称自己为柯巴，同时也强迫他的朋友用这个名字称呼他^②。

毋庸置疑，斯大林的中小学教育对他的成长影响甚大。他

^① 朱加什维利是斯大林的真姓。——中译注

^② 罗伯特·C·塔克《革命者斯大林》第3章。——原注

在哥里上了五年教会学校，接着又在梯弗利斯上了三年神学校。蒙昧主义、伪善和互相攻讦笼罩着神学校的生活。在这种气氛里，学生们都学的狡诈、八面玲珑，同时又都固执己见，唯我独尊。斯大林以后生活中的许多作法，都表明他没有忘记在梯弗利斯神学校度过的时光。

1941年至1946年，我碰巧也住在第比利斯^①，在那里的一所学校里任教。年轻人不断地谈论着斯大林，他们的故事令人难辨真伪。例如，据说在1936年至1938年的大清洗期间，斯大林曾亲自下令不许逮捕神学校里他以前的老师，他们中有些人至今还健在。另一件事据说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或刚刚结束的时候，那时，斯大林对东正教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急剧的转变，并且把一位格鲁吉亚东正教会的天主教神父^②，作为客人邀请到莫斯科。此人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也是梯弗利斯神学校的学生。当他们谈及往事的时候，斯大林突然问道：“你最害怕谁，是我还是上帝？”神父被问得张口结舌，不知如何回答才好。“你为什么沉默？”斯大林讥讽地笑道，“我知道你更怕我，否则你就不会穿着普通的世俗的衣服来看我了。”

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强调神学校的教育在形成她父亲的性格上所起的重要作用，她信奉东正教，并且在逃离苏联之前接受了洗礼。她在《仅仅一年》一书中写道：

“教会学校教育是我父亲受的唯一系统化的教育。

“我深信，我父亲总共上了十年以上的学。教会学校对父亲性格产生了终生的影响，加强和巩固了他天生的本性。

“他从来不曾有过什么宗教感情。没完没了的祷告、强制

① 革命以后梯弗利斯改名为第比利斯。——英译注

② 原文如此。——中译注

的宗教教育，只会对这位一分钟也没信过灵性和神的年轻人产生相反的效果：一种对‘上天’、对‘至高无上的神’所抱的极端怀疑主义。这种结果导致极端唯物主义，以及因为对生活所持有的‘现实的’、‘清醒的’、讲求实际的和降格以求的看法所带来的玩世不恭的现实主义。他发扬的不是本身的‘性灵经历’，而是另外一种东西：深得虚伪、假道学、两面派的三昧，这几种貌似信神，而实际上并不信神的特点，不少宗教界人士都具有……。”^①

《仅仅一年》中对斯大林的心理刻画，要比斯维特兰娜的第一部书《致友人的二十封信》深刻得多。这些观察当然是真的。然而，我不愿意详细论述关于斯大林早年的非常有限的资料，而愿意以1900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作为本书的开端。刚从梯弗利斯神学校被开除不久，斯大林就经人介绍认识了维克多·库尔纳托夫斯基。维克多是个职业革命家，在东西伯利亚流放了一段时间之后，来到梯弗利斯，他在东西伯利亚的米努辛斯克遇见过列宁。在库尔纳托夫斯基和《火星报》的影响之下（《火星报》创刊于1900年，1901年时正在外高加索一带流传），年轻的斯大林景仰列宁，并变成了他的忠实信徒。

托洛茨基在三十年代早期的一篇文章中就曾暗示，斯大林在1900年至1901年间，什么文章也没有写过，用创作上的语言来说，这完全是个荒芜的时期。他的说法与实际情况不符。托洛茨基在写这篇文章时，可能不了解其他各方面的情况。但有一点很清楚，斯大林在刚刚参加革命的年月里，更多注意的是实践活动，而不是理论问题。但是，即使是在那时候，斯大林也被称为理论家，至少是在外高加索地区之内的理论家。1901

^① 见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的《仅仅一年》（外文出版社《编译参考》编辑部编印）第330页。——中译注

年至1913年间，他写了大量的小册子和文章，虽然这些作品大多数是用格鲁吉亚文发表的，而且只是发表在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发行的不出名的小报上。他还写了一篇相当长的哲学论文，题目是《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1906年至1907年）。这个时期的文章组成了他的《选集》的头两卷，这些文章中的大部分是1945年至1946年准备出版时，首次译成俄文的^①。所有这些著作不久都变成了伪科学的“研究”和论文的主题，自然，斯大林这些文章的水平并不太高。在本世纪初，斯大林在写作方面无论在质量或数量上都不能和列宁的许多助手相比。但是，人们不能因此就说他在这个时期什么也没有写过。

最令人奇怪的是，1913年至1916年，斯大林所写的东西没有留下来任何痕迹。在《斯大林选集》第二卷中最后一篇文章上，标明的日期是1913年1至2月，而第三卷的第一篇文章的日期是1917年3月。1913年至1916年这段时间，斯大林是在遥远的流放地度过的，这个流放地就是位于中西伯利亚北部的吐鲁汉斯克，但他并没有和一切政治事件的发展完全失去联系。1915年夏，他参加了中央委员会俄罗斯局和杜马的布尔什维克派的联席会议^②。1916年，他和其他一些布尔什维克给《保险问题》杂志写了一封信。斯大林的官方传记作者提到了一批据说是丢失了的斯大林写给列宁的信件。但是实际上，斯大林这些年过的几乎是与世隔绝的生活，和与他一起流放的人们

① 这些著作中的大量的节录出现于贝利亚的《论外高加索的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历史》一书中，1935年第一次发表。以前，这本书被人揭露为弄虚作假，但其中一部分是真实的。到1953年，计划出版的十六卷《斯大林选集》只出版了十三卷。然而，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会完成了这项工作，于1967年出版了第十四、十五、十六卷（俄文），版面与铅字都与前三卷相同。

——原注

② 这个会议在西伯利亚的蒙纳斯泰尔斯克村举行。——英译注

没有什么接触和联系，也没有什么根据说明他进行过理论研究。在这方面，他与其他布尔什维克们完全不同，按老传统，他们都把在监狱和流放中度过的时光当作学习、研究、讨论、创造和建立理论的机会。因此，托洛茨基在1930年所写的与事实相距不远。托洛茨基写道：“四年的流放生活应该是紧张地学习知识的时期，其他人在这种情况下坚持记日记、写论文、制定纲领、相互通信进行辩论活动等等。斯大林在流放的四年中没有就战争、第二国际和革命有关的关键问题写出过一点文章，这肯定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却没能找到他在这戏剧性的谜一般的四年中写过任何东西的蛛丝马迹。这样的事情怎么会发生呢？很清楚，如果已经发现了哪怕是仅有的一行字，那么不管是什么题目，这行字也早就会发表出来了，会被译成多种文字，还要装饰上形形色色的研究所、学院所作的学术评论。但是，还没有找到这样的东西，这是否就意味着斯大林什么也没有写过呢？似乎也不能这样说。如果这样，那将是不可思议的事。但这确实表明无论他在那四年写了什么，其中绝对没有可以用来给他增添荣誉的东西。”^①

法国历史学家让·雅克·玛丽对斯大林在1903年至1907年的革命事件中所起的作用，作了如下的描述：“革命的爆发对柯巴的影响不大，那时他仅仅是一个省的活动家。与在帝国另一端的托洛茨基不同，因为他还没有被革命所发现。革命家幽灵一掠而过，但没有发现他。斯大林只是委员会里的一员——他最好的情况莫过于在各级党的职能机构的小圈子里工作——柯巴并不具备领导群众运动的那些必要的品质：口才、敏锐的才智、洞察一切的眼光和热情。在辩论最激烈的时候，当群众一

^① 登载于《反对派简讯》杂志第14期（1930年），第8页。——原注

且表现出他们超出了日常的生活圈子，而在创造历史的时候，冷静而不动声色的斯大林就会不知所措了。他的天才表现在能够在后台操纵。1905年，当许多天赋甚高的人们在大街上作出决定，把革命付诸行动时，他只是个旁观者。革命和柯巴并没有什么接触。”①

让·雅克·玛丽把斯大林描绘成委员会的一员，而不是群众的领袖，无疑是正确的。有趣的是，斯大林后来的辩护士几费周折，以美化他的用心来掩饰这一缺陷。例如，亨利·巴比赛写道：“……斯大林不是个喜欢人数众多，喧嚣的群众集会的人。他从不求助于华而不实的口才、流氓无赖的手段和争夺权力的吹捧者的那一套。这一点，是值得将来评价这个人的历史学家们给予一定注意的。斯大林并不是靠这个途径和工人、农民及知识界建立联系的。……人们可以说，环境迫使列宁事实上更是一位鼓动家。斯大林则……通常愿意通过党，通过组织来行动。……”②

但是，巴比赛的这些话很快就被遗忘了。1937年到1953年的出版物中，无论是论及斯大林本人，或是一般地说明讲演的艺术或类似的题目，都要千篇一律地提到斯大林在这一方面的非凡天才。他被描绘成一个熟练的鼓动家，他的话，能唤起千百万人民，并鼓舞他们夺取了重大的成果——革命胜利。

斯大林与其他被流放的布尔什维克一起于1917年3月回到了彼得格勒。党刚刚从地下状态走出来，它的组织系统正在组建之中。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是亚历山大·施略亚普尼柯夫。根据列宁的指示，他于1915年被委派到中央委员会，监督俄国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的行动，在彼得堡组建了中央委

① 见让·雅克·玛丽的《斯大林》（巴黎，1967年），第87页。——原注

② 见亨利·巴比赛《斯大林》（莫斯科，1936年），第109页。——原注

员会俄罗斯局。1975年6月30日，索尔仁尼琴应美国产联——劳联的邀请，在华盛顿发表演说时说：

“在革命开始的时候，领导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中，几乎所有的人，都是为实现共产主义革命，并在起义已经开始以后，从国外流亡回国的知识分子。他们中间有一位真正的工人，直到去世，他都是位非常熟练的车工，此人便是亚历山大·施略亚普尼柯夫，今天还有谁知道他的名字呢？后来他被逮捕入狱，因为他在共产党领导阶层中代表了工人的真正利益。……由于他立场坚定、刚直不阿，因此在监狱中被枪杀了；今天，在座的许多人或许根本没有听说过他的名字。但是我要提醒人们：革命以前，俄国共产党的首脑是施略亚普尼柯夫，而不是列宁。”^①

索尔仁尼琴在这件事情上的看法，是完全不准确的。当然，党在战争期间的领袖是列宁。是列宁发布指示，提出口号，设法通过各种渠道和施略亚普尼柯夫通信，并保持联系。而施略亚普尼柯夫也确实起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二月革命的最初几个星期内。苏联历史学家至今忽视他的重要性。^②

施略亚普尼柯夫和莫洛托夫两人，作为党的领导人，是相当缺乏经验和权威性的人物（莫洛托夫在二月革命的那些日子里，也是中央委员会俄罗斯局的成员）。这就说明了，为什么他

① 产联——劳联《自由工会新闻》第30卷，第7—8期（华盛顿，1975年），第4页（专门俄文版）。——原注

② 施略亚普尼柯夫在中央委员会中的显著地位，一直延续到了整个1917年，他被第一个苏维埃政权任命为劳动人民委员。1920—1921年间他领导了“工人反对派”。虽然如此，在列宁的坚持下，他仍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当他参加了联合反对派之后，他最终被罢免了。施略亚普尼柯夫于1933年的一次清洗中，被开除出党，据老布尔什维克斯涅戈夫说，后来他被恢复了职位，并被任命为阿尔汉格尔斯苏维埃地区执行委员会主席。他于其后的1937年被捕并被枪决，至今还未给他恢复名誉。——原注

们很容易地被斯大林、加米涅夫、穆拉诺夫推到了一边。他们一回到彼得格勒，就实际上控制了《真理报》和中央委员会，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党的领导所实行的政策，远不是列宁在给中央的信中所拥护和提倡的。列宁的这些信件大多都被《真理报》新的编辑委员会拒绝付印。

本世纪二十年代，施略亚普尼柯夫发表了他名为《一九一七年》的四卷本回忆录，他在第二卷里，对加米涅夫、斯大林和穆拉诺夫领导下的第一次出版《真理报》的情形，作了如下的描述：

“‘重新改组’后的新《真理报》第一次出版之时，就是护国派^①胜利之日。在整个陶里多宫^②里，从杜马委员会的商人^③，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中心——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对新《真理报》出版的解释是一样的：即温和的、理智的布尔什维克已战胜了极端分子。在执行委员会，我们遇到的是带有恶意微笑的问候……，但是，当那一期《真理报》到了工厂的时候，我们的党员和同情者却感到大惑不解，而我们的敌人则高兴万分。彼得堡委员会，中央局和《真理报》编委会都接到了群众提出的象连珠炮似的问题：‘怎么了？’‘为什么我们的报纸背离了布尔什维克的路线，而转向了护国派？’但是，正如整个党组织一样，彼得堡委员会却被突如其来的‘政变’接管了。委员会的委员们被免除了职务，而这些被罢免的委员们，则为所发生的事情对中央委员会大加指责。在地区组织中，广泛存在着愤怒的情绪，当工人们发现，《真理报》已由三个从西伯利亚回来的编辑

① 赞同将战争进行到胜利的社会主义者。——英译注

② 杜马在陶里多宫的右侧开会。当苏维埃建立的时候，在同一个宫殿里的左侧举行了第一次会议。——英译注

③ 临时杜马委员会于1917年2月27日正式开始行使权力。其中有米留柯夫、涅克拉索夫等人，由此产生了临时政府。——英译注

接管了之后，便发出呼吁，要求将他们开除出党。”^①

无疑，加米涅夫要对布尔什维克新路线的形成负主要责任。然而那时候，斯大林对这一路线的观点也是完全赞同的，这一点，我们从他自己的几篇文章中能看得很清楚，同时，他是《真理报》编委会的成员，这一事实本身也可以使问题一目了然。斯大林对加米涅夫在报纸上发表的任何一篇文章，都应承担自己的责任。后来，斯大林只是部分地承担了这一责任。在《通向十月之路》一书的引言中（斯大林的秘书伊万·托夫斯图哈曾为编写这一本书，收集了斯大林1917年3月至10月的全部文章）斯大林写道：

“……被沙皇专制统治分散到监狱和流放地的布尔什维克们，突然获得了一次机会，从俄国的四面八方聚集到一起，制定一个新的党纲。然而，他们却不能单独地应付这个新的形势。因此，在寻求新方针的时候，党停止考虑和平问题和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便不足为奇了。列宁著名的‘四月提纲’是必要的，它使党毫不迟疑地走上了新的道路。在对中央工会委员会的讲话中，我已说过，那时，我和党的大多数同志，对这一错误的立场负有责任。但我在四月中旬就已坚决地反对它了，并且赞成了列宁的‘四月提纲’。”^②

但即使在承认自己的错误时，斯大林也要声称“党的大多数同志”执有同样的观点，而表现出他通常那种不坦率的品质。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党组织便持有不同的立场。1917年3月27日至4月2日举行的第一次合法的全俄罗斯布尔什维克

① A·施路亚普尼柯夫：《一九一七年》第1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25年版，第219—220页。——原注

② I·斯大林：《通向十月之路》（莫斯科——列宁格勒1925年），第8页。——原注

党代表会议上，斯大林为《真理报》的路线进行辩护。在这次会议上的一次发言中，斯大林甚至提出，为了克服“党内微小的分歧”，有和孟什维克联合的可能性。只是由于列宁返回俄国才使党改变了路线。托洛茨基在他写的《俄国革命史》一书中，探讨了斯大林生涯中的这一时期，他写道：

“加米涅夫是流亡的中央机关刊物编委会的成员，斯大林是中央委员会的委员，杜马代表穆拉诺夫也刚从西伯利亚回到了彼得格勒，他们几个人取代了《真理报》过去的编辑，因为这些编辑们过于‘左’了。他们依仗着多少有点可疑的权力，于3月15日接管了这家报纸。在新编委会纲领性的声明中，他们宣称，‘只要临时政府同反动派和反革命作斗争’，布尔什维克就应坚决地支持临时政府。新编辑们在战争问题上，也表明了他们自己毫不含糊的态度，他们主张：在德国军队继续服从德皇命令的时候，俄国士兵必须坚守战斗岗位，以牙还牙，我们‘打倒战争’的口号不是无内容的。我们的口号是，给临时政府施加压力，目的在于迫使它……试图说服所有交战国立即开始谈判。在此之前，每个人都必须坚守战斗岗位！这些思想以及这些思想的形成是彻头彻尾的护国主义。是旨在‘诱使’帝国主义政府采纳和平政策，而对它施加压力的纲领，也是考茨基在德国，让·龙格在法国和麦克唐纳在美国的纲领，这当然不是列宁的纲领，列宁是号召推翻帝国主义统治的。……”

“《真理报》不久之后被迫刊登了来自维堡区的下述强烈抗议：‘如果它（指报纸）不想失去工人信任的话，那么它该做的是启发人们的革命觉悟，而不论这对资产阶级的魔鬼们来说是多么痛苦。’这些来自下面的抗议，迫使这些编辑们更加谨慎地表达他们的思想，然而他们的政策没有改变。而列宁发自国外的第一篇文章，也未能对这几位编辑产生什么影响，他们已完

全走上了右倾的道路。”^①

非常奇怪的是，1924年至1925年，在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正值中期阶段的时候，斯大林不仅一再承认当时他在《真理报》所犯的错误，而且还承认那时自己对这些错误应负的责任。“这是一个极端错误的立场，”他在一次讲话中说，“因为这种立场滋长了和平主义幻想，帮助了护国主义，阻碍了对群众的革命教育。当时我和党内其他同志赞同这个错误的立场，……。”^②然而还不到两年的工夫，在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与托洛茨基组成联合反对派时，斯大林和赞同他的一派人却宣称说：1917年3月党犯错误一事，应该受到批评的是加米涅夫。这以后，加米涅夫便成了对整个这一时期的工作负责的唯一人物了。叶米里昂·雅罗斯拉夫斯基在他写的第一版《布尔什维克党史》中，谨慎地提到了斯大林的错误，然而在以后的各版中，同是这位作者却改口说：

“毋需说，加米涅夫的文章，即便不算是遇到了压倒多数党员的反对，起码也是引起了广大党员的不满。按通常的规律，这种护国派或半护国派的感情在党内是十分例外的。当然，加米涅夫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动摇不是偶然的，这是他右倾机会主义立场合乎逻辑的结果。他在战争年代就采取了这一立场，并且直到列宁回国为止一再企图发展它，列宁回国后，他突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中央局和斯大林在编委会起领导作用的中央机关报——《真理报》，都反对加米涅夫硬塞进《真理报》文章中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③

① 托洛茨基：《二月革命》（柏林，1931年），第324—325页。——原注

② 斯大林：《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33页。——原注

③ E·雅罗斯拉夫斯基《联共（布）党史》第2卷（莫斯科，1933年），第16—17页（《联共（布）党史》即上文中所说的《布尔什维克党史》）。——原注

在由斯大林亲自修改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还出现了比这更荒唐的说法：

“党一转到合法状态，党内的意见分歧就暴露出来了。加米涅夫和莫斯科组织的某些工作人员，例如李可夫、布勃诺夫和诺根，采取半孟什维克主义的立场，有条件地支持临时政府和护国派的政策。斯大林（他当时刚从流放地回来）和莫洛托夫等人，同党内多数同志一起，坚持不信任临时政府的政策，反对护国主义，……。”^①

是的，今天我们处于审度斯大林1917年的活动，详细讨论一些重大错误及其它一些问题的地位上，但是，重要的是在于记住，那时斯大林所起的作用相对来讲是很小的，他在党的领导者中间所占据的位置是十分有限的。许多不是中央委员的党的活动家，在群众中有更大的影响，他们对十月革命胜利的贡献要远远大于斯大林。甚至彼得堡的工人们都不知道斯大林其人的存在。由于他说话的声音很低，加上又带有浓重的格鲁吉亚口音，斯大林很少敢于在群众集会上讲话，而他在《真理报》及其他地方发表的文章又被其他人的著作所淹没。那时，有许多优秀的时事评论家为党报写了许多文章，更不用说列宁和托洛茨基了。斯大林在党外实际上并不为人们所知晓，独立的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尼古拉·苏汉诺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那时候，在出入于执行委员会的布尔什维克中间，除加米涅夫外，斯大林偶尔也会光顾一下这里，……但在这段时间里，他在执行委员会的有限的活动没有给大家，同时也没有给我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对于他，我确实没有什么更多好

^①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莫斯科，1938年）第176页（《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文本，人民出版社，1975年5月，第204页）。——原注

回忆的。”^①

在彼得格勒十月革命的那些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日子里，斯大林同样是不引人注意的。列宁那时负责总体计划并向党发布主要的指示。正是由于列宁的决心，以及这一决心产生的力量，致使列宁战胜了中央委员会里的动摇分子，而这些动摇分子绝不仅限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一伙。在起义前不久建立起来的彼得格勒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确保了列宁的指示得以贯彻执行。当然，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工作是由托洛茨基负责领导的。这一时期党的另一些杰出的活动家是：巴维尔·迪宾科、弗拉吉米尔·安东诺夫·奥弗申科、莫依塞·沃洛达斯基、尼古拉·克雷连科、V·A·阿万涅索夫、尼古拉·波德沃依斯基，G·鲍基和K·叶列梅也夫等人。

甚至官方传记作者们也发现，收集斯大林参加1917年10月24、25日活动的材料是很困难的，他们虽全力以赴，然而也未能填满半页纸。这一段官方文字如下：

“10月24日清晨，克伦斯基命令关闭党的机关报《工人之路》，同时还派遣了装甲车到编辑办公室和报纸印刷所。但在上午十时，赤卫队和革命士兵根据斯大林同志的命令，把装甲车开走了，并为保卫报纸加强了巡逻。将近十一时，《工人之路》发行了，这期报纸上登有斯大林署名的、题为《我们需要什么？》的社论，这篇社论号召群众推翻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与此同时，根据党中央的命令，革命士兵和赤卫队在斯莫尔尼宫迅速集结。10月24日的起义开始了。”^②

① N·N·苏汉诺夫《革命札记》第2卷（柏林，1922年），第265—266页。
——原注

② 《斯大林传略》（莫斯科，1952年）第66—67页。——原注

在这段摘录中，几乎每一个字都是有意篡改历史。临时政府不仅下令关闭了《工人之路》，而且在一队警察和士官生的帮助下，于10月24日凌晨六时左右占领了报纸印刷所。当这一消息传到斯莫尔尼宫的时候，中央委员会便召开了一次会议（八时至九时之间），有十一名委员参加。在斯莫尔尼宫作出的加强保卫的决定，实际上是由中央委员会作出的。这次会议还决定中央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在这一天都要留在斯莫尔尼宫，任何人不准离开。关于《工人之路》的情况是：中央委员会命令立即往报社派去一队卫兵，“以确保下一期报纸能按时发行^①”。

“革命军事委员会采取了类似的措施。十时左右，一个信使把中央要求恢复《工人之路》出版的决定，带到了离斯莫尔尼宫不远的拉脱维亚团团委会，该团团委会立即决定派出两个连和配备二十四挺机关枪的一个机枪连，听候革命军事委员会的调遣。机枪连和一部分战士被派往斯莫尔尼学院^②，剩下的人被派往印刷所，在那里他们取代了警察部队并接管了报纸。而后，工人们便开始了印刷工作。”^③

在上述这一期《工人之路》上刊登的《我们需要什么？》一文中，并没有要求推翻临时政府的词句，斯大林在这篇文章中写道：

“工人、士兵、农民、哥萨克们及全体劳动者们！你们愿意使新的工农政府来代替目前的地主资本家政府掌握政权吗？……”

“如果你们愿意这样，你们就要聚集自己的一切力量，一

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莫斯科，1958年）第119页。记录稿表明：斯大林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于10月24日那天他也没在斯莫尔尼宫和《真理报》编辑部办公室。——原注

② 原为一个宫殿，后改为学院，仍沿用旧称为：斯莫尔尼宫。——中译注

③ 《十月武装起义》第2卷（列宁格勒，1967年），第293—296页。——原注

致奋起，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举行会议，选举代表团，并通过它们向明天在斯莫尔尼召开的苏维埃代表大会陈述自己的要求。

“如果你们大家都同心协力，坚定不移地行动起来，那么谁也不敢抗拒人民的意志。你们的发动愈有力、愈有组织、愈强大，旧政府就会愈和平地让位于新政府。”^①

列宁正是与这种见解——让我们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定吧——作过非常激烈的斗争。列宁的观点胜利了。10月24日，即在苏维埃代表大会预定开幕的前一天，举行了武装起义。因此当代表大会次日召开的时候，大会所面对的是已经既成的事实。一夜间，革命军事委员会已经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城市接管了政权。

从根本上讲，要把斯大林描绘成十月起义的积极参加者，依据是颇不足的。据称，10月16日中央委员会决定，建立一个由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捷尔任斯基、布勃诺夫和乌利茨基组成的领导起义的总部。中央委员会也确曾作过这样的决定，但所有的资料表明这个党的总部实际上根本没有成立起来，而且也从来没有开过一次会议。原来就没有要设独立机构的考虑，更不要说是控制一切的机构了，只是曾打算将这个总部附属于革命军事委员会。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没有所谓“党的总部”的帮助下，也能把工作安排得很好，因为几乎所有委员会的同志都是布尔什维克，都执行中央委员会的一切指示。还应该指出，中央委员会10月16日的决议所提议成立的并不是一个“党的总部”（如在官方的传记中所说的那样），而是一个“革命

① 《工人之路》，1917年10月24日，第44期（《斯大林全集》第3卷，中文版，第373页）。——原注

军事总部”，这个总部将“隶属于苏维埃革命委员会”^①（即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正是列宁提议创建革命军事委员会，而且这个委员会的职能和机构组成的决定，都是在1917年10月12日彼得格勒苏维埃的闭幕会议上作出的。10月21日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成立了由五人组成的领导小组，这五人是：安东诺夫·奥弗申科、波德沃依斯基、萨多夫斯基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②拉基米尔及苏哈尔科夫。^③

六卷本的《苏联共产党历史》是一部最完整的官方党史。在这本书有关十月起义的关键几个的段落中，没有提及斯大林。当然也没有提到托洛茨基，书中有一处例外的记载，我们由此得知：“托洛茨基的讲话对革命军事委员会产生了混乱的影响。”^④对彼得格勒苏维埃的这位主席只讲了这么几句话。

然而，任何一位客观的历史学家，都能证明在起义前的几个星期中，当列宁不得不隐藏起来的时候，布尔什维克最著名的演说家无疑是托洛茨基，他的演讲对任何一位听众都会产生非凡的、有力的影响。常为列宁、托洛茨基和卢那察尔斯基的演讲作速记工作的老党员玛丽亚·越飞回忆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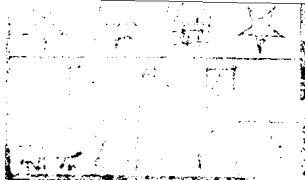
“没有一个人能象托洛茨基那样使听众发狂，当他在大批群众面前高声讲话的时候，会伸出胳膊喊道：‘请你们宣誓，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吧！’于是成千上万的听众便会高声附合：‘我们宣誓’。当时，一向激烈反对武装起义的孟什维克哈查洛夫站在

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会议记录》（莫斯科，1958年）第104页。——原注

②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是社会革命党的一支，他们在1917年支持布尔什维克，并短时间里参加了布尔什维克政府。——英译注

③ 《苏共党史》第3卷，第1册（莫斯科，1967年），第312页，这个领导小组从来没有独立地起过作用，拉基米尔只是形式上的负责人，苏哈尔科夫也几乎未参加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工作。——原注

④ 《苏共党史》第3卷，第1册（莫斯科，1967年），第321页。——原注



我前面，连他也跟着喊了起来：‘我宣誓！’稍后我们走在街上的时候，我问他怎么会这样，他回答说：‘过一、两个小时以后，我会恢复理智，但当你站着听他演讲的时候，是不能不跟他走的。’”^①

总之，一切证据均说明，中央委员会10月16日关于成立一个“党的总部”或“革命军事总部”的决议，是确有其事、有案可查的。但这一决议却未付诸实施，10月10日成立“政治局”的决定，也有同样的命运。^②

出于好奇心，我想在这里提一提下述一个事实：A·阿夫托洛哈诺夫在他最近写的一本书中，似乎是把存在过一个指导十月革命的秘密中心的说法拿来当真了。不幸的是这位“专家”似乎并不注意历史的准确性，而只关心向他的读者提供消遣。他写道：

“当然，自1912年起，作为中央委员，领导俄国布尔什维克党进行地下秘密活动的是斯大林。自然，斯大林也是十月革命变革前夜秘密起义中心‘军事革命总部’的成员，是其中的唯一一位政治局委员。革命成功后，这个中心改名为全俄肃反委员会，斯大林作为中央委员会代表成为它的领导成员之一。而名义主席捷尔仁斯基和他的助手——明仁斯基、雅哥达、拉齐斯和鲍基——都是斯大林的傀儡。”^③

在整个这一段话里，简直没有一句真话。斯大林不可能从1912年起就指导党的秘密工作，不能仅仅因为他于1912年被缺

① 《时代与我们》第19期，第178页。——原注

②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会议记录汇编》（莫斯科，1958年）第86页。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实际上很晚才出现。——原注

③ A·阿夫托洛哈诺夫：《斯大林死之谜》（富兰克福，1976年）第35页。——原注

席选为中央委员（当时他正在沃洛格达流放），就作出这样的设想。他确曾于1912年2月29日逃离了流放地，获得了几个星期的自由，然而他于4月22日再次被捕，而且被送到了另一个流放地，在那里他一直呆到1912年9月1日。再次逃跑之后，斯大林逃亡国外，在克拉科夫度过了几个星期，在那里他撰写了《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回彼得堡后，斯大林又于1913年2月23日再次被捕、流放，在吐鲁汉斯克一直呆到二月革命爆发。因此，在这段时间里他根本不可能负责党的秘密活动。1917年中央委员会还没有建立政治局，当时也并不存在任何领导革命的秘密总部。领导十月起义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是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合法机构（按当时的说法），而且在契卡和拟议中要成立而实际上没有成立起来的革命军事总部之间，也没有逻辑上的联系。契卡是到1917年12月才成立的，斯大林从未在契卡领导机构中工作过。捷尔仁斯基也根本不是什么名义主席，而明仁斯基、雅哥达、拉齐斯和其他主要契卡干部，也都不是斯大林的傀儡。在1917年12月，斯大林是负责民族事务的人民委员，并主要忙于他在委员会里的工作。

在描述斯大林早期政治生涯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要触及到据称他与沙皇暗探局的所谓联系。《让历史来审判》一书中，我对声明、谣言，甚至对西方出版物或地下出版物的材料中，作为证据而引用的“文件”，是持怀疑态度的。然而必须指出，即使在今天，一些尚在世的布尔什维克仍然相信：斯大林在其革命生涯的最初几年里，曾被沙皇暗探局招募，而后为其作过秘密的特务工作。老布尔什维克鲍里索夫给我写过一封信，内容如下：

“因为事情看来太荒谬，你认为不能接受这样的观点，即党在三十年漫长的时间里，居然能够处于沙皇暗探局的特务领

导之下，然而，你的否定态度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斯大林知道，如果这件事被揭露出来，而他又被剥夺了权力，那么他就会象马林诺夫斯基一样被处决。1935年确有某些不利于斯大林的材料落入了党和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干部手中，然而，斯大林却在他们采取行动之前，先发制人地把他们枪杀了。后来的每件事都说明，作为沙皇暗探局的特务，斯大林是一位从心灵深处拥护君主专制的人，他对专制主义的偏爱，对革命者粗暴的蔑视，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的无知，以及他从肉体上消灭了十月革命的领导人，完全改变了苏维埃制度的性质等做法，均出自于他的专制主义思想。”

这场争论可能不会有答案，因为鲍里索夫没有拿出任何证据，以支持他独特的断言。

索尔仁尼琴也提到过斯大林同沙皇暗探局的合作问题。在《古拉格群岛》一书中，他提到了V·F·钟科夫斯基，此人是前沙皇警察总监，他在科雷马集中营临死之前宣称：二月革命的头几天里，曾有过一次匆匆忙忙销毁警察档案的行动，这一行动是和某些有利害关系的革命者共同完成的。^①

然而，我们知道，有一部分文件并未被销毁而得以幸免，临时政府驻巴黎大使V·A·马克拉科夫将它们送到了法国。二月革命之后，临时杜马委员会委员马克拉科夫曾作过几天司法部部长。他的兄弟N·A·马克拉科夫在1913年初至1915年底这段时间里，曾任沙皇政府的内务大臣。^②马克拉科夫手中的材料后来到了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该研究所因收集了极为丰富的俄国历史和苏联的各种材料而著称于世。可以设想，如果

① A·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第1卷（巴黎，1973年），第79页。——原注

② 《历史问题》杂志，第10期（1972年），第167页。——原注

有任何不利于斯大林的证据，在马克拉科夫送往国外的文件中已被发现的话，这些证据则早就会公诸于世了。

罗伯特·塔克在前文已提及的书中，也反对斯大林是一贯忠实执行上级命令的警察特务这一说法。他指出：西方发表的支持上述说法的各类“文件”已被发现是伪造的。同时，塔克也并非没有根据地提出：斯大林有可能出自个人或派别的目的，而向警方告发过革命者。对他来说，通过可靠的中间人来安排这种告发是非常可能的，而他自己却躲在后台，不出头露面。很可能这是斯杰潘·邵武勉1909年被捕的原因，因为只有斯大林知道他到达的日期和准备停留的地方，虽然我们不能排斥沙皇暗探局从其他一些渠道获得该项情报的可能性。然而，我们也不能排除斯大林秘密通知警察当局的可能性，那时，他把邵武勉看作是争夺外高加索布尔什维克领导地位的对手。

不久前，我获得了一份来自警察局档案的有关斯大林的文件，其有关部分值得在此全文引述：

“内务部，警察局，特别部通告。1904年5月1日，第5500号。

“各省市总督、警察局长、省宪兵队长、铁路警察署及各边防站：

“警察局荣幸地要求你们适当地处置下列人员：

“ 1. 因与警事案件有关被通缉人员名单。

“ 2. 解除通缉人员名单。

“ 3. 在以往的通告中已开列的被通缉人员名单。……

“名单1，与政治案件有关被通缉人员名单（第1—185号），20页，第52号。

“朱加什维利·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梯弗里斯省，梯弗里斯区，迪迪——里洛村人；生于1881年，正教徒；曾

就读哥里教会学校，梯弗利斯神学校；未婚；其父维萨里昂下落不明；母，叶卡捷琳娜现住梯弗利斯省哥里市；该犯因犯反国家罪，根据1903年5月9日皇帝颁布的命令，由警察押解送往东西伯利亚流放三年。流放居住点为伊尔库斯克省巴拉干区。1904年1月5日失踪。

“容貌特征：身高：2俄尺4.5俄寸^①。不胖不瘦，相貌极平常。头发棕色；胡子红棕色；平头；眼睛深棕色、大小相等；头部无特色，前额小而平；鼻子长直；脸黝黑，有麻子、长脸，缺左下前门牙；身材不算高、尖下巴；声音温和，耳朵大小适中，走路姿势无特色，左耳有胎痣；左脚二、三指联在一起。

“如发现此人请立即扣留并电告警察局听候进一步指示。”^②

仅仅是为了抓一个沙皇暗探局的特务，恐怕不可能向各个警察局和边防站下达这样的文件吧。

① 约五时四分。——英译注

② 见ИГАОР (ТSGAOR为十月革命中央档案馆的缩写) 特别部，卷宗第167号 (1905年)，公民谢苗·阿巴拉莫夫·吉尔班诉讼案，第4—36卷 (斯大林的诞辰日期是错误的。)——原注

第二章

在列宁的荫庇下

斯大林1918年夏秋两季在察里津也有犯罪行为，这一点现在已毫无疑问了^①。1962年至1964年苏联的出版物中，对他这个时期已作了较详尽的考察，我在《让历史来审判》一书中，也曾谈及这方面的问题。因此，在这里我只提出一份有关当时身为南部战线司令员的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行为的补充文件。这是一份托洛茨基发出的电报，日期是1918年10月，托洛茨基将这份电报收录在1924年出版的他的文集中的一卷里。他写道：

“我坚决要求将斯大林召回，尽管兵力占有优势，察里津的工作却进展得非常不顺利。伏罗希洛夫有能力指挥一个团，但却不能指挥拥有五万人的军队，斯琴提出了一个报告，我将留任他指挥第十军。直到现在为止，察里津甚至没有发回来一份报告，我曾命令一天要发回两次关于侦察和行动的报告。如果明天还做不到的话，我就要用军法审判伏罗希洛夫，并且用军事命令公布这一件事。”^②

① 斯大林1918年夏被派往察里津（1925年重新命名为斯大林格勒，1961年又命名为伏尔加格勒，这是通往北高加索谷物产地的门户），担任负责粮食供应的特派员。他独揽了察里津地区的全部权力，用群众恐怖作为在城市和前线处理事情的主要手段。——英译注

② 托洛茨基：《革命是如何武装起来的》第1卷（莫斯科，1924年），第350—351页。——原注

10月19日，斯大林从察里津被召回到莫斯科。不久以后，他又和捷尔任斯基一起作为党的调查委员会成员，被派往东部前线调查彼尔姆陷落的原因。

在我第一部关于斯大林的书里，对于他在1920年作为西南前线战时委员会成员的活动，只是一带而过。那一年的夏天，斯大林把自己的决定强加给西南前线司令员（亚历山大·叶戈洛夫），这样，实际上他就掌管了那里的前线指挥权。他的盲目行动和缺乏纪律性的行为，在1920年春季爆发的波苏战争中，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波兰于4月份进攻苏维埃共和国，在西线，由于兵力上占有相当的优势，波兰军队得以迅速向东挺进，占领了明斯克和基辅。但是，由于大批的红军被调到了西部和西南部战线，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经过激烈的战斗，解放了基辅和明斯克，波兰军队被迫后撤。

起初，大量的增援部队被派往西南前线。七月底，波兰前线局势趋于恶化，近六万红军面对比自己多二倍以上的波兰军队，因此，有必要紧急地重新集结兵力。同时，在西南前线有三个波兰师和从彼得留拉军队中调来的士气低落的几连人。在南方也出现了苏维埃共和国的新威胁：在6月初，弗兰格尔的部队突破了克里米亚防线，并占领了黑海地区的大部。当时，在已向西部移动的西南前线司令部统辖下的第六军和第十三军的力量，是不足以对付弗兰格尔的攻势的。

1920年8月2日，政治局作出决定，在西部前线，所有抗击波兰的部队由图哈切夫斯基指挥。同时决定另开辟一个独立的南部前线。斯大林受命组织新战线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他接到了列宁的电报：

“急电，密码，致斯大林。政治局刚刚作出决定把战线分

开，以便你全力以赴地对付弗兰格尔。弗兰格尔以及特别是在库班和西伯利亚的暴动，正在变成巨大的威胁，中央委员会内要与资产阶级波兰媾和的情绪正在不断增长。我要求你十分仔细地考虑与弗兰格尔的局势并把你的结论告诉我。”^①

同时，红军总司令谢尔盖·加米涅夫根据中央委员会的指示，命令第一骑兵军和第十二军从西南前线调到西部前线，以便加强正在挺进华沙的兵力。

斯大林接到了列宁和加米涅夫的电报，但是却拒不执行他们的指令。他用当时对他来说是很平常的目空一切的态度，于当天晚上回电列宁说：

“我已收到你关于把战线分开的指示。政治局不应让琐碎的小事缠住。我最多还可以在前线再停留二个多星期，我需要休息，并寻找一个代替我的工作的人。我没有一刻相信过总司令员的许诺，他总是让人们对他的许诺失望。至于说到中央委员会内和波兰媾和的情绪，我认为，似乎我们的外交有时非常成功地破坏了军事上的胜利，这已经成了不可逃避的事实。”^②

8月3日，列宁给斯大林发去了一份电报，坚持把战线分开的主张，他说：“我们的外交工作是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下进行的，绝不会破坏我们的胜利，除非弗兰格尔的危险在中央委员会内引起动摇”。^③他没有反对斯大林“休息”的愿望，并且要求他推荐一位可以胜任的代替人。

8月5日，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确认了政治局关于把战线分开的决定，并且决定调第十四军到西部战线，以加强那里的第十二军和第一骑兵军。第二天，总司令员把说明这一内容的

① 列宁：《列宁全集》第51卷，第247页。——原注

② 《列宁全集》第36卷（莫斯科，1959年），第116页。——原注

③ 列宁：《列宁全集》第51卷，第248页。——原注

指示，下达给西南前线司令部，而斯大林又一次拒不服从这一命令。总司令员又在8月11日重申了他的命令，解释了在其命令中的战略意图：“西部前线的部队将进行一次决定性的打击，要彻底击溃敌人并占领华沙。因此，我们现在必须暂时不能立即去占领利沃夫，以便派出尽可能多的部队，去支援图哈切夫斯基在卢布林附近的进攻，并且首先支援他的左翼。”^①但是，斯大林和叶戈洛夫却实行一条公开不服从的路线。第一骑兵军既没有采取行动，也没有对其调归图哈切夫斯基指挥而作出任何安排。相反，西南战线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却命令第一骑兵军一有机会就“给布格的右岸以有力打击，从而摧毁敌人。强渡之后，越过溃散的第三、第六波兰军，占领利沃夫城。”^②但是结果证明，骑兵军未能占领利沃夫，而西部战线的进攻也结局不妙，苏联在西部的力量，还没有强大到能够战胜波兰军队的抵抗，并占领华沙的地步。西部前线战败的部队又开始向东撤退。虽然，华沙战斗的灾难性结果，并非用某一个原因就能加以解释的，但是斯大林的行为无疑是个重大的因素。因为在他指挥下拥有大量的部队，然而他显然不愿意让西部前线赢得战胜波兰的全部功勋和荣誉。有一些证据表明，斯大林是想通过利沃夫，自己从敌背后攻占华沙，当本奇·勃鲁耶维奇向列宁报告波兰前线的失败时，列宁的评论是：“嗯，哪儿有通过利沃夫打华沙的？”^③

鉴于斯大林在整个波兰行动中，再三拒不服从总司令员的关键性命令，列宁在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提出了这个问

① 摘自《苏联内战史》(文件集)第3卷(莫斯科, 1961年), 第138页。——原注

② 《军事历史杂志》第9期(1962年), 第61页。——原注

③ V·D·本奇·勃鲁耶维奇《在战斗的岗位上》(莫斯科, 1930年)第283页, 这些回忆录再版时删去了列宁的话。——原注

题。8月14日，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给斯大林发去了如下的电报：“你和总司令员之间的摩擦已到了……必须通过在一起面对面的讨论来澄清的时候。因此，我们要求你尽快来莫斯科”。^①

8月17日，对利沃夫进攻的失败已经十分明显，斯大林回到了莫斯科，并要求政治局解除他的军事职务。他的请求得到了批准。8月29日，他被解除了在南部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中所担任的职务。这个新的战线直到1920年9月20日才正式成立，伏龙芝任司令员，同时古谢夫被任命为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人。

1920年9月底举行的第九次全俄党代表会议上，在总结波兰行动的后果时，列宁支持了总司令员加米涅夫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的行动。在作结束中央委员会会议的报告时，他觉得有必要批评斯大林的行为。^②第二天，斯大林请求就他的问题发言，并且进而指责：“昨天列宁同志和托洛茨基同志的发言中有许多地方与事实不符。”^③他试图证明西南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政策是正确的，但是会议对他的“反驳”未予理睬。

斯大林被解除了军事职务之后，仍然保持了两个最重要的职位：工农检查委员会人民委员^④和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他还是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以及党的最高机构政治局的成员和中央委员会组织局的委员。1922年

① 《苏联国内战争史》(莫斯科，1962年)，第444页。——原注

② 《俄共(布)九大会议记录》第372—373页。由于被认定是不正确的，列宁在这次会上的第二次会上的总结发言从未发表过，我们能从会议记录上得知他对斯大林的批评。——原注

③ 《俄共(布)九大会议记录》第82页。——原注

④ 工农检查院自1920年至1934年存在，其目的是检查行政机构的工作。——英译注

4月初，斯大林以总书记的身分进入了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一份由老布尔什维克“A·L”写的未发表过的题为《社会主义的统治和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1973)的手稿上指出，斯大林因为不能处理工农检查院的工作，因此，后来实际上被免职了。第十一次党代表会议之后，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为“安抚”斯大林而建立了一个新的“特设”的职位，该职位具有“总书记”的荣誉头衔。但是这种对斯大林新任命的解释，理由并不充分。他确实没有使自己在工农检查院有所建树——事实上他对该委员会的工作毫不感兴趣，因而把大部分工作委托给他的副手。列宁也曾经常用十分激烈的言辞批评工农检查院的工作，例如，他有一次曾说：“除了执行简单的指示以外，要指望（工农检查院）去做其它任何事情都是荒谬可笑的。”^①然而，当时列宁并没有因这一机构的缺点而责备斯大林。斯大林被任命为总书记也当然不是一种从工农检查院荣誉退休的形式。正相反，它意味着斯大林的机会和权力将在实质上得到加强。

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后正式诞生，并由斯维尔德洛夫领导，直到他1919年3月去世为止。当时书记处设立了一个新的职务，就是“常务书记”。第一个担任这个职务的人是叶莲娜·斯塔索娃，一年以后，由尼古拉·克列斯廷斯基担任，他于1919年到1920年间还是政治局和组织局的成员。1921年，莫洛托夫、米哈依洛夫和雅罗斯拉夫斯基又相继被任命为常务书记，莫洛托夫是三个人中唯一进入政治局的人（任政治局候补委员）。但是，莫洛托夫的工作完成得极差。1922年，斯大林作为“总书记”接管了书记处，在职位上比其他两位书记——莫洛托夫和古比雪夫要高。

^① 《列宁全集》第44卷，第369页。——原注

1923年至1924年间，书记处扩大到五人，斯大林仍留任总书记。作为政治局的委员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斯大林实际上也控制了组织局。正是由于斯大林在三个党的统治机构中和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地位（以后称为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及（直到1923年）在人民委员会^①的地位，使得他能够积蓄起列宁曾说过的那种“无限的权力”。到列宁患病的时候，他已经成为党的第一号人物了，虽然，当1922年4月设立总书记一职的时候，几乎没有人想到，这个职务会成为党的各级领导职务中最重要中的一个。早在1922年4月，后来又在1923年的上半年，斯大林就从党的机构的新一轮的选举中获得了好处，并且通过对省和地区一级，以及各加盟共和国的党中央委员会一级的干部进行大改组，在党的中央机构和地区一级成功地大大加强了自己的影响。卡冈诺维奇变成了中央委员会组织指导部部长，希尔佐夫被任命为中央档案馆馆长，布勃诺夫负责宣传鼓动部。这三个人都是斯大林的积极的支持者，成为他在党的机构中的第一个“总参谋部”。斯大林在这些机构中的统治地位，很快就使他成为政治局的关键人物，虽然政治局曾先后由季诺维也夫（1922年至1924年）和加米涅夫（1924年至1925年）主持（主席的职务是列宁患病后设置的）。

当斯大林尽可能利用一切可乘之机，来加强他个人在党内的地位时，卧病在床的列宁只能口授他最后的文章、笔记和建议，有时一天不超过十分钟。这个时期的全部文章，主要是有关两个方面的问题：即关于与党和国家机构中官僚主义的增长作斗争的必要性和党分裂的危险性。他的许多话都是直接或间接地批评斯大林的。某些信件是写给具体人的，因而未打算发

^① 直到1946年为止苏联政权的名字。1946年以后变成部长会议。——英译注

表（这些人中有托洛茨基、斯大林、弗鲁姆金、阿瓦涅索夫、穆迪万尼、马哈拉泽。还有一封他写给人民委员会会议和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代表的信）。列宁认为有些信件和进行改革的建议应严格保密，并指示他的秘书和克鲁普斯卡娅只有在他死后才能公开。另一方面，还有许多文章列宁打算立即在党报上发表，那时，医生还允许他看看报纸。他对他的《如何改组工农检察院》一文的发表特别关心。在这篇文章和另一篇题为《宁可少些，但要好些》的文章中，列宁强调对现存的党和国家的管理机构需要进行彻底改组。他建议成立一个比较小的、主要由工人和农民成员组成的监督机构，他们将享有中央委员的一切权力。这个新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必须有一定人数出席政治局每次会议的中央监察委员，应该形成一个紧密的集体，应该‘不顾情面’，注意任何人的威信都不能妨碍他们提出质问，审查各种文件，并且总要作到绝对了解情况和使问题处理得非常正确。”^①

列宁认为，普通工人参加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是极其重要的。他相信，这对恢复统治集团的元气和改变它的性质是会有一些的影响。列宁在为他的关于工农检察院的文章所写的注释中写道：

“如果我们未能及时地执行这一任务，那么这便是我们在一个最基本任务上的失职，我们应该利用我们掌权的时期，对工人阶级中的优秀分子，进行关于政府职能机构的详细教育。”^②

列宁关于工农检察院的文章，不仅使斯大林感到大为不快，也使政治局许多其他成员大为不快。《真理报》主编布哈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440页。——中译注

② 《列宁全集》第45卷，第449页（莫斯科，1964年）。——原注

林虽然十分忠于列宁，然而，尽管克鲁普斯卡娅不断施加压力，也未能使他下决心发表这篇文章。在一次政治局紧急会议上，古比雪夫甚至提出印一份刊有列宁文章的特别版《真理报》，这样做，既可以使党不知道有这篇文章，同时又可以使列宁安心。但是，这个建议遭到了否决。政治局感到不得不同意发表这篇文章，因而该文于1923年1月25日在《真理报》上发表，接着，3月4日《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也发表了。虽然如此，在1923年4月17日至25日举行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改组工农检查院的问题，却根本没有列入议事日程，列宁的建议基本上未被理睬。季诺维也夫代表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中，没有提到列宁的建议，甚至在什基尔雅托夫代表中央监察委员会所作的报告中，也未提及此事。只是在代表大会处理组织问题的一次会议上，考虑了工农检查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职能问题。虽然主要发言人捷尔仁斯基和其他参加讨论的人，经常提到列宁的文章，但是他的许多建议不是在沉默中遭到冷遇，就是被视之为时机尚未成熟。这种态度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的特别决议——《关于工农检查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任务》中反映了出来。代表大会并未设立如列宁所建议那样的具有广泛权力、重新改组了的检查机构。虽然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成员扩大至六十人（包括十名候补委员），而其中有五十五人又是首次当选，在人员上确实有了巨大的变化，然而在六十名新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中，有十二人在党政机构中已身居要位，其他人大部分也担负着负责的职务。有四十人是在1898年至1906年间入党的，虽然他们原先大都是农民或工人，但他们已经长时间脱离农村和车间劳动了。列宁在其建议中只简单地提到了“工人和农民”，但没考虑党龄的长短。毋需说，新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地位是无法与中央委员会相比的。

列宁在通常称之为《列宁遗嘱》，即列宁《致代表大会的信》中，告诫全党要警惕分裂的危险。信中他对六位布尔什维克领袖——托洛茨基、斯大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和皮达科夫作了扼要的评述。这个名单上的人绝不是列宁随意想到的，当时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中，肯定还有不少深得人心和有影响的人物。例如，列宁在人民委员会的代表阿历克赛·李可夫，在党员群众中就远比较为年轻的皮达科夫要知名得多。米哈依尔·加里宁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他当时甚至被称之为国家的长老^①，在党内外要比斯大林更为人熟知。但列宁完全清楚，一旦他从政治地平线上消失，党的领导核心，就要由他在《遗嘱》中所提到的这六个人组成，这个核心将由于内部的权力斗争，而把党引向分裂的道路。列宁对这几位领袖的评述，从某一方面来说是非同寻常的：在指出那些使他们成为显赫政治人物的正面品质之后，列宁继而讲述了他们的基本缺点（斯大林“太粗暴”、“不忠顺”，托洛茨基“过分自负”，和“非布尔什维主义”，布哈林搞“烦琐哲学”，他的理论观点不能“算作完全马克思主义的”……）。列宁虽然建议解除斯大林总书记的职务，但认为斯大林仍应留在领导岗位上，因此，他谨慎地建议“把斯大林最好从这个位置上调开”，而不是简单地将其罢免。

在列宁的健康严重恶化后，他再也未能恢复健康。在那之前的最后几个星期里，他常给托洛茨基写信，列宁认为，可以信赖托洛茨基，因为托洛茨基在当时列宁最感到为难的两个问题上——即外贸和民族问题上与列宁持相同的观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列宁认为托洛茨基是他最可能、最理想的接班人。托

^① 俄国农村中对长辈或首领的尊称。——英译注

洛茨基后来在国外撰写的许多书中，曾几度声称他是列宁选定的继承人，甚至奇怪地用这种精神解释列宁的《遗嘱》。如在其自传的第二卷里他写道：

“……列宁计划成立一个与官僚主义作斗争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将附属于中央委员会，我们两人将都是其成员。委员会的宗旨是：它将成为撬开斯大林集团的杠杆，因为斯大林集团是官僚主义的脊柱；其另一宗旨是：在党内创造条件，以便使我成为列宁的代言人，并最终成为他的部长会议职位的接班人。只有这样解释人们通常所认为的列宁《遗嘱》，才能搞清楚它的含意。列宁在那个文件中，列出了六个人的名字，用仔细推敲过的文字评述了每个人的特点。无疑，这份‘遗嘱’的目的，是使我更容易地从事领导工作。列宁自然要在发生最少人事摩擦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①在同一卷的另一处，谈及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时，托洛茨基宣称：

“列宁开创的这个运动，除有他的总政治目的外，还有为使成为领导人，创造最有利条件的直接目的。通过这一运动列宁希望：如果他能恢复健康，则能使我站在他的一边；如果他的健康不能恢复便由我接替他的职务。但是，这场斗争未能完成，甚至连一半路也没有走完，它带来的却是相反的结果。”^②

当然，这一切都是异想天开。这个例子，证实了“遗嘱”中所说的托洛茨基“过分自负”的特点。事实上，列宁从未指定过接班人，也没有明显表示过要这样做的意图。虽然列宁深知他的病情严重，死亡随时可能到来，但他认为，六个最有影响的党的领导人中，无人能独自担起领导全党工作的担子。列宁希望：如果能在这些人中，比较合理地分配一下党和国家的

①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柏林，1930年），第217页。——原注

②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柏林，1930年），第226页。——原注

重要职务（他因此建议斯大林改做其它工作），他们或许能够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严格控制下一起工作，并能在将来极端复杂的环境中领导全党奋勇前进。这就是列宁在其遗嘱中所要表达的意思，里面的每一句话，他都进行过逐字的推敲。在通常情况下，列宁总给人以尖锐的评价，但在《遗嘱》中的调子是和风细雨的，语言也不是攻击性的。然而，这些文字下面，却包含了极其深刻的政治含义。列宁对他的每位亲密同志，都讲了一些恭维话，他称斯大林是“现时中央……卓越领袖”；布哈林是“党内最可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皮达科夫“无疑是个有坚强意志和卓越才能的人”。但列宁接着又对他们每位进行了相反的评论，这些话的寓意是极其严肃的。显然不可能把党的领导权放心地委托给粗暴、没有耐心、不忠顺而且又反复无常的斯大林。过分自负的托洛茨基也好不了多少，因为“他过分热中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加之他还有过一段非布尔什维克的历史。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也负有非布尔什维克的罪名，——他们在十月革命期间有过“当然不是偶然的”背叛行为。领导权当然也不应该落到布哈林手中，因为“要把他的理论观点算作完全马克思主义的，那是很值得怀疑的”。^①列宁很清楚他讲话的分量，以及他对有关干部的意见将被赋予的重要性。如果说他的《遗嘱》有一个基本目的的话，那么，其目的就是他想阻止任何一位被提到名字的人在党内占有如同列宁一样的地位，从而得到积累“无限权力”的机会。列宁打算让党把他的评价当作一种约束力量，作为抑制所有党的头面人物的政治野心和傲慢的手段，使他们保持在某种限定范围内行事。

① 以上引语见《列宁全集》中文版（人民出版社，北京，1959年9月），第36卷，第615—620页。——中译注

这里还应该就列宁写给斯大林的最后一封信说几句话。在这封信里，他指责了斯大林对克鲁普斯卡娅的粗暴态度并要求向她道歉，否则，列宁威胁说，将与斯大林断绝一切关系。信中所涉及的这件事，发生在几个星期前，即1922年12月，政治局讨论对外贸易问题的时候。当时，克鲁普斯卡娅写了一封由列宁口授的信，信中坚持要不惜一切代价地维护对外贸易的垄断。斯大林给克鲁普斯卡娅打了电话。在电话里，他用粗暴的态度斥责了她。^①克鲁普斯卡娅当时觉得不应该把斯大林那些带有侮辱性的话告诉她的丈夫，因而便告诉了加米涅夫。从列宁的信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斯大林那时确实表示了某种程度的道歉，而克鲁普斯卡娅则同意将这件事情忘掉。人们所不清楚的是，为什么克鲁普斯卡娅在事隔三个半月之后，当列宁的健康状况很不好的时候，却旧事重提，将这件事情告诉列宁，况且她明明知道这将给列宁带来多大的不愉快。当时正值“格鲁吉亚事件”^②的高潮，3月5日晚上，斯大林给克鲁普斯卡娅写了道歉信，并由加米涅夫转给了她，但列宁从未看过这封信。第二天，列宁口授了他一生中最后一封信（给穆迪万尼、马哈拉泽等人），其后，他便又一次中风了。

关于列宁写给斯大林的信，以及信中所称他们二人关系破裂的各种流言蜚语，不久便传播开来了。有趣的是，斯大林在其一生中一直保存着列宁的信件，他去世的时候，这封信在他写字台的一个抽屉里被人们发现，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赫

① 斯大林的借口是：她违反了医生的命令，让列宁口述了信件。中央全会曾委托斯大林负责监督列宁的医疗情况。——英译注

② 列宁被斯大林和格鲁吉亚持不同政见的布尔什维克之间继续进行的激烈斗争搅得心烦意乱。格鲁吉亚的布尔什维克反对进入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方式，并谴责斯大林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对格鲁吉亚持不同政见的布尔什维克的粗暴态度。——英译注

鲁晓夫首次公开宣读了它的内容。

列宁不是唯一担心斯大林手中权力不断积聚的人。有证据表明：甚至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之前，许多党的领导人就知道了列宁《遗嘱》，或至少知道了它的基本内容。1923年秋，在基斯洛沃德斯克附近的一个山洞里举行了一次半秘密的会议^①，有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叶夫多西莫夫、拉谢维奇、伏罗希洛夫等人参加。表面上，这次会议是讨论加强党的集团领导问题，而实际讨论的问题是如何找出一个限制斯大林权威和权力的办法。季诺维也夫提议解散政治局，设立一个特别三人小组来领导党，这个小组由斯大林、托洛茨基和他自己组成（他还提议加米涅夫和布哈林也可以代替他）。会上意见发生了分歧（我们看到斯大林还是有支持者的），第一个发言反对季诺维也夫计划的是伏罗希洛夫，然后是布哈林。最后大家决定试探一下斯大林的反应。斯大林在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的闭幕词中，提到了这一件事，他说：

“1923年，在第十二次党代会以后，那些聚会在‘山洞’中的人制定了一个政纲，主张取消政治局和使书记处政治化，即主张把书记处变成由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组成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领导机关。……我对从基斯洛沃德斯克山洞向我提出的书面问题给了否定的答复，并且声明说，如果同志们要坚持的话，我情愿让出位置来，决不声张，也不用进行公开的或秘密的争论。”^②

① 基斯洛沃德斯克已变成领导人的官方休养地，政府在那里有一座疗养院。
——英译注

②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人民出版社，北京，1958年6月），第7卷，第324页。——中译注；季诺维也夫的计划甚至在讨论之前就遭到了托洛茨基的反对，托洛茨基反对“三人执政”的意图，见伏罗希洛夫在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原注

当时，斯大林很有可能被迫“让出”党的实际首脑的职位。然而不久之后，一场与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的激烈争论爆发了，形势随之而改观。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之间存在着不少个人恩怨，结果是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表示支持斯大林，双方联合在一起，共同反对托洛茨基。在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他们成了斯大林的主要辩护人。

列宁为中央委员会内部日益增长的对抗情绪所困扰，他担心这时而明争，时而暗斗的权力之争会导致党的分裂。1923年夏秋两季，列宁的健康状况有明显的好转，他要求克鲁普斯卡娅给他读报。在高尔基^①别墅，克鲁普斯卡娅几乎天天和他呆在一起。虽然这样做，对他的健康没有好处，但拒绝给他读报，情况甚至则要更坏。因此，克鲁普斯卡娅也不得不作了让步。在这几个月间，他接待了几名来访者，然而却拒不邀请斯大林和政治局其他成员。据克鲁普斯卡娅说，这种会面对他来说是“太困难了，以致于难以将话谈完”。E·德拉布金娜在未发表的回忆录中，叙述了列宁如何一连几小时凄然孤坐，独自落泪，不得不忍受着病体和沮丧情绪折磨的情景。

克鲁普斯卡娅告诉我们说：1924年1月19日和20日，她给列宁读了刚刚发表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这项决议总结了与托洛茨基论战。由于决议的措辞非常蛮横，而结论又极其恶劣，列宁听着，他的情绪越来越激动。克鲁普斯卡娅希望他能够平静下来，因而告诉他这个决议是党代会一致通过的，然而这也未能使列宁安心，他在《遗嘱》中所担心的事情正在变成事实。第二天，列宁在极度痛苦中与世长辞了。

时至今日，在苏联境外的出版物中，仍然偶而可以看到声

① 以高尔基名字命名的苏联一城市。——中译注

称列宁并非因为自然死亡，而是被斯大林谋害致死的说法。如1976年《时代与我们》杂志上发表了丽吉娅·沙土诺夫斯卡娅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一个被捕者的秘密》。该文称斯大林谋害了列宁，她复述了前《消息报》和《新世界》杂志编辑伊万·格朗斯基曾讲过的故事。据格朗斯基说，斯大林在三十年代中期去过一次格朗斯基的公寓，当时斯大林醉得不能自制，因而把谋杀列宁的经过告诉了格朗斯基。但所有这些说法都纯粹是杜撰，全部是沙土诺夫斯卡娅或格朗斯基臆造的。^①

逃离苏联流亡国外的一些斯大林的政敌散布谣言说，斯大林对列宁的逝世负有责任。托洛茨基的某些声明，也为这些谣言提供了依据。

七十六岁的鲍里斯·巴扎诺夫写过一篇名为《逃亡之夜》的文章，这篇文章是各种胡编乱造之集大成。^②巴扎诺夫曾是斯大林的秘书和助手，1928年1月1日他越过波苏边界逃出了苏联，当时，这是个极不寻常的事件。1929年至1930年间，他写了好几篇文章和一本书，叙述了他在政治局工作时的情景。其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一直保持沉默，这是因为他深知斯大林有消灭他的敌人的办法，不论这些敌人离苏联的边界线多么遥远。目前，巴扎诺夫正在撰写一本新书，从已发表的章节看，仿佛真伪混淆，写作风格也极其怪诞。

斯大林对国外出版的有关他的文章并非漠不关心，这也是事实。他肯定读过《反对派简讯》——托洛茨基被逐出苏联后出版的杂志，也可能很熟悉巴扎诺夫写的东西，因为此人逃亡前不久还是他的秘书。然而，令人难以相信的是，斯大林会对这些文章如此感兴趣，以致下令说：“要从速将所有新文章航空

① 《时代与我们》，1976年第6期。——原注

② 《新大陆》，1976年第8、9期。——原注

寄给他”，——正如巴扎诺夫描写的那样。从巴扎诺夫对列宁1923年3月5日写给斯大林的那封信的评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并没有费心重读一下该信，虽然它已被复印多次，并且很容易找到。

巴扎诺夫在回忆录里描述了1923年至1925年的斯大林，这段描写有其真实的部分。在他笔下，斯大林是报复心强、粗暴、不受道德准则约束、疑心重重的人；斯大林是手段高超的阴谋家，他诡计多端，极其沉默寡言，并完全能够自我控制；他住在一处相当简朴的，过去是仆人居住的克里姆林宫公寓里。他一贯衣着朴素，对奢侈、享乐或其他舒适消遣毫无兴趣，当加米涅夫已使用一辆豪华的罗尔斯牌轿车时，斯大林还是乘着一辆老式的“卢梭—巴尔特”行驶在莫斯科。虽然斯大林受教育不多，但他善于成功地隐藏起文化知识贫乏的缺陷。在政治局会议上，他发言简短扼要。他避免争论、也很少试图说服别人，而是喜欢简单地总结大多数人的意见。他意志坚强，却又十分谨小慎微，有时甚至优柔寡断。在困难的政治形势前，他往往不知所措，却能够掩盖内心的踌躇；他经常后发制人，而不是起领导作用。斯大林对女人没有兴趣，他一生中压倒一切的欲望就是权力。在打击他的政敌之前，他总是耐心地等待适当时机。他并不愚蠢，一般的常识他是有的。

以上这些描写还是接近斯大林的本来面目的。但是再往下写，巴扎诺夫就开始偏离轨道、按耐不住要添枝加叶了。举例说：他声称，斯大林对科学、文学和音乐全都漠不关心，“对任何事情不感兴趣，从不读书看报”，甚至连自己的讲稿，报告修改稿也不过目。

巴扎诺夫写道：“在我开始工作的最初几天，每天要到斯大林那里去十次，向他汇报政治局送来的各种文件，但很快我就

发现，他对这些文件的内容毫无兴趣，对这些文件的命运也无所谓。当我就一些问题请他批示时，他会回答说：‘你的意见呢？’我就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比如说这件事应送交政治局讨论，那件事应送交某些中央委员处理，或者某个问题还应该进一步研究一下，告诉有关部门再作一些修改，并加强与其他有关部门的协作，如此等等。无论我提出什么建议，斯大林都会立即同意说：“好！就这样办吧！”过了很短一段时间，我就确信什么事也别想指望他了，我必须自己采取更主动的行动。于是我就这样做了。书记处的人对我说，斯大林从来不懂任何文件，而且对书记处的工作也不感兴趣。”^①

那么斯大林感兴趣的是什么呢？按巴扎诺夫的说法，斯大林做的主要事情是：每天花几个小时，通过政府特别自动装置，监听别人在电话里的谈话。这种装置只供有限的几个人使用。这是列宁设置的，目的是为了避开秘密谈话被中央交换台的电话员偷听。后来，一个捷克共产党的电器工程师，在斯大林的办公桌上安装了一个总控制装置，使他能随心所欲地窃听任何电话，而不致引起怀疑。安装这个巧妙装置的工程师，立即被国家政治保卫局^②当做“间谍”枪毙了。从那时起，知道这个要害机密的人，只有斯大林的秘书麦赫利斯、卡奈尔和巴扎诺夫。他们都知此事，但都保持着沉默，因为他们深知泄露这个机密的后果。

巴扎诺夫写到：“斯大林问我，如果这件事被发现了，我是否懂得将会给我个人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我当然知道。这个秘密在斯大林争夺权力的斗争中，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之一，这使他得以监听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之间的一切谈

^① 《新大陆》第8、9期第296页。——原注

^② 即克格勃的前身。——中译注

话，能够了解他们的一切思想和打算——这是异常重要的武器……因此应该明白，哪怕是最微妙地将这个秘密暗示给别人，斯大林也会毫不迟疑地将我消灭。”^①

这一点很奇怪：巴扎诺夫逃离苏联五十年以后，才“回忆”起对斯大林掌握权力作出如此重要贡献的这个因素。

巴扎诺夫的新书中充满了这类臆造出来的材料。为了给人们作进一步解释，他坚持说每次党代表大会之后，斯大林的助手托夫斯图哈都仔细检查秘密投票选举中央委员会使用的选票。托夫斯图哈能从笔迹上认出那些勾掉斯大林名字的人，并且开列出斯大林政治对手的名单，在适当的时候，这些人就会被消灭掉。但是，这个例子说明，巴扎诺夫全然不知道党代会投票程序。在选票上勾掉某个人的名字，并不一定要写上其他候选人的名字（如巴扎诺夫所云）。因此，任何一个笔迹专家，也无法鉴定谁在投票箱里投了哪张选票。在与反对派斗争的年代里，托夫斯图哈坐在办公室，是不可能开出在党的会议上发言反对斯大林的人的名单。无论怎样，根本没有必要这样做，因为所有会议记录，都由基层党组织交到区委会，仔细保存在档案室里。在记录中，不仅记载谁参加了讨论，而且也记下了投票支持反对派的人名。甚至连那些投票弃权的人，也都记录在案，这已逐渐变成一种惯例。不用说，所有区市的党的会议记录，也保存在党的档案馆里了，共青团组织也采取了同样的程序。然而，在1936至1937年间，所有这些字迹已经褪色的文件，都从档案中抽出，根据这些记录，内务部，甚至区市党委会都可以拟出应该被逮捕者的名单。我的一个朋友在1936年被逮

^① 《新大陆》第8、9期，第298页。——原注

捕，因为据揭发，当他还是二十岁的共青团员的时候，对某些决议和一些问题投了弃权票。因此，他被判有罪，并在北方的一个集中营里，度过了十七年，这是我在后面的一章里将要论述的问题。

第三章

权力的积蓄

1924年1月到1929年12月这段时间里，经济发展较快，经济的各个领域都显示出相当可观的增长。但是，经济并非没有问题，没有不平衡和没有危机了。这些年的许多困难都是由于政治领导的错误，计划过程中的失误和负责人的经验缺乏而造成的。然而，也存在不少真正的困难，从根本上说，是和增长与发展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在历史上，一个大国的经济，在新的、从本质上讲是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这是第一次。在欧洲所有的国家中，俄国在“战争和革命的时代”遭受的破坏最严重，在这些年，国力极其虚弱。毫不夸张地讲，国家变成了废墟，许多外国专家预言要把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至少要花十五至二十年的时间。然而，在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①之后，经济马上就惊人的速度得到了恢复，从而驳斥了这些人沮丧的预言。在1926年，工业生产就基本达到了战前水平。同时，农业生产也接近战前水平。至1929年底，工业总产值已比1913年高一倍半，重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甚至更快。煤的产量达到了四千万吨（1913年只有三千九百万吨），铁的产量几乎

^① 新经济政策是列宁为恢复经济而在1921年3月提出的，这一政策允许农业、贸易、小规模工业的私人企业在有限程度上存在，但必须控制在国家手中。——英译注

达到五百万吨（1913年为四百三十万吨）。纺织品、鞋、糖、葵花籽油和黄油的产量，都超过了战前水平。虽然集体化程度还很低（百分之三点九的农户），但到1927至1929年间，农业生产水平已超过战前，谷物生产面积和牲畜数量都恢复到1913年的水平。自从内战以来，人口第一次增长了一千五百万以上，城市恢复了，蓝领工人和白领工人的数量，达到了1913年工人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五。这样，在1929年当资本主义世界面临其最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危机袭击的时候，我们国家却正经历着经济以空前速度向前发展的时期。

在这个时期，国家还采取了紧急措施以克服国家文化落后的状态。文盲成为过去的事情了。小学和中学在全国各地普遍建立起来，随着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的发展，许多新的院校开办起来。由于同很多资本主义大国在经济关系上的正常化，对外贸易也增长了。

然而，这些年政治的发展却经历了一个相当复杂和矛盾的过程。很显然，在这里是不可能对此问题做面面俱到的考察。和我们的主题有关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在二十年代的后半期，共产党在国家生活的各个领域巩固了统治地位，同时斯大林也成功地巩固了他自己在党内的权力。大肆庆祝了斯大林五十寿辰之后，在本来就发展得够厉害的个人崇拜的伴随之下，绝对个人独裁日趋省目。斯大林和他的一派人（其组成在派别之间斗争的每一个阶段，都要经历本质性的变化），在多年党内斗争之后崛起了。初看来，可能这派的胜利相当令人吃惊，因为斯大林战胜的无疑是在智慧上占优势的对手。他们中有许多人，过去在党内，无论是在建党问题上（如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克鲁普斯卡娅），准备革命的问题上，或是赢得内战胜利的问题上（如托洛茨基），都作过更大的贡献。如果有可能在列

宁死后立即进行一次民意测验的话，就象美国在总统选举之前所作的那样，那么，在政治局的全部成员中，斯大林无疑要名列最末。

事实真如斯大林的官方传记所称的那样，他的胜利是由于他为党制订了一条正确的“总路线”吗？任何一位客观的历史学家都会反对这样一个简单的解释。现在人们已经很清楚，在我们论述的那个时期，斯大林对极其复杂的经济和政治问题作出的决定，并不是出自于任何总的路线或杰出的思想。他为了应付当时的问题，常常是从一种方法变换到另一种，有时候干脆是为了适应党内派别斗争的需要。如果说，1924年至1926年，斯大林依靠的是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提出的政策，那么在1928年至1929年，他就又转而依靠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思想了，他把这些思想简化和歪曲得面目皆非，以适应他自己的需要。结果，斯大林在二十年代末期和三十年代初所执行的政策，体现了他对列宁所可能选择的道路的根本背离，——只要列宁再活上十年。

既然是这样，那么怎样才能解释斯大林的胜利呢？他在权力斗争中的主要对手托洛茨基曾写了许多书和文章，以期澄清斯大林取得胜利和他自己失败的原因。但是一个被击败的人，难得具有足够的客观性，去得出一个可靠答案。总的来说，托洛茨基是从新经济政策最初几年间，出现的社会经济状况和政治环境中寻找原因，也从那些年欧洲和亚洲革命运动受挫的国际形势中寻找原因。

在派别斗争白热化的时候，甚至在高峰过后，“左倾反对派”已经相当明显地败北，托洛茨基也被流放到阿拉木图的时候，托洛茨基继续鼓励他的支持者，坚持认为反对派代表了苏联大多数劳动人民的真正利益。托洛茨基致政治局的一封信曾

流传于被流放的一些托洛茨基分子中间，在信中他写道：

“官僚机构所领导的反动派，虽然表面上很有力量，然而由于‘他们自己都搞不清自己在干些什么’，因而，实际上他们已虚弱到不可救药的地步。对这个革命起家，而现在又为自己挖墙角的派别，历史将给予最严厉的诅咒。

“尽管反对派的力量目前显然是弱小的，但是它的伟大历史力量，在于它的手按到了世界历史进程的脉搏，在于它清楚地知道阶级力量的动力，在于它展望未来并自觉地为将来作好准备。”^①

然而，七年以后，目睹了左倾反对派的最终覆灭和它的大多数领导人无条件投降之后，托洛茨基在一本还没有完成的书中，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语调问道：“为什么斯大林胜利了？”然后他提供了下列答案：

“苏联历史的专家势必会得出结论，认为当权的官僚主义者在重大问题上的政策是一连串的自相矛盾，摇摆不定。……认为人们所称的‘左倾反对派’，对在我国发生的一系列变化过程做出了无可比拟的正确分析，并且远为更准确地预示了其发展。

“初看起来，这样断言似乎与如下的简单的事实相矛盾，那就是不能准确预见未来的派别胜利了，更有洞察力的一派反而一次又一次地失败。这种反对意见会自动地跑到头脑中来。但是这种反对意见只能使那些绝对地在理性的范围内思考问题的人信服，他们把政治看作是合乎逻辑的争论和下棋。但是，政治斗争从本质上讲是利益和力量的斗争，而不是争论……”

“人们知道，每一次革命都跟着一次反动甚至反革命，它

^①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柏林1930年）第二部分，第310—311页。——原注

虽则不至把国家拉回到原来的出发点去，但总要意味着人民失去他们所获成果的主要部分。作为一般的规律，第一次反革命浪潮的牺牲者，总是那些在革命进攻时期站在群众前面的先锋和发动者；代之以与以前革命的敌人有联系的二等入……阶级之间关系发生了变化，同样不能小看不久前还要革命的群众，在心理上发生的深刻变化……

“十月革命的无产阶级性质是由世界形势决定的，是由内部力量的特殊的相互关系决定的。但是阶级本身是在沙皇野蛮统治的条件下和落后的资本主义条件下形成的，不是按照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而制造出来的。恰恰相反。因为俄国的无产阶级在许多方面还很落后，当无产阶级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进行空前的跃进，把一个半封建的君主政体国家变成社会主义专政的国家时，在它的队伍里是必然要出现反动派的。外部的条件和事件竞相滋养这个反动派。干涉接着干涉，没有来自西方的直接援助，国家不是处在原来所期望的繁荣当中，而是令人吃惊的贫穷。此外，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不是在内战中牺牲，就是在等级的阶梯上升了几步，从而脱离了群众。经过了一段干劲十足、希望和幻想之后，到来的是一个长时间的疲乏、衰落和对革命成果深深失望的时期。‘平民的骄傲’的退潮为胆怯和野心的泛起让了路。新的统治阶级就是在这个浪头之上应运而生，掌握了权力。

“国际形势也展现出助长这一趋势的强大力量。苏维埃的官僚变得越自信，对国际工人阶级的打击就越沉重（托洛茨基在这里提到了保加利亚、德国、爱沙尼亚起义的覆灭，英国总罢工的失败，中国革命被镇压，等等。）……这些是历史的灾难，它毁灭了苏维埃群众对世界革命的信念，并使得官僚政治作为拯救的唯一可能手段而升得越来越高。

“可以肯定，成千上万的革命战士是团结在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的旗帜周围。先进的工人无疑是同情反对派的，但这种同情停留在被动的阶段。人们不再相信一切新的斗争能带来重大变化。而官僚统治者又不厌其烦地反复说：‘反对派提出为了世界革命的利益而把我们拖入一场革命战争。动乱已经够多了，我们已经赢得了喘息的权力，我们立志在自己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相信我们吧，我们是你们的领袖。’这个给人们安宁的许诺稳固地团结了全体干部，即包括军人也包括文职干部，在疲倦的工人和农民群众中最可能找到响应者。他们思忖着，反对派会不会真的准备为了‘不断革命’而牺牲苏联的利益呢？……”

“反对派发现自己被孤立了。官僚们趁热打铁，利用工人的迷惑不解和被动性，使较落后的阶层与先进阶层相对抗，并且越来越大胆地依靠富农和小资产阶级盟友；在几年的时间里，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就被完全消灭干净了。”

“如果认为斯大林这个不为群众所知的人，能突然从那些具有完整策略的派别中崛起，那将是天真的。官僚们在斯大林发现自己之前就发现了他。他具有一切必要的条件：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的威望，坚强的性格，有限的见识，以及与官僚机构不可分割的联系——这是扩大他自己影响的唯一源泉。起初斯大林对自己的成功感到吃惊。但这是新统治集团的一致反响，它企图使自己免受长期以来的原则约束和群众控制，在处理内部事务时，需要一位可信赖的决断人，在革命关头，群众眼中的二流形象斯大林，如今证明他自己是热月官僚当之无愧的领导人，是他们中的一流人物了。”^①

^① 托洛茨基：《苏联是什么国家》（巴黎1974）第73—76页（1936年草稿复稿本（英语《被背叛了的革命》））。——原注

为了加强这个完全值得怀疑的论据，托洛茨基甚至求助于克鲁普斯卡娅的话：“如果伊里奇今天还活着，他肯定要在监狱里坐牢了。”^① 据称她是1926年对左倾反对派的组织说这番话的。于是，托洛茨基为他自己的失败找到了正当的理由：如果列宁本人都不能在时代的新情况下，阻止官僚主义的堕落，那么托洛茨基和他的一派人，就不应因失败而受到责难了。

上面引用的托洛茨基的逻辑，从表面上看似乎有说服力，但事实上它是矛盾的，有一半是错误的。有人说：“政治是可能事件的艺术。”这肯定是任何熟练解决政治问题的实质。如果情况是象托洛茨基宣称的那样，左倾反对派对俄国正在发生的进程，提出了无与伦比的更正确的分析的话，如果他们能更准确地预言这些进程未来发展的话，那么为什么左倾反对派不能使他们的政策适合他们的分析呢？如果工人阶级和农民在战争、革命和内战的极度紧张之后，变得完全精疲力竭的话，那么让他们休养生息，给他们以安定的机会，使他们能从事田里和工厂里的工作，帮助他们供家人穿衣吃饭，而不是去高喊“不断革命”的口号，不是更加适合吗？！这正是新经济政策的目的。它可能是列宁最伟大的发明了，而他本人又是如此相信这个新经济政策的重要性，说新经济政策正在“被迫不及待地”采用，并可望持续“很长的时期”。不论怎样，新经济政策体现了对列宁在不久以前还一直提倡的东西的急剧改变。他被迫接受这样的事实：与他们的一切期望相反，根本没有赢得世界革命胜利的可能——资本主义在欧洲已经打败了革命运动。列宁也认识到，俄国不能跳过某一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这样做的企图已经在1920年底把国家带到了危机之中，并且注定要走向失

① 托洛茨基：《苏联是什么国家》（巴黎，1974）第78页。——原注

败。他看到工人阶级的疲惫、失望、士气低落。正是从这个“对俄国正在发生的进程作出的正确分析中”，产生了新经济政策。当时设想，这一政策将在与周围的资本主义世界共处的长时期内继续下去，这是在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不管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如何谴责这个“理论”，它不是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发明——列宁最后的著作完全指出了这条道路。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引用列宁在革命至内战时期的讲话和文章，而斯大林和布哈林却引用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

托洛茨基宣称，在二十年代中期，成千上万的革命战士团结在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的旗帜下，这些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仍然相信十月革命的理想。然后他又认为，即使是先进的工人们——无疑是反对派的同情者，也不支持它的政治口号，而且他们的同情也完全是被动的。可以肯定，列宁一次又一次重复的论点是：共产党只有与群众的情绪和愿望保持联系，并在其政策中反映出这些愿望，才能继续掌权。如果成千上万革命者的号召和人民的被客观条件激起的情绪不一致，那要让人民跟着他们走几乎是不可能的。当然，一个没有掌权的党可以经得起人民群众、工人阶级及其盟友革命热情的冷却，甚至是长期衰退的代价，来维护其口号的“纯洁性”。但是一个执政党，如果不顾及大多数人的情绪就只有失败。

1926年至1927年，斯大林采用的观点主要来自布哈林的经济和政治思想。左倾反对派知道这种情况，因而常常把批判的主要矛头对准布哈林而不是斯大林。他们把斯大林视为是站在中间的人，而布哈林和李可夫则是站在右边的人。要批判布哈林的一些经济政策并不困难，举例说，在极其缺乏商品的时候，降低农业税或工业品价格当然是错误的。“发财致富吧！”^①也是

^① 布哈林的这一口号原译为《富裕起来吧！》这里是沿用旧译法。——中译注

一个错误的口号，布哈林本人也很快就抛弃了它。当然，斯大林是没有能力用任何认真的方法纠正布哈林的政策。然而，左倾反对派的错误方法甚至更严重。正相反，他们想提高工业品价格，增加农村的税收负担；他们在向富农和耐甫曼^①发动进攻的口号下，企图加剧城市和农村的阶级斗争。看来，如果列宁还活着的话，非但不会“坐监狱”，而且可能制定出更灵活、对农民更适当的政策，这些是斯大林、布哈林、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都做不到的。但是，如果人们比较一下那个时候（1924年至1927年），存在的各种各样的经济思想，就显然不会有什么疑问，斯大林——布哈林的途径，对农民和工人阶级以及大多数党的活动家更具有吸引力，而不是简单地受到全体工作人员的欢迎（他们毕竟不全是官僚主义者，他们的观点也是不应该受蔑视的）。

托洛茨基是伟大的革命演说家，有时，甚至最萎靡不振的群众，也能被他世界革命的口号带动起来。老布尔什维克P·A在他的回忆中，说过一件发生在1919年的事情：

“在利阿兹斯克一个逃兵聚集地，有几千名逃兵被集中在那里。这是一群吵吵嚷嚷、道德伦丧、没有规矩的乌合之众。当时，我们的警戒人员为数甚少，不知为什么他们没有在当时当地杀害我们。最可能的是，即使要完成这样一个简单的任务，他们也没有能力将自己组织起来。仅仅出于对莫斯科下来巡视的人民委员的憎恨，他们才团结在一起。

“我们将他们带到城外的田野，设法将他们排成方阵，人声嘈杂，如同嗡嗡的蜂群。我们还为从莫斯科来的高个子人民委员搭了一个摇摇晃晃的讲台。过了一会，他乘一辆挺大的黑

^① 对小商人、商贩子的贬称，他们利用新经济政策发了财，因而对国家经济恢复做出了贡献。——英译注

色轿车来了。汽车的铜制部件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他身着皮革大衣，戴着眼镜。令我们吃惊的是，他身上没有带武器，和他同来的人也是一样。他登上危险的、不稳固的讲台，手背在身后，将他清瘦、苍白的脸转向聚集在那里的逃兵。

“骚乱开始了，他们开始喊叫，整个田野似乎都在愤怒中颤抖。

“‘滚蛋！’

“‘他们来命令咱们来了，这群王八蛋！’

“‘滚出去，到阴沟里喂虱子去吧！’

“‘趁你还走得动，快滚吧！’

“‘他没有枪！要是把那该死的眼镜摘掉就好了！’

“‘弟兄们，我们为什么要听这个四眼下流坯的？！’

“我们举起枪，正要朝天齐射，突然，人民委员的声音犹如一声沉闷的霹雳划过了原野。

“‘这是些什么人？’他指着我们这些警卫人员问道，‘我要知道这些拿枪的是什么人？’人民委员的声音又一次从我们头上掠过，就象今日喷气式飞机的轰鸣声。这些逃兵们被他那意想不到的言词惊呆了，站在那里瞠目结舌。

“‘是警卫队。’与人民委员一道来的一个人清楚地回答说。

“‘我命令警卫队撤下去！’他深吸了一口气，眼镜在太阳下闪闪发光，人民委员用深沉和严厉的语调开始讲话，这声音在每个人的胸膛里回荡。

“‘站在我们面前的人不是白匪，而是革命战士！把警卫队撤掉！’

“紧接着是一阵沉默，突然，一顶帽子飞上天空，有几个人高喊‘乌拉！’

“‘同志们，革命战士们！’人民委员的声音在远处回响，‘历

史的进程对我们是有利的，邓尼金匪帮在奥廖尔附近被粉碎了。’

“‘乌拉！’的呼声响彻大地，不到五分钟，他讲的每句话都在群众中产生了热烈的反响。

“‘消灭资产阶级！’

“‘我们要世界革命！’

“‘人人都上前线去！’

“而我们这些警卫战士的存在已被人遗忘了——我们也在呼喊。这是因为年轻人有爱狂热的毛病。当我们看到人民委员的修长身材，他头上挥舞着的拳头，以及身后衬托着的殷红色的夕阳，就象看到了如火如荼的欧洲革命，看到了美洲、亚洲、澳洲、非洲在燃烧着革命的火焰。”^①

P. A并没有提到这位从莫斯科来的面庞清瘦、戴着眼镜、身穿皮革大衣的高个子人民委员的名字。但是这一省略强烈地暗示出，他是在描写人民委员托洛茨基，斯大林从来没有这种做法，即仅仅用他的言辞的力量去唤起群众。

这并不是说斯大林在演说方面没有才能。另一个老党员I·A·萨茨，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从某种程度上说，作为一个宣传家和演说家，斯大林的号召力比那些更有技巧的演说家要高明。这可以做如下解释：斯大林对列宁著作的内容比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都熟悉，甚至比托洛茨基都熟悉。这些人和列宁的关系更为密切，列宁在世时，和他们一起度过的时间较长；他们常听他讲演，与他争论，阅读他刚写完的文章，但他们却很少重读列宁的任何著作。然而，斯大林却仔细研究列宁发表的著作，并且通晓其词句——当需要的时候，他

^① 手稿，未发表。——原注

可以轻而易举地选出适当的语录。斯大林宣称并确信，他这种教条主义的推理方法（即：教义问答法），构成了一种创造性的方法，不过在这里我们不想赘述。这里也不是我们讨论斯大林攻击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地方（虽然这不是自觉或故意的）。要谨记在心的重要问题是，斯大林用把政治讨论变成对教条争论的方法，机智地把他的对手放到了最不利的地位上。而他继续用一种完全令人信服的方式运用语录。”^①

斯大林打败了左倾反对派，并不仅仅因为他的政策对人民大众更具有吸引力，或对大部分党的干部具有吸引力，而在相当大程度上说，是因为这样一个简单事实：即在权力斗争最初的决定性阶段，托洛茨基自愿不介入。当我在这里用“权力斗争”这个词时，并不带丝毫贬义。对于任何卷入政治的人来说，参加权力斗争是十分自然的，也确有必要。关键的因素是选择方法。托洛茨基写道，党的机构之所以支持斯大林，仅仅因为“他是我们党最突出的庸才”，称斯大林对自己的成功也感到吃惊，这个成功“凑巧发生在他身上”等等。这样讲法是完全错误的。事情正相反，斯大林长期以来，就有意投身于权力斗争了，不过有一段时间巧妙地隐藏了他的目的罢了。的确，与三十年代他的所做所为相比，斯大林在二十年代前半期，所采取的手段似乎没有什么可值得特别指责的：他把自己忠实的支持者安插在关键职位上，结成集团和联盟，他散布谣言，搞阴谋诡计。托洛茨基当然知道这些活动，从列宁第一次生病起，托洛茨基就确知，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已经开始编织反对他的阴谋网。然而，由于他自负的性格，认为这不值得认真对待。他知道他在苏维埃俄国是“第二号人物”，他在夺取十月革

^① 手稿，未发表 ——原注

命胜利中的作用仅次于列宁。在内战的整个过程中，他是红军最高司令，因为红军的创建和后来的战绩，他无可争议地有权享有威望。

到1922年的时候，有明显的迹象表明对列宁和托洛茨基已经形成了迷信：在许多机构里，只悬挂着他们两人的像片，在各种各样的组织里选列宁和托洛茨基为主席团的名誉成员已成惯例。托洛茨基当然不会领略不出列宁病情的严重性，而且肯定考虑过列宁去世的问题，以及它对党和国家可能产生的影响。托洛茨基显然相信权力会自动移交给他，中央委员会将求助于他并请他领导党。当时托洛茨基认为，积极地卷入争权夺利的斗争有失他的尊严，即使为这一目的而采取正派和适当的方式也罢。而且在1923年春，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之前，还没有人在这种斗争中的地位比托洛茨基更强。虽然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已经组成了反对托洛茨基的三人联盟，但是他们还没有决定公开化，无论是在代表大会上还是在中央委员会面前。此外，当政治局讨论中央委员会提交党代会的报告的时候，是斯大林坚持让托洛茨基为报告人。主持政治局的加米涅夫支持斯大林提议。当托洛茨基表现出不情愿的样子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和党的其他领导人都动员他接受。但是在讨论开始之际，托洛茨基提出一个奇怪的建议，他说，这次党代会上不应该有报告，以避免在党内产生这样的印象，觉得病重的列宁要被取代。他的建议遭到反对，但托洛茨基拒绝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作政治报告，这个任务委托给了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还拒绝为“格鲁吉亚事件”^①作辩护，尽管列宁曾一再要求他这样做。他已经做了一个总的决定，要避免在这

^① 见第二章注。——中译注

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任何种类的刺激性问题，虽然他深知，要是他在列宁许多信件中任选一封宣读一下，无论是关于民族问题，还是关于垄断对外贸易问题，那么就不会讨论重选斯大林为总书记的问题了。

但是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开过仅仅六个月之后，托洛茨基本人却又发动了一场全党的讨论，提出诸如违反党内民主、暴政及中央委员会在党的建设上的错误路线这样一些问题。在争论开始时，似乎有不少党员——不仅是年轻人，而且包括在党内工作多年的布尔什维克——支持托洛茨基。最初几个星期之后，似乎很明显，由斯大林和加米涅夫领导的政治局，将被迫向托洛茨基让步，并且接受一个妥协的决议。但是，在这几个月里，托洛茨基病重在床，因而不能亲自在学生和工人的会议上发表讲演。而当他恢复辩论的时候，他把这场全党的讨论作为一场学术争论，他忽视了在支持者中间进行组织工作的需要，并且反对其实并不违反党的道德标准的斗争方法。这似乎是企图使党明白，他托洛茨基关心的仅仅是原则问题，而对权力问题没有兴趣。因此，托洛茨基在这样的情况下被打败也就不奇怪了。后来他试图为自己1923年至1924年的行为，提供一个很不能另人信服的解释：

“我直到最后可能的时刻，都在避免斗争，因为在其最初的几个阶段，就具有直接反对我个人的无原则的阴谋性质。我很清楚，这种斗争一旦明朗化，就势必要造成异常紧张的状态，并且在革命专政的情况下，会产生不良后果。这里不宜于讨论以个人作出重大让步为代价，去寻求维持集体领导的原则是否正确，也不宜于讨论是否有必要不管政治基础缺乏，而自始至终采取全面攻势。我选择的是第一种做法，事实就是如此。后来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未使我反悔。有时胜利导致僵局，

而失败反倒打开了新的途径……在深刻的政治分歧出现之后，我努力避免个人的纠缠，而把争论保持在原则问题范围内，并试图阻止斗争的发展，以便有机会用事实检验争议双方的判断和预测。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他开始很谨慎，以其他两人做掩护）正相反，极尽加剧斗争之能事。他们决心不让党有时间去考虑分歧，并在实践的基础上对其加以检验。”^①

然而，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他当时急于取得党内领导地位，这是人所皆知而且是公开的）谁也没有那样讲情面。例如，列宁死后不久，有一封托洛茨基写给施海泽的信落在了他们手中。这封信写于1913年，但被警察截获了，后来与其他文件一起从警察档案中发现，被送到了当时才刚刚成立的党史研究所。这封信中充满了怨恨，对列宁的用语粗鲁不敬。这在流亡者的争论中是十分正常的现象，列宁本人在信中，甚至在发表的文章中对托洛茨基、拉狄克和许多后来的布尔什维克进行评论时，所用语言也都是极端粗鲁的，更不要说他对孟什维克所使用的文笔了（他们中有些人后来也加入了布尔什维克阵营）。但是，当全党都在哀悼列宁逝世的时候——用马雅科夫斯基的话说，在悲痛已经变成“清楚的和自觉的痛苦”时——发表这封信，对托洛茨基的威信是个沉重打击。几乎没有人费心去对比一下写信的日期和发表出来的日期，而在两者间隔的岁月中，一个全新的历史时代已经开始了。所有读到攻击性段落的人都为之一震，托洛茨基竟把对列宁如此不公正的话写给了一个众所周知的1917年孟什维克领导人，1921年经格鲁吉亚投奔西方的十月革命积极反对者。托洛茨基愤怒地谴责说，这种故

^① 托洛茨基：《发生了什么，这是如何发生的？》（巴黎，1929年）第34—35页。——原注

意歪曲的行为是史无前例的最大骗术，其不負責任甚至超过了在“德留福斯案件”中伪造文件的法国反动派。但是他并没有否认，他自己就是那封成问题的信的作者。这封信显然给人的印象是：在伟大的革命领袖刚刚去世时，他就破口大骂。托洛茨基应该了解，这种不加任何说明的办法，会使人们忘掉该信的年代的。

另一个对斯大林战胜托洛茨基起了作用的因素，是二十年代上半期许多党的机构，把斯大林而不是把托洛茨基看作“他们自己的”人，那时，斯大林对党的工作人员态度比较坦率和民主。斯大林注意倾听他们的意见，以此想使他们认为，他已从列宁的批评中吸取了教训。那时他是比较容易接近的，也并不粗暴，而只不过有点粗俗，但这是那些年党的机构中普遍存在的毛病。在这个机构工作的人，没有哪一个堪称具有特别高的文化修养，对他们来说，知识分子界意味着虚弱、怯懦的自由主义，或者没有任何无产阶级不屈不挠的力量。

我从玛丽娅·越飞的回忆录中，摘录了一段话，她不仅是托洛茨基的亲密朋友阿道夫·越飞的妻子，而且只凭自己的资格，也堪称是托洛茨基圈子里的一员。她设法度过了二十八年的铁窗生涯，并于1975年移居以色列。她写道：

“如果说，有什么人对越飞明显不能容忍的话，那就是斯大林。在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患病卧床之前，我们就经常看见斯大林。例如，在大剧院举行首演时，我们曾经在位头头的包厢相遇。斯大林出现时，周围常常伴随着亲密助手——他们中间常有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他的举止象个普通的、愉快的小伙子，对每个人都很和蔼友好，但这都是伪装的。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是这样问候我的：‘啊，玛丽娅·米哈伊洛夫娜，是的，久仰了……’斯大林具有非同寻常的

演员天才，并且能根据不同情况改变脸谱。他最得意的角色是我刚才描述过的那种心胸坦率、单纯的人……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完全了解他的伎俩，而且从不信任他。早在斯大林暴露自己真实面目之前很久，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就了解他的本来面目了……”

按照玛丽娅·越飞的说法，托洛茨基有“象一个知道自己的价值和对其在党内的地位很有把握的人”一样的风度，不象斯大林那样爱扮演各种角色。他为了最终目的，准备和任何人亲近，甚至和敌人亲近。人们感到，托洛茨基在与别人的关系中设立了无形的障碍。他和人们保持一定距离，虽然距离的程度不尽相同，但距离毕竟总是在那里存在着。只是与很少的一些人有真正的密切关系，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就是其中之一。托洛茨基的行为给人以傲慢和不易接近的印象，而斯大林派的干部和鼓动者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来使他丧失威信。但是，没有什么能使托洛茨基改变对自己的自信心。”^①

玛丽娅·越飞把斯大林的真挚和蔼，说成是故作姿态当然是正确的。但是托洛茨基却不是始终忠实于自己的性格的。肯定有许多时候，他也是在扮演一种角色，虽然，在那些年代中，他所选择的“领袖”角色并没有使他在大多数布尔什维克中间获得极大成功。

可以这样说，在与斯大林斗争的最初阶段，托洛茨基仅在1923年春有过些胜利的机会，当时仍然活着的列宁，在他许多最后的信件中不容置疑地同意托洛茨基的意见，这可以成为巨大的力量源泉。但仅仅在几个月之后，尤其是到了1924年，托洛茨基的良好时机已经过去了（当他攻击官僚主义的时候，他

① 《时代与我们》第20期（1977年）第178、183页。——原注

也批评了新经济政策的许多方面)。

某些西方历史学家强调托洛茨基在1924年的地位相当有利，指出他仍然占据着三个关键性职位：红军司令、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以及陆海军人民委员。他们还强调说，1923年至1924年，托洛茨基因为红军在内战中的胜利，仍然是非常受人称赞的英雄，因此罢免他的这些职务是不容易的。在托洛茨基反对派中间，确实有些人希望用军事解决的办法，来处理党内的斗争，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担心到这种可能性。但是，这些历史学家却没有把握形势的本质。红军从不是托洛茨基手中的“驯服工具”。他能够命令进攻华沙，并指望这个命令会被服从，但他却无法领导红军反对在莫斯科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红军在1924年不可能是托洛茨基集团的工具。

著名的国际主义革命者维克多·谢尔盖提出了一个相反的观点。他是许多国家左倾和极左运动的老资格成员，二十年代中期曾住在苏联。他和托洛茨基分子站在一起，并在二十年代末期被逮捕、流放，但是在法国为他发动的一场运动，终于使他于1933年被驱逐出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北非就其动荡的往事写了一篇长文，他争辩说，受到军队支持的托洛茨基，在1924年本可以轻而易举地战胜斯大林：

“一个反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政治局的军事政变是完全有可能的，我们可以肯定反对派们是深知这一选择的。如果托洛茨基走了这条路，军队、甚至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都可以保持住人民的支持。我知道托洛茨基却相反，他反对使用武力，这是出于尊重这样一种不成文法，即在一个社会主义政权内不允许诉诸通常是针对敌人的暴力方式。托洛茨基以后（1935年）写道，用军事行动罢免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是没有什么特殊的困难，而且也不会引起大量流血。但是

其结果可能是官僚主义和波拿巴主义更迅速的胜利，而这却是左倾反对派拿起武器时所反对的东西。”^①

伊里奇·沃伦堡在为谢尔盖回忆录德文版写的序言中，对谢尔盖的这类看法提出了有说服力的疑问。他写道：

“我们对列宁去世前后几个月中，苏维埃国家内形成的真实情况不了解。我当时在德国共产党内担负重要职务，并且是内战时期的专家，那时仍然在德国从事军事工作。我那时的观点与谢尔盖和托洛茨基几十年后所写的很相似。

“但是到了莫斯科之后，我很快就发现了我的错误。事情已经变得十分清楚，例如，象图哈切夫斯基这样的高级红军将领，尊奉托洛茨基为红军的创始人、一个正直的人和一个革命者，而同时也批评他总的思想，图哈切夫斯基后来是我的朋友。

“我被任命领导一支红军部队，先是在一些省里（萨拉托夫和伏尔加日尔曼共和国），以后又在莫斯科。之后我又为总参谋部工作，成为红军中央俱乐部主席团成员。这使我能和军人保持密切接触，并通过他们和俄国农村接触。无疑，高级将领都坚信党的领导，国家政治保卫局也是一样。在党内，毫无疑问有多数人支持三驾马车，即由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组成的执政三巨头。他们的重要性正好是他们名字的先后顺序，斯大林位于最后。

“如果把苏联宪法作些修改，举行一次选举，那么在列宁的追随者中，谁赢得选票的最多数呢？虽然结果是难以得知

^① 维克多·谢尔盖：《革命回忆录1901—1941》（维也纳1974）263—264页（德文版，美因·法兰克福，1967年），法文原版1951年在巴黎出版。谢尔盖1947年死于法国（稍作省略的英文版题目是《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录》（伦敦1963）。——英译注

的，但有一件事可以肯定：考虑到农民和中产阶级的敌意，他们在二十年代早期，已经把托洛茨基当作反对新经济政策的人，所以这些人在选举中，会有压倒多数反对托洛茨基。

“这里有必要毫不含糊地强调一下，因为到目前为止，所有的托洛茨基分子，甚至联邦共和国和其他国家内的苏联问题专家，在谈话中、著作中和电视上都表示了这样的观点，认为托洛茨基在列宁去世后确实是有过‘真正的机会’的。所以谢尔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都相信这一点。”^①

在1923年至1924年的情况下，进行由托洛茨基领导的政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甚至仅仅策划一下都不可能，特别是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谴责了“托洛茨基主义”之后，就更不可能了。但是，在党的领导人和各级干部中，还是开始议论把托洛茨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陆海军人民委员的职务罢免更为稳妥。当托洛茨基开始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他自己主动上前去迎合中央委员会大多数人的希望。在1925年1月中央全会召开之前不久，托洛茨基给中央委员会送去一项声明。他先是试图解释，旨在反对他而发动起来的宣传运动面前，他长期沉默的原因，然后又简短地叙述了与对立面有分歧的主要论点，最后他要求解除他红军总司令的职务。他写了如下的话：

“亲爱的同志们，即将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第一项议事日程，就是地区组织提交的关于‘托洛茨基声明’决议的问题。因为疾病使我不能参加全会的工作，我相信以下简短的说明是有助于考虑这个问题的。

① 维克多·谢尔盖：《革命回忆录1901—1941》第11—12页。沃伦堡是德国革命共产党人，他在二十年代德国起义失败后移居苏联。三十年代初逃到西方。给谢尔盖回忆录写的序言是他的绝笔之作。他于1973年11月去世，卒年81岁。——英译注

“1)我过去相信，现在仍然相信，在讨论中，我完全可能对指责我企图“修正列宁主义”和“贬低列宁作用”的观点，给予十分有力的反驳（在事实和原则的基础上），但我忍耐着不作说明，不仅因为我在患病，而且因为在目前这种讨论气氛中，我的任何有关这个问题的声明，无论其语调和内容如何，都会使争论恶化，使它从单方面的争论，变为更加严重的双方冲突。而现在，仔细考虑了讨论的全过程，我仍然相信，从党的利益的观点出发，我的沉默是正确的，尽管对我进行了大量虚伪和完全荒谬的谴责……”

“8)由于上述原因，我提出这些意见有一个、而且仅仅只有一个目的：让全体会议更容易地解决议事日程上的第一个问题。由于有人反复指责我企图在党内谋求‘特殊的地位’，以及我拒绝服从党的纪律等等。对这些毫无根据的说法又没有进行过认真的审查，所以我无条件地声明：我准备接受中央委员会分配给我的任何职务和工作，或是任何一种置于党的监督之下的没有行政职务的工作。在最近的辩论之后，已无需再说什么，有足够的理由立即解除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L·托洛茨基，1925年1月15日于克里姆林宫。”^①

两天以后，1925年1月17日，中央委员会正式通过了一项详细决议，再次谴责了“托洛茨基主义”和托洛茨基本人。决议列举了由托洛茨基发起的各种各样的党内争论（从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和约开始），决议说：“托洛茨基同志在最近一切重大问题上都不和党站在一起，并且更多的是站在反对党的立场上。”该文件接下去说：

“读了托洛茨基同志1925年1月15日致中央委员会的声

^① 这封信在全会上讨论了，但未见官方记录。曾用俄文在柏林发表，但没有注明日期、地点。全会后，该信在苏联广为流传。——原注

明，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注意到托洛茨基同志准备接受交给他的置于党的监督下的任何工作，同时也注意到，该声明中没有一个字表明托洛茨基承认自己的错误。事实上，他还在坚持其反布尔什维克的纲领，对党也仅限于表面上的忠诚。

“基于以上各点，特别是考虑到这一事实，即托洛茨基同志不顾众所周知的第十三次党代会的决议，再次提出彻底改组党的领导的问题，并继续传播在那次代表大会上，已被完全否定的观点，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决定：

“1) 严重警告托洛茨基同志，布尔什维克党员不应该只是口头上服从党的纪律，而应该真正服从党的纪律，同时要彻底和无条件地谴责任何反列宁主义的行为。

“2) 鉴于以下事实：没有全党权力机构的支持就不能对军队进行有效的指挥；缺乏这一支持，有破坏军队铁的纪律的危险；政治工作人员会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部分成员已提出免除托洛茨基同志的军事职务；以及托洛茨基同志在1月15日声明中，也认识到有充分理由要求‘立即解除他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兹决定托洛茨基同志已不可能继续留在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工作了……

“4) 党内讨论现在结束……”^①

关于季诺维也夫反对派，我们也应该提几句：它后来变成了联合反对派。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于1925年发动了对斯大林的攻击，但不象托洛茨基，他们根本就不可能有成功的机会。季诺维也夫可能早已是个有相当资格的党务工作者了，但他只善于在列宁格勒的党组织内，安插忠于他的干部。虽然加

^① 摘自1925年联共（布）中央一月全会记录。——原注

米涅夫所受的教育要比斯大林好，但他缺乏必要的决心和政治野心，斯大林机智地把他们引出洞来，他们在没有时间准备任何完整和令人信服的纲领的情况下，就以一个“新”反对派的面目出现了。又由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反对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中极为积极，因此从政治上和心理上讲，1925年他们是不可能与托洛茨基结成联盟的，虽然只有这种联盟，才能给他们以成功的机会。当一年以后，他们最终接近托洛茨基时，他们早已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到了那时，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之间的联盟不但未能加强反对派的力量，反而适得其反。虽然联合反对派中，有许多由于过去的功劳而受人尊敬的人，但他们只是几个光杆司令，因为党员群众不信任这个反对派集团。

与反对派的斗争继续了一些时候，经历了数次迂回曲折。最有利的时刻都给错过了。反对派之所以未能提高他们的威望，其主要原因是季诺维也夫的优柔寡断，而托洛茨基又傲慢并轻视组织工作，拒绝在合法的政治斗争中，使用所允许的一切手段。

1927年秋，杰出的外交家和党的活动家阿道夫·越飞自杀了。由于严重的疾病和不可忍受的痛苦，当中央医疗委员会固执地拒绝他去国外治疗的时候，越飞向自己开了枪。他给托洛茨基写了很长的绝命书，并在自杀前一个小时打电话给托洛茨基，要他立即去。但是托洛茨基耽搁了一会儿，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人员在他之前到达，先拿到了这封给托洛茨基的信。托洛茨基当天就知道了这一封信的存在——当时要隐瞒或销毁这样一封信是不可能的——此信很快就交了给他。在附言中，越飞应允托洛茨基在反对斯大林的斗争中使用他的信，并允许他为此目的对信进行修改，如果他愿意这样做的话。越飞写道：

“我甚至乞求你删除所有看来是多余的部分，并增加你认为是必要的东西，再见了，我亲爱的朋友。”但是，政治局决定立即发表越飞的信，托洛茨基没有做任何校订。于1927年12月信被发表。在临死前写的“绝命书”中，托洛茨基的亲密朋友、四十四岁的越飞写下了如下一些话：

“……这个时刻已经来临了，我的生命已失去一切意义，我感到应该离去了……许多年来，由于我们党的现领导奉行不给反对派成员分配工作的路线，他们拒不给我任何工作，不论是党内的，还是政府的，在这些机构里，我本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我的能力。

“起初，我极不情愿地转到教书和研究工作的岗位上，我把自己的一切都贡献给了这一事业，我在变成完全的废物之时，把这种工作当作最后归宿。开始很困难，然而我逐渐对工作有了兴趣，并又开始抱有希望，认为我的生命仍有些意义……

“但是，我的健康状况却越来越恶化了。9月20日，中央医疗委员会为我安排了一次专家会诊。……为我检查的专家们断言……如非必需，我在莫斯科一天也不能多留，没有医疗的情况不能再持续一小时，必须到外国去，进一个适当的疗养院。……

“近两个月过去了，医疗委员会（毕竟是他们安排的会诊）无论对我出国的事情或对我在国内治疗的问题，都没采取步骤。正相反，过去一直按照处方向我提供药品的克里姆林宫药房，近日来也被禁止这样做了，这意味着，我实际上被剥夺了过去一直享受的免费医疗……

“九天前，我终于不得不卧床，更坏的是，我的痼疾再次急性发作，使我受到一种极难忍受的疼痛，……在这九天里，

我没有得到任何治疗。没有一个中央委员会的医生来看我。……这天晚上，中央委员会的医生波琼金通知我的妻子，中央医疗委员会决定不送我出国。……

“达维金科教授相信，病情的复发是由于我在过去的几个星期中所处恶劣环境引起的。我认为，在党内这种情况是不能容忍的，是在默默地屈服于从它的队伍里把你开除这种情况。虽然我绝对相信，一场危机或迟或早必将到来，它将迫使党摒弃那些把它引入这样一种可耻地步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的死是个战士的抗议，他再没有任何其他方法作出反映……我已经落到如此地步，在领导岗位上做了二十七年的革命工作，如今一无所有，只剩一发子弹穿过我的头颅。这不过是要揭示一下党内当权者的本来面目，只是方法不同罢了。……

“亲爱的列夫·达维多维奇，数十年共同的工作，我希望，同时还有私人的友谊把我们结合在一起，这使我在临别的时刻有权利告诉你，在我看来是你弱点的东西。我从没怀疑过你所选择的道路的正确性。……但是我经常感到，你缺乏列宁那种不屈不挠的精神，那种不妥协性。……你在政治上经常是正确的。……但是你常常为了同那些你对其价值估计过高的人，取得一致、取得妥协而放弃自己的正确立场。……我曾多次想告诉你这一点，但只是到了现在我才做到，把它作为我们的最后告别。”^①

我们可以看到，比别人更了解托洛茨基的越飞，都因其优

^① 见《布尔什维克》第23—24期（1927年），玛丽娅·越飞在回忆录中否认他丈夫写过这封信，但没有提供证据，托洛茨基从没就在《布尔什维克》上发表的信的可靠性提出疑问。虽然托洛茨基拿到的只是该信副本，并非原件，但他在回忆录中只抱怨《布尔什维克》发表了该信，而不顾越飞给他全权校订的事实（参见托洛茨基的《俄国局势真相》第181页）。——原注

柔寡断、缺乏决心和回避现实的夺权斗争而委婉地批评他，这些缺点使托洛茨基在与斯大林的竞争中终于失败。

现在我将转向另一个问题，即斯大林在1928年至1929年与右倾反对派冲突的时候会失利吗？

总地说来，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右倾反对派在不少地方占上风，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经济纲领。布哈林和他的支持者所制定的政策有许多缺陷，而这些不足之处，恰在1927年10月份变得极其明显。但是，其大多数都可以在不改变基本方法或不背离新经济政策的情况下得到纠正，新经济政策还远没有过时。无论如何，被党作为“总路线”奉行的新经济政策，正因为以布哈林的理论为基础，才使得1924年至1927年间工农业取得实质性的进步。

但在1927年底，斯大林及其追随者把党的经济政策作了唐突的改变，不仅发动了对富农的猛烈攻击，而且实际上意味着放弃了新经济政策，甚至是恢复了“战时共产主义”的某些成分。所有这些措施，都和刚刚结束的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决定背道而驰。尽管左倾反对派的领导人在这次党代会上被开除出党，斯大林却接过了他们经济纲领的大部分内容，而他自己的建议比季诺维也夫或托洛茨基曾提出的更为极端。

在第十五次党代会后的第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斯大林令人意想不到地请求解除他党的领导职务。很显然，这是为了下一阶段的斗争做好准备，他说：

“我相信，直至最近，党面临的情况使我——一个相当迟钝、却又能作为反对派解毒物的人——有必要担任此职（即，总书记之职）。但是，现在这些情况不复存在。……反对派现在不仅被打败，而且被开除出党。列宁确实有过指示，这些指示我们必须执行。因此，我请求全会解除我总书记的职务。我向

你们保证，同志们，这样做只会给党带来好处。”^①

在斯大林的坚持下，这一建议付诸表决，但遭到一致反对（有一票弃权）。全会把权杖交给了斯大林，而他便毫不迟疑地继续利用这一有利条件。

一开始，反应是混乱的。斯大林对已被接受的原经济政策的突然背离，表明国家开始了全新的里程，开始了一条全然未知的道路。但潜在的、模模糊糊的不安情绪，逐渐变成了明确的不满，这种情绪不仅出现在党的领导人中间，而且出现于党的中下级组织的领导人中间。

早些时候，在1926年，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搞过他们自己的党内思想意识形态派别的划线：按照他们的划法，中央委员会有一个由布哈林领导的“右倾”和斯大林领导的“党内中间派集团”。那时，斯大林和布哈林都强烈地否认他们之间存在任何重大分歧，并且排除在党的最高领导层有“右倾”的思想。然而，斯大林急剧而出人意料地向左转，表明中央委员会中间确实存在一条更为温和的路线，有些更为温和的领导人，他们的为首者，正如事实所示，就是布哈林。

那时，尼古拉·布哈林在党内掌握着巨大的权力，1925年至1927年间，人们认为他是布尔什维主义最杰出的理论家是有道理的，甚至可以说，在左倾反对派被打败之后，出现了一种“两巨头”执政的局面，这“两巨头”就是斯大林和布哈林。在他们的伙伴关系中，斯大林是强者，然而那时他并没有值得注意的企图，要在党内过分强调他的个人优势。

布哈林的地位当然也是非常强的。他担任政治局委员的同时，还担任共产国际主席的职务，并且还是《真理报》和《布

^① 摘自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会没有发表的记录。——原注

尔什维克》杂志的总编。1928年版的《苏联小百科全书》第一卷中收有布哈林如下的小传：

“布哈林·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生于1888年），联共（布）领导人和理论家之一，党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委员，《真理报》总编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作为联共（布）最著名的人物之一，布哈林还是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和它最有权威的人物之一。从共产国际建立起，他就在共产国际各次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上和其它工作中起着积极的作用，针对所有最重要的问题，他都作过报告。联共（布）的队伍中，布哈林占有最重要和最突出的地位，并且是党内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他情绪饱满，充满活力，急于接触生活的各种侧面，善于从最抽象的理论开始，而以木棒球游戏^①来结束他的文章和讲话。他在讲话和文章中常爱‘打趣’，但用他自己的个人行为标准来看，他是个严于律己的人，而同时又能宽容同志的小缺点和失误。他是个严厉的、言辞尖锐的辩论家，在与同志的关系中却富于柔情。还应该提到的是，他真诚，有才智、博学、具有迅速抓住其他人思想的能力和经久不衰的乐观精神。所有这些品质，使布哈林成为俄国革命最受爱戴的人物之一。布哈林有卓越的抽象思维能力，在他的著作中，布哈林阐述了经济理论问题，他的活动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在这些问题上，布哈林表现出对这一少有发现的领域极为精通。布哈林能够对引起他兴趣的许多理论问题，作出新的引人入胜的贡献。……”^②

注意，这些对布哈林的描述，不是为了某种特殊的需要而作的赞美之词，在通常干巴巴、索然无味的百科全书词条中，党的其他主要人物，都没有用如此热情亲切的词语加以刻画。

^① 一种类似地滚球的游戏。——英译注

^② 《苏联小百科全书》第1卷（莫斯科，1928年），第11—12页。——原注

二十年代末期，布哈林有许多朋友和支持者。出身所谓“布哈林学派”的学生们，在党的领导机构中，占据了宣传鼓动部门的要职，还在党的教育系统担任了主要职务。政治局内，布哈林的两个最重要的政治盟友是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李可夫是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劳工和国防委员会主席，这是两个关键职位，在列宁逝世前一直由列宁担任。托姆斯基则负责工会委员会的工作。

明显同情布哈林较温和路线的著名中央委员中有：加里宁、彼得罗夫斯基、斯米尔诺夫、卡明斯基、楚巴尔、乌格拉诺夫，甚至还有米高扬。他的政策还得到了许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高级将领和军官的支持。在中央委员会的某些秘密会议上，甚至象伏洛希洛夫和雅哥达这样的人，也多次提出过反对斯大林的提议。

然而，右派领导人却未能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实践证明，他们的主要领导人，首先是布哈林本人，不具有政治家的气魄。布哈林善长理论，而且是令人倾倒的人物，但他太温和、太殷勤，以至于不能领导一场反对斯大林的派别斗争。事实上，1928年至1929年间，党内根本就没有组织起来什么右倾反对派这样的东西，布哈林也从没创立任何类似的党的宗派，虽然这样做是完全可能的。布哈林的支持者们，甚至未能召集全党范围内的辩论，虽然按党章规定，在党的领导层内出现分歧时，应该进行这样的辩论。布哈林也从没有设法设计过任何类似左倾反对派在1925年至1927年间曾反复提出过的总纲领。

1927年12月斯大林提出采取“特别措施”，反对富农，这一提案在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的投票支持下被采纳了。1928年5月布哈林在“布哈林学派”（马列茨基等人）的支持下，开始谨慎地批评斯大林的新政策。1928年年底，当斯大林提议，

在下一次谷物收获期间，继续采取“特别措施”的时候，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才站出来表示反对。然而斯大林的计划，在政治局获得了多数而被通过。

尽管右派是被动的，但斯大林地位的脆弱性，不久就变得很明显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定转向前左倾反对派，以寻求他们的支持。左倾反对派至此还认为，右派比斯大林周围的中间派集团对革命的威胁更大。就是在这个时候，托洛茨基在其一封信中声称：“支持斯大林反对布哈林吗？对。支持布哈林反对斯大林吗？不！”

毫不奇怪，很多左倾反对派的领导人，看着斯大林与布哈林之间的争斗，颇为幸灾乐祸。后来，为了支持斯大林集团反对右派，他们甚至开始回到党内。然而，如果说在这些具有决定意义的月份里，正在出现一场真正的政治斗争是错误的。虽然布哈林确曾给政治局委员们发送过一封密信，阐明他的观点；虽然他在私下开始称斯大林为托洛茨基分子；虽然几个批评政治局新政策的文件，在党的领导层中广为流传；以及1928年中央委员会七月全会之后，布哈林确曾几次企图作一些组织上的准备，并指望在政治局内和全会上获得多数；虽然这次全会以妥协结束，布哈林认为全会的某些决定是他那一方的胜利，然而纵观全局，全会并不是布哈林的胜利，他也没有占优势，事到后来，还是斯大林加强了地位。

1928年9月30日，布哈林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他著名的《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对强迫工业化和斯大林其他经济政策的反对意见。对此，政治局以多数票通过了一项谴责性的决定作为反映。从那时起，斯大林便对右派发起了攻势。布哈林的许多支持者，被撤掉了党报和杂志编辑的职务，很多在与意识形态领域有关的机构中工作的布哈林

分子也被撤换。布哈林和他的盟友对这一攻击只进行了有节制的反抗。

如果说列宁格勒党组织是季诺维也夫左倾反对派的堡垒，那么，1928年右派的堡垒则是以乌格拉诺夫为首的莫斯科党组织。1928年秋季，斯大林的亲信们，在他明显地但又是隐蔽地支持下，开始将注意力转向乌格拉诺夫和莫斯科党的领导人方面。在乌格拉诺夫命运交关的日子里，布哈林在基斯洛沃德斯克^①度假，他只是被动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但却没做支持他盟友的任何努力。回到莫斯科后，布哈林曾在政治局会议上几次发言反对斯大林，但总地来说，全党根本没有听到他的反对意见。在斗争中，他使用了一个战术武器，因为他的政治资本还十分雄厚，而斯大林也尚未作好丢开布哈林的准备，布哈林以辞职相威胁。在使用行之有效的幕后手段挖右派墙角的同时，斯大林作了一些形式上的让步，布哈林很快便发现自己到处——包括在《真理报》编辑部——处于一种少数派的地位。工会组织内，托姆斯基在许多关键性问题上也遭到了失败，1929年夏季，他被解除了工会理事会主席的职务。接近1928年年底的时候，局势已很明朗，虽然对各项问题并未进行任何公开的讨论，但斯大林对右派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只是到了这一步田地，在遭到政治失败之后，布哈林才打破了沉默。他发表了几篇批评斯大林政策的文章，然而却没有点他的名。在政治局会议上，他只是详细地批判了这些政策，并与托姆斯基和李可夫一起，草拟了一份新的政治和经济计划（即所谓“三人政纲”）。这一计划在政治局会议上（由李可夫）宣读了，但它没有提交全党讨论，甚至也没有送交中央委员会。

① 一个温泉休养地。——中译注

虽然对五年计划的最初目标右派提出了质疑，然而斯大林于1929年2月，却突然提出把五年计划的工业指标进行大幅度修改提高。与此同时，他还建议强迫加快集体化的步伐，并进而提出，为确保更迅速地实现工业化，应提高向农民征收的“税额”。这些完全是鲁莽和不现实的建议，却又一次得到政治局多数人的支持。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投了弃权票，并再一次要求解除他们的职务，但他们的辞职未被接受。

只是在1929年中央委员会四月全会上，布哈林才试图与斯大林公开对抗。在会上，他谴责斯大林对农民进行军事封建主义的剥削，毁灭了新经济政策，恢复了官僚主义国家，对农民进行掠夺。布哈林义正辞严地谴责了斯大林提出的论点，即我们越接近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就要变得愈加尖锐。布哈林说：

“这个奇怪的理论，把一个经验上的事实，即现阶段阶级斗争的激化，上升到我们事业发展的无法避免的法则。按照这个奇怪的理论，似乎我们越接近社会主义，困难就会越大，阶级斗争会变得越来越尖锐，在社会主义创建之初，我们便不得不开始一场内战，否则就会倒毙路旁，在饥饿中死去。”^①

但是，布哈林的发言和四月全会的大部分速记记录，从未在苏联发表。1929年4月，布哈林不顾自己被选入大会主席团，而拒绝出席四月全国党代表会议。^②

因此，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布哈林和他的政治盟友们其实并未对斯大林作任何认真的抵抗，就放弃了阵地，就象托洛茨基在1923年那些具有决定意义的月份里，放弃了夺权斗争一样。

美国历史学家斯蒂芬·科恩对二十年代末的党内斗争作出

^①摘自联共中央未发表的全会记录。——原注

^②即1929年4月召开的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会议。——中译注

了十分精辟的分析，他写道：

“那么，如何解释斯大林对布哈林所取得的压倒多数的胜利呢？有几个情况是有利于总书记的，其中最重要的是：斗争范围狭小和斗争的非公开性。这个由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帮助促成的形势，把斗争限制在党的统治集团内部。在这里，斯大林的力量最大，而布哈林集团却力不从心，他的力量在党的高层领导圈外，甚至在党外。”^①

斯大林和他的亲信，常称右派奉行的是“富农路线”，把布哈林本人则说成是富农资产阶级的代言人。的确，布哈林比较温和的路线，对苏联的资产阶级“耐普曼”来说，更有号召力，就象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对这一阶层的人来说，比“战时共产主义”更为可取一样。然而从废除“战时共产主义”中得益的是谁呢？继续“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只会把布尔什维克统治和无产阶级专政置于死地。因此，声称布哈林集团奉行的是“富农路线”完全是荒谬的，蛊惑性的宣传。布哈林的路线不但得到了富农的拥护，也得到了大多数中农，大多数工人的支持，以及在党的工会组织中工作的大多数下级工作人员的支持。城市中多数群众也同情他的观点。人们尽管可以给这些集团和阶层贴上“小资产阶级”的政治标签，然而，再多的标签也改变不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代表了个国家大多数人们的要求，而没有哪一个值得尊敬的政治家有权忽视他们的愿望。

正如科恩正确指出：

“布哈林的悲剧，他的政治困境的关键在于：他不愿诉诸于人民的感情，呼吁得到人民的支持。而问题越是涉及全民，他

^①斯蒂芬·F·科恩：《布哈林和布尔什维克革命》（纽约，1973年；伦敦，1974年）第322页。——原注

就越不愿意这样做。他之所以如此，也许可以这样简单解释：出于布尔什维克的教条，他认为把政治问题搬到党外，即使不是真正的反革命行为，起码也是非法的。带有这种观点的人，担心直接求助于人民是搞派别活动，这可能会导致‘第三势力’的出现，而党由此遭到毁灭。这种担心是多数人所共有的，也为反对派所具有。从这一观点得出了这样一个原则，即党内的争论，甚至不应该在非党群众面前讨论……。斯大林的路线当然是极其不得人心的，从经济上讲则是灾难性的，虽然如此，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在全国面前却仍然保持沉默……（布哈林）正是出于这种担心，才不愿同斯大林进行斗争。因为领导阶层之外的政治活动是可疑的，……因此，他一直维护‘党的团结和党的纪律’，遵守他自己帮助规定的、在狭窄范围内进行难以忍耐的政治活动原则。他回避公开的‘派别活动’，因而被逼得只好去搞‘见不得人的’阴谋诡计，……这样便很容易为他的敌人所利用。他的立场从政治上讲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极端憎恶和蔑视斯大林及其政策，同时他却又是一位有节制的、被动的反对党人。

“布哈林向公众的呼吁过于伊索寓言式了，这样的呼吁，当然未能产生任何效果。除这一原因之外，另一原因是：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与斯大林一起，把他们之间命运攸关的斗争，局限于‘一个很小的私人范围内’，因而这场斗争被‘压制在党的背后’，斯大林的胜利必须以此来解释。”^①

布哈林曾把自己说成是“俄国最差的组织者”，正因为如此，他才无法在党内建立一个有效的派别。另一方面，斯大林却精通党的组织工作。应该记住，二十年代末期，斯大林尚未

^①科恩：《布哈林和布尔什维克革命》第323—325页。——原注

掌握无限的权力，重大的决定都是在一个二、三十人组成的领导班子中作出的，这个班子内，包括中央委员会的某些关键人物，即最重要的省级党组织领导人。

科恩写道：

“作为国务行政管理机构和政治家，他们经常与总书记来往。然而，他们中的大多数却并非是他的没有头脑的政治奴隶，而是凭其本身的资格成为重要的、有独立见解的领导人。这些人坚定、讲求实际、关心国家大事，他们共同的注意力，越来越集中于如何将苏联变成现代化的工业国，这种愿望由于1927年遍及全国的战争创伤和1928年出现的谷物危机，而变得愈加强烈了。布哈林和斯大林之间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争夺这些领导人的支持，在斗争中，观点和“论据”起主要作用。

1929年4月，这些有影响的人物选择了斯大林，并使他在高级领导层中，获得了起决定作用的多数。看来很清楚的是，他们之所以这样作，并不是因他握有官僚主义的权力，而是因为喜欢他的领导和政策。他们的选择，无疑表明了总书记和他们这些强有力的‘实际的政治家’是一样的，而温和的、具有理论头脑的布哈林，看上去不过是一个孩子。”^①

许多高级领导人确实是误解了布哈林的纲领。这个纲领当然并非无懈可击，考虑得也并不周密，其中不少建议明显地违反了正统布尔什维主义的信条。此外，是布哈林的政策导致了1925年至1927年的谷物供应危机，而斯大林和布哈林都未能找出一个适当的解决办法。布哈林的某些建议带有悲观主义甚至失败主义的色彩，暴露出右派在许多方面都有失策的地方。布哈

^①科恩：《布哈林和布尔什维克革命》第327—328页。——原注

林等人打算改变现行政策，但他们的目的绝不是把斯大林搞下台，因为他们自己也害怕承担责任。

许多党的领导人对斯大林的建议比对李可夫、布哈林那种谨慎、优柔寡断的方法有更深刻的印象。在共青团领导人中，也明显地存在着类似的态度。起初，共青团领导人在相当程度上同情布哈林。这些人首先关心的是生产迅速增长和尽快找出解决危机的办法。他们未能预料斯大林的政策，到1932年和1933年将不可避免要导致的局面，而跟随了他。

总之，中央四月全会之后，报纸上对右派进行了几个月的激烈谴责，随后右派的反抗便被彻底击溃了。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被迫投降并书面承认了他们的错误，肯定了中央委员会的一切决定。临近1929年年底的时候，局势已很明朗，斯大林在中央委员会再也没有敌手了。斯大林五十岁生日之际，在中央委员会的贺辞中，他被称之为“列宁最优秀的、最忠诚和坚定的学生和战友”，变成了列宁在十月革命那些日子里“最亲密和最忠诚的”助手；正是斯大林被党派往“内战中最有决定意义的前线去组织胜利”；他们对他说：“正是你，而不是别人，把深刻的列宁主义理论与敢于在不同的革命斗争阶段实践它的能力，集于一人之身，使党以最小的代价和力量，完成了最困难的历史任务；使党保持了真正的列宁主义的团结。”^①

斯大林作了如下答复：

“我把你们的祝贺看作是对按照自己的形象诞生了我和培育了我的伟大的工人阶级政党的祝贺。……同志们，你们可以相信，我决心今后继续把我的全部力量，把我的全部才能，必要时把我的全部热血一滴一滴地献给工人阶级的事业，献给无

^① 《斯大林五十周年寿辰纪念文集》（莫斯科—列宁格勒，1929年）第8—11页。——原注

产阶级革命和世界共产主义的事业。”^①

但这只不过是些空话，斯大林并未打算把他的热血贡献给共产主义事业。相反，正如其后十年所证明的那样，他为了保护 and 扩大他个人的权力，而作好了一切准备。为此，工人、农民、共产党员和非党人士的鲜血汇成了血的河流。

①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125页。——中译注
《斯大林五十周年寿辰纪念文集》第271页。——原注

第四章

对农民开战

三十年代初期是工业迅速发展的时期，特别是重工业和电机工业。虽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几乎都没有按计划完成，更不用说斯大林“迅速工业化”的一九二九年计划。但是工业生产还是相当地扩大了，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和衰退相比，这还是个给人以特别印象的成就。但是借助政治术语来说，主要的戏是在农村演出的：这些年正是斯大林式的农业集体化和“富农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的年代。

1920年，经济学家、合作化运动中的著名人物A·V·查亚诺夫用笔名伊万·科莱姆涅夫，在莫斯科出版了一部书，题目是《我的兄弟阿列克塞到农民乌托邦的国家去旅行》。那一年农村和城市的关系不断紧张，农民起义的浪潮席卷全国。他描述了这一冲突的进一步发展，查亚诺夫预言农村最终将征服城市，而第一步农民将获得平等的投票权，并用议会手段取得控制权。到1932年，俄国的权力就会牢牢地掌握在农民党手里了，他们将颁布许多政令号召逐步摧毁城市。1937年，城市人民起义抗议乡村的统治，但是起义被击败了。在此基础上，随着城市被乡村所包围，城市开始逐渐地解体。到1984年，俄国就会变成

一个完全由村庄和耕地组成的国家了！^①

结果证明，城市和农村关系的发展有几分象科莱姆涅夫——查亚诺夫的形象。现在有大量文章，论述集体化过程中斯大林的错误和罪行，我在《让历史来审判》一书中详细地论及了这个问题。我们不必再次重复已经熟悉的问题，我仅想在这里指出，集体化和爆发一场新的反对宗教和教会运动之间，有一定的联系。^②

在教会和国家的关系经过了一个平静时期以后，1928年又出现了激烈的反宗教运动，到那年秋季，所有的迹象都表明，反对教会的恐怖浪潮出现了。俄国东正教会并非唯一被反对的目标，无一例外，所有的宗教组织和团体都受到了迫害。于是迅速工业化和集体化的猛烈冲击，就与用武力根除“宗教迷信”的企图合流了。在1928年到1929年间，修道院全部被封闭，其中有许多这类修道院^③在当时起着模范农业合作社作用，成千上万的修道士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929年年终，中央委员会举行了一次反宗教会议，几天之后，全俄第二次军队无神论者大会又接踵而来。随后就是反宗教恐怖的急剧升级，但焦点却从城市转向农村。很明显，宗教被认为是集体化的主要障碍。因

① 1975年11月27日的巴黎流亡者报纸

《俄罗斯思想》曾提及查亚诺夫这本书。查亚诺夫死得很惨。他被指控参加了所谓“劳苦农民党”（这个党根本就不存在），1929年被捕，经秘密审判后处死。苏共二十大以后，查亚诺夫的妻子O·E·古列维奇向苏联检察院陈请为她的丈夫平反。一位检察官回答说：“犯罪事实确实不存在，但是我们不能为他平反，因为中央没有指示我们重新审理1929年到1931年的案件。”——原注

② 米哈伊尔·阿古尔斯基在他的长文《斯大林主义的再认识》中，探讨了集体化运动中这方面问题。我下面的论述有很大一部分参考了他的材料。他的这篇文章1973年写于莫斯科。阿古尔斯基现居住在以色列。——原注

③ 俄国有些修道院的修女等从事手工业劳动，有的修道院就是合作社性质的农场，以出卖牛奶、奶制品为生。——中译注

此，在任何村子里，进行集体化的决定中，通常都同时包括关闭当地教堂一项。圣像照例是要没收的，并且要同其他用于宗教崇拜的物品一起烧掉。许多并不很富有的农民，试图阻止毁掉他们的教堂，但是他们自己却被逮捕、流放了。在集体化运动中，成千上万遭殃的人，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而是因为他们信仰宗教。

1930年初，反对教会的恐怖运动达到了令人难以相信的程度。迫于压力，科学院通过了一项特别决议，决定取消对几乎全部与“宗教崇拜”有关的国家历史文物的保护。在诸如特维尔、下诺夫戈罗德、普斯科夫、诺夫戈罗德、萨马拉和维亚特卡这些古老的俄国城市中，教堂和修道院都被拆毁了，其中有一部分建筑遗产是国家的无价之宝。莫斯科遭受的破坏更是骇人听闻，甚至克里姆林宫内的教堂都遭到破坏，而不顾卢那察尔斯基和叶努基泽^①的强烈抗议。第一个重大的破坏行动就是拆毁初多夫修道院。这个时期最后被推倒的建筑物是两所小教堂，一所是森林中的“救世主教堂”，一所是“康斯坦丁与叶莲娜教堂”，这样做真是不可思议，这两个教堂对任何人都没有妨碍。

I·A·萨茨曾是卢那察尔斯基的秘书，他参加了卢那察尔斯基死后在他寓所的文件分类整理的紧急工作，这一工作是在党中央档案馆主席的监督下进行的。萨茨言称曾经找到过政治局的一项经斯大林签署的决议摘要，其中说：“卢那察尔斯基同志关于在克里姆林宫发生捣毁事件的信，从内容上到形式上都是错误的，是与党员称号不相符合的。”红场上的伊沃斯基门和教堂均被拆毁，尼柯尔斯卡娅大街（现名为10月25日大街）街

^① 叶努基泽是列宁时代的老干部，曾被流放西伯利亚，是斯大林的夫人娜·阿利卢耶娃的教父，后因反对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政策而被镇压。——中译注

角上的教堂也同此下场。所有的建筑师都表示反对，可是当时的莫斯科党组织领导人卡冈诺维奇却说：“我的审美观要求游行的队列可以从莫斯科的六个区同时涌入红场。”^①

许多教堂公墓也被破坏了，特别是那些贵族的古老墓地，那里有许多墓碑是珍贵的艺术作品。

阿古尔斯基写道：“反宗教恐怖活动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以致1930年1月，教皇庇护六世呼吁全体基督徒把3月16日作为俄国受迫害的教徒的祈祷日。不仅大多数基督教会响应了这一呼吁，有许多犹太教团体由于听到犹太教被迫害的消息而震惊，特别是在听到二十五名犹太教士在明斯克被捕的报道之后，他们也参加了这一宗教活动。国外的抗议运动已经达到了开始威胁俄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的程度，当时要求和苏联断绝关系的呼声由四面八方涌来。”^②

无疑正是这种广泛的抗议运动，使斯大林停止了反宗教的恐怖活动，并且对错误多少做了一些表示，他对某些地方上的“过火行为”提出了批评。斯大林在1930年3月2日《真理报》上发表的《胜利冲昏头脑》一文中写道：

“至于那些从拆下教堂的钟着手组织劳动组合的所谓‘革命家’，那就更不用说了。把钟拆下，——这该是多么革命呵！”^③

3月15日，在教皇号召进行的世界范围祷告的前一天，报纸上发表了中央委员会《关于在集体农庄运动中违背党的路线的行为》的决议，这个决议的要点之一就是承认：教堂是因为行政命令而封闭的，但这是地方当局的错误，这些“过火行为”

① 摘自I·A·萨茨《回忆散记》未发表的手稿。——原注

② 米·阿古尔斯基：《斯大林主义的再认识》第10页。——原注

③ 《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12卷，第198页。——原注

受到了严厉的谴责。决议恫吓要对任何侵犯宗教信仰的人进行严厉的处罚。这一切，无疑是在世界公众舆论面前的退让。反宗教恐怖虽然暂时停止了，但却没有人采取任何措施修复那些夷为废墟的教堂，也没有允许大批被送到西伯利亚的教徒回来。后来知道，在1930年，有百分之八十的农村教堂被关闭，同时大量神父被划为“富农”而流放。

1930年到1931年实行的“非富农化”意味着什么，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准确的说法了，甚至从苏联的文学作品中也能看到这一点。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中，引人注目的情节是与现实生活相吻合的，它表明了富有的哥萨克家庭是怎样遭到放逐的。在潘菲洛夫的小说《布鲁斯基》中，有许多再现古代野蛮主义的可怕情节。六十年代，扎里京也选了集体化作为主题，但却是以一种全然不同的方式来描写的。以下一段故事，出自A·M写的一篇未发表的小说，作者曾参加过集体化运动。1930年，他是派往农村“帮助”进行集体化的特别工作队的一个成员，他还参与了把富裕的农民，以及一些拒绝参加集体化的贫农赶出家园，强制送往俄罗斯东部^①的活动。他写道：

“门开了，工作队冲进了屋子。领头的是负责这次行动的国家安全总局的军官，他手里握着左轮手枪。

“‘举起手来！’

“摩甘诺夫几乎不能辨认出这个身躯虚弱的‘阶级敌人’，他光着脚，穿着白色的长袍和黑色的内衣，长久没刮的脸上，支楞着乱蓬蓬的胡子，眼睛吓得睁开老大，朝四下张望着。满是皱纹的脸上露出畏缩恐怖的表情，粗糙、褐黑色的手在颤抖，在他裸露的胸前，一个小十字架挂在磨旧了的链子上，由于年

^① 俄罗斯东部即西伯利亚。——中译注

代久了，十字架已变成了黑色。①

“上帝保佑，发发慈悲吧！”

“满身寒气的不速之客，从敞开着的门走进了热气腾腾的小茅屋。消灭富农工作队的队员们已在每个窗前站好，人人声色俱厉。他们以为会发生什么可怕的搏斗，因而早就准备好为了他们的事业，为了苏维埃，为了社会主义而投入战斗。但是富农分子特连捷夫根本没想抵抗。他不住地眨眼，划着十字，不停地把一只脚抬起来，然后又把另一只脚抬起，好象踩着烫脚的东西。突然他开始抽噎，整个身体由于剧烈的喘息而颤抖着。他蹒跚成一个奇怪的姿势，哆嗦着，闪闪发光的小泪珠一个接一个地从他那粗糙、饱经风霜的脸上淌了下来。他的那位已经一把年纪的妻子，从高高的木榻上跳了下来，开始嚎啕大哭，孩子们也跟着哭喊起来，躺在炉边上的一头小牛病得不轻，也在那里乱舔。摩甘诺夫环视了一下周围，心中不禁一震：这个茅屋只有一间房子和一个俄式大炉子。在屋角上挂着的圣像下面，有两把简易木凳和一个用木板架成的桌子。没有梳妆台，也没有床和椅子。在木架上有些简易的木碗，由于使用多年已经破旧不堪，还有几把老式的木勺。炉子边上有些炉叉和水桶，左边靠墙放着一只老式的大木箱子。

“阶级敌人！”

“当局的代表通知特连捷夫，他已被逮捕，并要立即被流放。所有财产都将被没收。他的家庭不久也会跟去，但他们将去何处却不得而知。而他只能带走身上穿的衣服和一件换洗的内衣。

“特连捷夫颤抖地哭着说：‘你们凭什么叫我富农？为什么？’

① 这里指的是银制十字架。——中译注

我做了什么？”他没有得到回答。他们野蛮地砸开锁，打开箱子
和食品柜，拽出了一些鞋袜、麻布和吃的东西。

“为什么？我做了什么？”

“没有什么，你是个富农，是个富农分子，你反对集体农
庄，你不想加入集体农庄，每一件事情你都捣乱。这些还不够
吗？”说着，他们就动手登记他的财产了。”^①

从最近公布的数字看，1930年共计有十一万五千富农家庭
被流放到国家的边远地区，1931年有二十六万五千八百户。
——两年时间内被流放的家庭总数近三十八万一千户之多。^②
那时候，农民家庭一般都较大，大约每家平均不少于六、七口
人。因此，即使基于官方的数字，大约也要有二百五十万人被
流放。政府的官方材料也通报过，到1932年对富农和“富农分
子”的流放工作还在继续。除了被送到国家的边远地区的家庭
以外，还有许多家庭被转移到本地区的其他居民点居住。但是，
我们有理由怀疑所有这些统计数字是打了相当的折扣。

把几百万人流放到边远的地区，并不一定意味着肉体消
灭。虽然死亡率很高，特别是在最初的两三年间，然而还是有
许多流放者设法活了下来。在战后允许他们自由迁徙时，他们
的子孙大都在城里找到了工作。1951年到1954年，我在斯维尔
德洛夫斯克地区的维斯姆斯基区一所学校里教历史。我们学校
里有一些学生住在设备完善、生活方便的工人住宅区，这些住
宅区属于一家大型的白金和钻石矿。另一些学生则住在从俄国
中部流放到这里的富农的特别居住地。在矿上工作的乌拉尔本
地居民，住在宽敞的住房里，有带围挡的院子，甚至允许他们

① A·M：《赞美我主》，未发表手稿。——原注

② 《苏共历史问题》第5卷（1975）第140页，这篇文章所给出的数字要高于
那些在1933年中央委员会一月全会报告的数字。——原注

有自己的养马房，这在那些日子里是一种最特殊的特权。在特别居住地，人们住的则是狭小、东倒西歪的预制结构房子，而且每家只分有半套住房。这地方没有集体农庄——他们只在自留地上种些土豆和少量的蔬菜。在这个居住区居住的居民，很少能在矿上工作，因此住在那里的大多是老人和孩子，而家庭的其他成员则在乌拉尔的各个城市工作。

为数更多的农民，在骇人听闻的饥荒中死去了。饥荒发生在1932年到1933年间的冬季，这场灾难或多或少是人为造成的。它主要发生在乌克兰的南部地区，虽然北高加索、伏尔加地区、中亚和哈萨克也受了影响。大家可以在《苏联人口》一书里找到乌克兰的人口调查材料，按照书中的说法，乌克兰1926年有人口三千一百二十万，但到1939年只有二千八百一十万了。十三年间人口的实际下降数达到三百一十万。^①而在同一时期内，苏联的白俄罗斯人增加了一百三十万，几乎增长了百分之三十（1939年9月17日数字）。从1926年到1939年哈萨克人口数量也下降了八十六万人。维吾尔人、阿尔泰人、雅库茨人、通古斯人和其他北方民族的人口数量也下降了。卡尔梅克人和布里亚特人口的数量，实际上没有增长。

一个苏联普查人口的专家写道，“1933年到1934年的饥荒期间，夭折的儿童数量大得令人难以置信，特别是新生婴儿。1970年人口调查时，有一千二百四十万人生于1929年至1931年间，而只有八百四十万出生在1932年到1934年间。这些数字之间的差别不是由于控制生育的人为努力。再者，集体化运动在1929年到1931年间正处在高潮，但是与前三年相比，出生率只有微弱的下降。如果记得这样的事实，即1933年的饥荒是在没有

^① 见戈祖洛夫与乔治安茨合著的《苏联人口》（莫斯科，1969年）。——原注

预兆的情况下来临的，而计划生育的方法那时在俄国的农村，实际上还不为人所知，那么无疑，实际情况是1932年到1934年出生的孩子至少有三百万死于饥荒”。^①

1933年到1938年的六年中，中央统计局手册对于俄国人口都重复着同一数字：一亿六千五百七十万（和1933年1月1日的数字相同）。1939年的人口调查得出的数字是一亿七千零四十万，这就是说这六年的人口增长，每年不足一百万。斯大林在一次超额完成计划的康拜因驾驶员会议上说：“在我国，现在大家都说：劳动者的物质生活状况大大改善了，生活得更好、更愉快了。这当然是对的。但是，这样一来，人口的增加就比过去快得多了。死亡率减低，出生率增大，因而净增数字就大得多。当然这是好现象，我们欢迎它。现在我们每年净增人口约300万。这就是说每年我们要增加整整一个芬兰。”^②在引述了上面的统计数字后我们已经无需对此加以评论了。

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在其未发表的回忆录中作过如下描述：

“三十年代初，在作家当中时兴了一阵访问集体农庄，收集农村新生活道路素材的风气。我也愿意同大家一样去做，于是也抱着写一本书的念头动身去采访。但是我所看到的景象不是言语可以形容的。到处是非人道的，无法设想的苦难，如此可怕的贫困，似乎只有在抽象概念里才存在，似乎已经超出了人的理智所能理解的限度。我病倒了，并且整整一年不能写作。”^③

① M·马克苏多夫：《1918年至1958年苏联的人口损失》，——原注

② 《真理报》1935年12月4日，中译文引自《斯大林文选》（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63页。——中译注

③ 未发表的手稿。——原注

三十年代初，有一种特殊的镇压措施，就是在苏联的一部分人口中推行国内护照制度。在沙俄时期，这种护照制度是为了方便警察监视，限制国内的自由迁徙而设立的。它使普通群众的生活大大复杂化了，其程度之甚，致使所有十九世纪末叶的革命者，都把废除国内护照制度，并保证行动的绝对自由，作为一项最坚决的奋斗目标。

因此，很自然，十月革命以后，护照制度被废除了，这是新生的无产阶级国家所采取的最重要的民主措施之一。1928年至1930年出版的《苏联小百科全书》中，有如下一段文字：

“护照制度是‘警察国家’里实行警察镇压和税收政策的最重要工具。革命前的俄国实行护照制度。护照制度对劳动群众尤其难以忍受，这一制度同时也证明它限制了资产阶级国家的内部变革。但是变革却逐步迫使政府放宽限制，而最终全部废除了护照制度。在苏维埃法律之下不存在护照制度。……”^①发给苏联公民的护照只为到国外旅行之用。

集体化开始时，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由于准备工作不充分和主要依靠强制手段，突然而来的“全面集体化”和消灭富农的运动造成了农业生产的骤然下降，紧接而来的就是遍及南乌克兰、北高加索、伏尔加地区和哈萨克农业区的饥荒。几百万饥饿的农民，潮水一般涌入城市和饥荒不那么严重的地区。小城镇的居民企图到大城市去。每一个火车站上都挤满了饥饿的农民。几年以前，在内战期间和内战后，成千上万城市居民到农村去寻找食物，数以百万计的人暂时移居到了乡村。但是，十年之后，这一过程颠倒过来了，农民用移居到城市的办法逃避饥饿，相对来说，城市里能较为方便地搞到食物。1933

^① 《苏联小百科全书》(莫斯科, 1928—1930)第6卷, 第342—343页。

——原注

年春，莫斯科瓦赫唐诺夫剧院^①在乌拉尔巡回演出。其中一位演员，后来曾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了这次旅行，他写道：“沿路所到之处，在车站上我们都看到了成千上万饥饿的农民。他们用尽了最后一点气力从村里走出来，也只能找到一块发了霉的面包。他们有气无力地坐在车站的墙角下面，在车站上睡觉，然后就慢慢死去，每天早晨，车站的警卫都要叫人来，在尸体上盖块帆布，然后放在马车上拉走。”^②

由于不能对付这种成百万农民失去控制的迁移，斯大林政权决定恢复护照制度，颁发护照的对象仅限于工人和机关工作人员，而把农民和集体农庄庄员排除在外，这就意味着他们的迁移在更大的程度上受到限制。

当强迫集体化在俄国开始发动的时候，流放中的反对派著名人物，便竭力反对斯大林分子所采取的非常措施。他们的声明和信件有许多得以在党报上发表，但只是被当作偏见和诽谤的例子。例如1930年初，《布尔什维克》杂志发表了一名重要的托洛茨基分子拉柯夫斯基关于集体化的批评性评论，文章说：

“在集体农民所有制的谎言背后，在民主选举产生经理的谎言背后，一个强制性的体制正在建立，使得国营农场里一切现存的东西都相形见绌。事情的真相，就是集体化的农民将不再是为自己劳动。而唯一能够生根、开花、结果的东西，就是新生的集体农庄的官僚主义。……集体农庄把各个阶层的农民（只排除真正的富农），统统聚集到一个屋顶之下，到头来势必把自己置于官僚主义铁索的重重束缚之中。集体化的农民将会什么都缺少，然后又会有大批的补偿以官方保护人的面目出现，不论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这又一次证明了，官僚社会主义不断地

① 莫斯科出名的话剧院。——中译注

② 尤·叶尔甘：《粉饰的艺术》（纽约1952年）第46页。——原注

滋生新的官僚主义者。因此，御用文人许诺给我们的社会主义已经垂手可得了，但那除了是个官僚主义的王国而外，别的什么也不是。……

“一旦贫苦农民和农庄的庄员，发觉自己处在令人绝望的境地，他们就会大规模地涌入城市，使农村失去了劳动力。我们的无产阶级政府，到那时会不会颁布一条法令，强迫乡村的穷人依附他们的集体农庄，而我们的赤卫队则负责把所有在街上的逃亡者抓起来，遣送回乡呢？”^①

1930年初，《布尔什维克》杂志的读者会认为拉柯夫斯基的尖刻预言是十分荒谬的，那样的事绝不会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发生。结果时不过两三年，其大部就变成了事实。苏维埃国家确实实用护照制度，把贫苦农民和农业工人拴在集体农庄里，还命令赤卫队把饥饿的农民赶出城市和火车站。

还有一点应该在这里说明的是，受到新的护照制度危害的并不仅仅是农民。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其他大城市里，许多居民也没有领到护照，特别是那些数以千计或许数以万计的前资本家、上流社会人物，还有其他被剥夺了公民权的人。他们都被迫迁移到小的省城，在那里受雇于地方机构，充当下级办事人员。

至此需要说几句有关斯大林个人历史的问题。斯大林一生中的悲剧性事件之一，就发生于三十年代初——他的妻子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自杀了。根据某些传记作者的说法，他以自己的方式无限忠诚于她，而且她的死对他的性格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是在我看来，这一事件的重要性不应被过分夸大，因为斯大林的性格在1932年之前已经完全形成了。

^① 《布尔什维克》杂志1930年第7期，第18—19页。——原注

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是斯大林的第二个妻子，他的第一个妻子是叶卡捷琳娜·斯瓦尼泽，她于1907年去世，身后留下了一个不满一岁的儿子，名叫雅可夫。有一张当时的照片保存了下来，上面是没有蓄须的斯大林与亡妻的家人一起站在棺木旁边^①。

斯大林安葬了第一个妻子之后，就又投身到布尔什维克地下组织的世界中去了，他先是在巴库，后来又回到圣彼得堡。他离开格鲁吉亚多年未归，儿子就由他的祖母斯瓦尼泽的大家庭抚养。这个家庭里，几乎所有的成年人后来都进过斯大林的集中营，其中有的人，例如历史学家兼政府干部亚历山大·斯瓦尼泽，是按斯大林的手令枪毙的。

斯大林在1903年，认识了第二个妻子的父亲谢尔盖·阿利卢耶夫，当时斯大林到梯弗利斯安排巴库的地下印刷所。几年以后，命运又把他带到巴库，那一次斯大林可能见到了他六岁的女儿娜嘉。以后不久阿利卢耶夫便搬到了圣彼得堡。1912年到1917年间，他的公寓是布尔什维克的秘密接头地点。1917年7月事件以后，列宁曾有几天在此藏身，因为那时已下达了追捕列宁的通缉令，他被迫在地下度过了几个月的时间。

斯大林于1917年也在彼得格勒（圣彼得堡在1914年被重新命名），并且保持着他与阿利卢耶夫一家的友谊，他们为十六岁的漂亮女儿所倾倒，而她对来她家访问的职业革命家们也极其热情。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一年以后入了党，此后不久，她就和斯大林结了婚。她曾陪伴他到察里津前线，回到莫斯科以后，她开始在列宁领导的人民委员会的秘书处工作。

^① 该照片由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地下党党员普罗科菲亚·札帕里泽（化名阿廖沙）的女儿保存。札帕里泽曾在巴库任政委，照片是他的女儿从叶卡捷琳娜·斯瓦尼泽的母亲手中得到的。——原注

她在人民委员会工作期间曾发生过一件稀奇的事情，这一件事是当时道德风貌的极好说明。在列宁的倡导下，1921年秋开始进行第一次党内清洗。通过1920年至1921年的政治危机暴露出有许多党组织很靠不住。列宁认为，为了改善党的质量，有必要缩小党的组织。有提案提出，开除那些抱着个人野心入党的人，还要清除那些当时所谓的“非无产阶级的成分”。要清除的人是“压仓物”，即只是形式上的党员而不参加党的工作的人。列宁在就如何领导这次清洗发出的指示中，提议首先要听取党外工人对某些党员的意见。所以清党的会议对非党工人代表是公开的。其次，列宁提出清洗要自上而下进行，“对任何人都例外”。还设立了一个委员会，用以负责清洗那些在党政最高领导机关中工作的党员。该委员会核准要把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开除出党，她当时仍在人民委员会的机构中工作，并刚刚给斯大林生下了第二个儿子（当时她的丈夫是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同时还负责工农检察院的工作）。她被列为“压仓物”，即一个不执行党的任务的人。

斯大林对此决定有何反应，无人知道。列宁得知这件事之后，用电话口授了一封信给中央清党委员会首脑彼得·扎卢茨基和阿朗·索尔茨，信是这样的：

“扎卢茨基和索尔茨同志：

“我刚刚得到娜杰日达·谢尔盖耶夫娜·阿利卢耶娃被开除出党的消息。我曾经亲自观察过她在人民委员会秘书处，也就是在非常接近我的地方的工作。同时我觉得有必要指出，早在十月革命以前，我就已经认识了阿利卢耶夫全家，包括父亲、母亲及两个女儿。当季诺维也夫和我处境危险，必须隐蔽的时候，正是这一家人为我提供了隐蔽之处。他们四个人都受到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党员的完全信任。他们不仅为我们两个人

提供了藏身之地，还进行了全面的秘密活动，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无法逃过克伦斯基的侦探。很有可能委员会鉴于娜杰日达·谢尔盖耶夫娜·阿利卢耶娃年轻而忽略了以上情况。同时我也不了解委员会是否在审查娜杰日达·谢尔盖耶夫娜·阿利卢耶娃情况的时候，有机会得到有关她父亲的情况，她父亲曾在革命前很久就为党多方工作，我听说他在沙皇统治时期为不合法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提供了重要的帮助。

“我认为我有责任向中央负责清党的委员会讲清楚这些经过。

“1921年12月20日，晚8时，列宁。”^①

在列宁的干预之后，虽然还有许多保留意见，但阿利卢耶娃的党籍还是被恢复了。列宁逝世以后，阿利卢耶娃开始在《革命和文化》杂志社工作，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她进了工业学院学习。

我之所以叙述这些情况，是因为现在流行着许多有关阿利卢耶娃及其与斯大林关系的传奇。十年以前，我有一次去看一个熟人，他让我看了一本俄文书，名为《斯大林——苏维埃独裁者生平》。书是于1930年在爱沙尼亚出版的，当时的爱沙尼亚还是个独立国家，那里曾是几家流亡者开办的出版社的大本营。只要读一读该书的第一部分，人们就可以看出，那位有高加索人姓氏的作者，仅仅引用了一些苏联在斯大林五十诞辰之际发表的有关材料，除此之外就简直是杜撰了。举例来说，他断言斯大林象东方暴君那样把他的妻子关在克里姆林宫的一套公寓里，住在克里姆林宫内的斯大林圈子里的人们，从来没有见过她的面。

^① 《列宁全集》第51卷，第82—83页（中文版《列宁全集》未收录此信。此处译文为中译者所译，——中译注）。——原注

实际上，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是个喜欢交际的人，在党内是个为大家所熟悉的人物。她与阿贝尔·叶努基泽，还有阿廖沙·札帕里泽两家都有深交。她与斯瓦尼泽一家关系也很亲密，和仅比她小七岁的雅柯夫·斯大林也是很有感情的。她对雅柯夫和他父亲之间经常的争吵，感到极为不安，并且为雅柯夫自杀未遂一事大为震惊。按照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的说法，雅柯夫完全是个忠诚的儿子，但是拒绝把他的父亲当作偶像来崇拜。雅柯夫曾对斯维特兰娜说：“父亲说的都是各种命题和纲领。”斯大林讨厌雅柯夫，并且用冷漠，不公正的态度对待他。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回忆斯大林对雅柯夫突然企图自杀的反应时写道：“幸好只受了伤，……可是父亲却找到了嘲笑他的理由，说：‘哈哈，没打准啊！’他是喜欢讽刺人的。而妈妈则受了极大的震动。”^①

可能是雅柯夫的举动使阿利卢耶娃第一次产生了自杀的念头。她和斯大林的生活已变得越来越困难了。他们经常吵架，有一次她甚至带着孩子们到列宁格勒住了几个月，^②但她还是回来了，于是家里又恢复了一时的平静。很显然是阿利卢耶娃在1929年，把她在工业学院的同学尼基塔·赫鲁晓夫介绍给斯大林的，他是个精力充沛的年轻的党的工作者，1921年他被任命作莫斯科党的工作。

当阿利卢耶娃的兄弟巴维尔，因为要办一些与军事有关的工作需要出国时，他问她希望给她带回什么礼物，她要了一支小的女用手枪。^③巴维尔作为师里的技师参加过内战，以后又任红军摩托化、装甲和坦克处的政治委员。^④关于娜杰日达·阿利

① 见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中译注

② 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在《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中曾言及此事，但是并未提到历时“几个月”。——中译注

③④ 参见《致友人的二十封信》第124页、第61页。——中译注

卢耶娃的自杀有几种说法，但是这些说法只是在细节上有出入而已。下边的说法是一个曾经和叶努基泽一家关系非常密切的人告诉我的。

1932年11月7日或8日，有一些布尔什维克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家庭聚会，庆祝十月革命十五周年。娜杰日达也出席了，但斯大林迟到了。当他终于到达时，她说了一些半开玩笑的话，这些话使斯大林十分生气，当时他已经喝醉了。他粗暴地回答了她。斯大林有时也吸香烟，而不抽烟斗，^①这次由于对妻子发怒，就把燃着的香烟向娜杰日达的脸上抛去。烟掉进了她衣服的领口。她拿出烟，跳了起来，但斯大林却很快转过身离开了屋子。娜杰日达几乎立即跟出去了。后来才知道，斯大林回到了别墅，而娜杰日达则回到她在克里姆林宫的寓所。庆祝活动不欢而散，但几小时后发生的事情却更糟。叶努基泽和奥尔忠尼启泽接到从娜杰日达住所打来的电话，要他们立即前往。娜杰日达开枪自杀了。在她的身边有一支小小的手枪和一封写给斯大林的信，信当然无人敢动。他们立即往别墅给斯大林打了电话，他差不多也立即赶到了。发生的事情显然使他极为震惊，但他却始终沉默不语。

不言而喻，报纸上没有提到阿利卢耶娃的自杀。苏联的报纸报道了斯大林妻子因病逝世的消息，还发表了伪造的病情公告。斯大林家里的所有服务人员都被撤换掉了。

即使是这样，自杀的说法还是不胫而走。那时，党的最高层的状况与1937年相比，是有很大的不同。1937年，很少有人知道奥尔忠尼启泽自杀的真情，甚至连莫斯科党委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这样的人，都相信他死于心脏病的官方说法。1932年到

^① 斯大林总是抽烟斗，有时也吸一种俄国人喜欢的香烟，烟不长，上面有一段硬纸做的长烟嘴。——中译注

1933年，开始有谣言说，斯大林因为他的妻子同托洛茨基分子有联系，而开枪打死了她，有些人倾向于相信这种讲法。不管怎么说，有过布琼尼出于嫉妒，杀死了他的第一个妻子，而又把事情完全掩盖起来的先例。

自杀的谣传传到外部世界，主要是通过反对派的圈子传出去的。那时正值鲍利斯·苏瓦林在写《斯大林生平》一书。苏瓦林是俄国血统的法国社会主义者，他曾在第三国际筹划过设立指导委员会的工作，1920年曾见过列宁。法国共产党成立时，他是中央委员会委员。但是由于他积极支持托洛茨基，早在1924年就被开除出党了。以后有几年他继续追随托洛茨基，并在法国加入了托洛茨基分子的团体。但是后来他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都失望了，放弃了一切政治活动，虽然他仍然是个作家兼记者。他的《斯大林生平》一书，1935年在法国问世。这本书，属于著作界对斯大林的政治生涯进行分析的最早尝试之一。该书在法国几经再版，还被译成了其他西方语言，但是战后却一直没有再印，直到1977年，才又在巴黎出了新版。全书叙述截止到三十年代中期。苏瓦林在1977年新版的序言中写道：“著者确信，无权对1935年和1940年出版的书做改动和修正。……由于年事渐高，也就无法再去考察现在的大批可利用的材料，或是继续写完《斯大林生平》。”但是序言很长，此外苏瓦林还增加了内容更为详尽的一章结论，在这一章里，他评论了最近发表的关于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出版物，而且还对他早年的著作作了若干修正。在这些修正中，有一些是关于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命运的论述。

苏瓦林注意到她的女儿斯维特兰娜写的两本书的问世，一本是《致友人的二十封信》，另一本是《仅仅一年》，他写道：“……她相信她的母亲娜杰日达是自杀，但是她却只重复了克里姆林

宫所说的东西，在那个地方所有的人全都撒谎。虽然自杀一说在当时是可信的（我的书里也接受了这种说法），但时到今天，这种说法在克里姆林宫的圈子里，也已经非官方地否定了，同时，权威的见证人也否定了它。”^①

但是，苏瓦林既没有讲出“克里姆林宫的圈子”今天的观点根据何在，也没有讲出“权威见证人”姓甚名谁。因此，上边所说关于她自杀的讲法，看来是最接近事实真相的。通观克里姆林宫1932年时的情况，以官方名义宣布阿利卢耶娃病故，用以在苏联公众面前隐瞒她自杀的真相，还是可以办得到的，但假使确实是斯大林杀死了他的妻子的话，那就无法做到掩人耳目了。在他周围，对他心怀妒嫉的人太多了，更不用说他以前的反对派对手了，他们那时还没有被捕，并且通过各种渠道和党的最高层人物保持着接触。那时阿利卢耶娃的父母还在世，他们也不会对女儿的被杀表示逆来顺受，她的兄弟姐妹们也不会保持沉默的。

当然，人们可能要批评我完全相信口头证据，而实际上我也确实这样做了。要把握过去发生的事情，特别是斯大林时期的事情，困难就在于事情发生的当时，往往连最少的文字凭据都没有留下。一般说来，根本就没有文字记载，哪怕是在最秘密的苏联档案中也是一样。所以历史学家们就只能靠他们的直觉，依靠他们对证据可靠与否的判断能力了。举例来说，当阿利卢耶娃的哥哥巴维尔·阿利卢耶夫去世的时候，据称死因是心脏病发作。斯维特兰娜把这当作事实写在她的书中了，〈致友人的二十封信〉把作者的舅舅描述为一个职业军人，他作为苏联政府的军事代表，曾在德国生活了很长时间。他妹妹去世

① 鲍利斯·苏瓦林：《斯大林》（巴黎，1977年）第605页 ——原注

的时候他正在国外，后来回国，住在莫斯科。

“……最后一段时间，即在1938年他去世前不久这段时间，他常到克里姆林宫我们家里来，也是久久地在我的房里或瓦西利房里坐着，等候我父亲回来……巴维尔舅舅不止一次找过父亲，坚持要保那些被卷进这一巨浪中的他的军队里的熟人……1938年秋天巴维尔舅舅去索契休假，这对他的心脏病是有害的。当他从索契休假归来，回到装甲兵局工作时，已经找不到和他在一起共事的人了……司令部被捕的人是如此之多，就象被一把扫帚全扫了出去了似的……巴维尔舅舅心脏病犯了，他因心脏骤停，死在办公室里。”^①

巴维尔·阿利卢耶夫的死，实际上没有引起什么注意就过去了。但是，当幸存下来的囚犯在“二十大”之后回到家里，渐渐摆脱了恐惧心理后，就开始谈论起过去的事情，因此我经常听到关于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的自杀及她的哥哥巴维尔被谋杀的说法。1938年的时候，内务部就已经掌握了十分先进的暗杀技术。有一些人，出于某些考虑不便逮捕，结果就因为突然的“心脏病发作”而从人间消失的。看来巴维尔·阿利卢耶夫也是这样死的，他死的时候还不到四十五岁。

巴维尔·阿利卢耶夫的一个侄子告诉我说，巴维尔一听说他妹妹的死讯，就立即赶回莫斯科，他应邀去克里姆林宫会见斯大林。斯大林感到问心有愧，好象要在刚刚惨死的妻子的哥哥面前开脱自己。“我做了她所希望的一切事情，她愿意去哪儿就可以去哪儿，要什么就买什么，她还能缺少什么呢？看吧——！”斯大林拉开一个桌子的抽屉，里面装满了十元、二十元和三十元一张的卢布。我个人认为，上述这件事是可信的。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也写到斯大林从许多兼职中，轻而易

^① 斯·阿利卢耶娃：《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中译注

举地积蓄起大量的工资，他把这些钱就塞在一个抽屉里，甚至连封条都懒得去拆。他所需要的一切都是由国家提供的。这就也为我们提供了证据，虽然她写的是战后的事。

缺乏可靠的材料来源，就不可避免地要导致失实，就容易把事情搞错或曲解，而且也为故意伪造开了方便之门。不久以前，在西方出版了一本书，据称是外交人民委员玛克西姆·李维诺夫的日记。其中有不少真实的情节，起码初看上去象是真的。这本“回忆录”中，有几页谈到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之死。当我读到外国使节和代表询问外交人民委员部，他们是否应该向斯大林表示吊唁这一段时，我认为当时可能确有其事。对斯大林在葬礼上行为的描写也还算可信：当斯大林走近棺材同死者告别时，突然把棺材推了一下，就转身离开屋子，而且再也没有去墓地参加葬礼。但是，当这本“回忆录”的作者讲到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葬于新处女公墓，而不是葬在克里姆林宫墙，因此整个莫斯科都十分震惊时，他就露了马脚。因为把她葬于新处女公墓毫不奇怪，事情正相反，假使她的墓是在克里姆林宫墙内，那才令人觉得奇怪呢。一个人要在死后得到葬于克里姆林宫墙的荣誉，除非生前作出过杰出的贡献，这在二、三十年代就已经形成惯例，直到今天仍然如此。这种特权从没有扩大到家庭成员。因此，斯大林或他周围的任何人根本不会把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葬于克里姆林宫墙里的，李维诺夫当然应该知道这个不成文的规定，而不会在日记中对此表示惊奇。以上不过是一个例子，说明了解情况的读者，是可以较为容易地辨别那些伪造的回忆录的真伪。

不幸的是，求助于杜撰的不只是骗子，有些真正的作者也这样做。在苏联出版的著作中，能够发现多少谎言和被歪曲了的事实啊！关于列宁，或是内战，或是革命的地下活动时期

的那些回忆录，无不如此。娜杰日达的父亲谢尔盖·阿利卢耶夫也写了题为《我们走过的道路》的回忆录，他后来不曾被捕，1945年在七十九岁时去世。他的书于1946年出版，1956年再版。他讲述的仅仅是1890年到1907年这段时间内的事情，但也包括了许多虚构的东西。在记述巴库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活动时，阿利卢耶夫根本没有提到叶努基泽（他是党组织的创建人，在建立著名的地下印刷所时起过十分巨大的作用）。对他他在三十年代被杀害的外高加索地区的主要革命者，他也都只字未提。在一切可能之处，他都夸大了他的女婿斯大林——“柯巴”或索索·朱加什维利的作用。从1932年到四十年代，象阿利卢耶夫这种人的行为和心理，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些没有被征服、拒绝投降的人（其人数远比我们知道的要多），到了那时已经死的死，失去自由的失去自由了。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继续谈三十年代初期的一些事情。斯大林的工业化和集体化计划不仅建立了二十三万个集体农庄，而且使工业获得了相当迅速的发展，但在同时也导致了大规模的政治和经济危机。这是1920年至1921年以来最坏的一段时期，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显著恶化了，货币体系处于一片混乱之中，到处都存在粮食和最普通消费品的严重短缺现象。普遍的不满情绪反映到党内，也波及到了党的机关，在那里，怀疑逐渐开始变成一个还没有组织起来，但已很广泛的反斯大林的对立情绪。

与索尔仁尼琴最近的某些断言相反，当时西方报纸大事报道了苏联所经历的困难。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批评性的报道发展成为全面的反共产主义运动。关于苏联正在发生着什么事情的消息，影响了西方共产党的地位，使他们不可能利用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扩大影响。得益的是极端主义集团和右翼党

派，希特勒1933年在德国取得了政权。对苏联共产党的严厉批判也见诸于社会党人的报刊，包括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流亡者的刊物。

1928年到1929年，孟什维克仍然同情右翼反对派的纲领。孟什维克的达维德·达林写道：“右倾反对派的王牌是其经济政策，它反对回到战时共产主义，反对国家征收粮食的新制度，反对强迫集体化，以及反对消灭所谓‘富农’的斗争，简言之，就是反对由斯大林的政治局正在进行的对农民的全面掠夺——一场一个月比一个月更残酷的对农民的掠夺。他们的斗争正在引起注意，对右派的同情，在社会各阶层和不同成分中逐渐增加，在农民和工人阶级中出现了这种情绪，在机关工作人员和知识分子中间，在富人和穷人中间也是如此。右派政策的最强有力方面，是他们决心反对复活乌托邦，以及随之而来的不可避免的恐怖。在这方面，再一次表明他们比斯大林派站得高，而且他们的要求，即使还不够完善，却肯定是向形成社会民主纲领的方向迈进的，……只有在这里——在右倾反对派的影响下，才可能形成工人的可观的核心力量，对于这些人来说，反对乌托邦就是指明了向社会民主前进的道路。”^①

社会民主党的刊物上登出的类似声明，反倒成了攻击反对派的武器，因为在布尔什维克中间“社会民主党”一词已经变成卑鄙、罪恶、背叛的同义语。斯大林把一切社会民主党人都统统称为“社会法西斯主义”，由于一些原因，他认为社会民主党左翼甚至比其右翼领导更危险，或者比社会民主党的温和派更危险。然而就是在这个时候，在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迫切需要的是言归于好，以利共同对不断增长的法西斯主义威胁作斗争。但是斯大林主义的政策使得和解

^① 《社会主义通报》(柏林),1929年第22期,第6—7页。——原注

成为不可能，因而疏远了社会民主党的群众，与此同时，法西斯主义却继续扩大着其群众基础。

在这一点上，我们遇到了一个中心问题，即三十年代初期，在多大程度上可能把斯大林撤换掉？有没有可能代替他的选择对象？

托洛茨基已被驱逐出境，在国外他仍然相信，斯大林的经济政策一旦崩溃，左倾反对派就可以在苏联掌权。1929年底，他写道：“建国已十二周年的苏维埃共和国，发现自己处在一个特殊的状况之中，显著的成就与严重的困难伴随在一起，两种现象同时都在增长。这就是形势的基本特点，而且又是它主要之谜。……第十三个年头将是矛盾尖锐化的一年，党已窒息，力量丧失殆尽，可能在它还没有察觉之时已被取而代之……集权的机器只能暴露自己不过是架机器而已。无产阶级的核心需要领导，而只有久经斗争锤炼的共产党左派，才能够担负这个领导。”^①

几个月之后，托洛茨基还声称，左倾反对派的地位正在得到加强。“同官方报纸上的谎言正相反，左倾反对派在思想上正在变得更强大，它的队伍也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得到扩充。在过去的一年里，它的收获是巨大的。”^②

但是这不过是幻想，一种纯属一厢情愿的事情。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境之后，左倾反对派便迅速地瓦解了，它的一些基本骨干力量都投降了。大多数最著名的托洛茨基的支持者都“承认”了错误，通过了低三下四的坦白手续之后，他们又从特别监狱或流放地回到了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城市。1932年到1933年间，当从前的左倾反对派稍有企图恢复活动的迹象时，斯大林只需下命令，再判处几人流放或开除几人出党，就足以对付

① 《反对派简讯》1929年第7期，第4页。——原注

② 《反对派简讯》1930年第10期，第4页。——原注

了，这样便完全打破了左倾反对派企图死灰复燃的一切梦幻。托洛茨基固然有能力在国外组织一小部分追随者，还可以出版几份报纸、杂志，但是他在苏联的支持者却丧失了力量。其实这也不仅仅是各种各样的镇压和逮捕的结果。当斯大林自己在二十年代后期，突然采取一些极左的政策时，许多前托洛茨基分子在一开始也迷惑不解，随之很快便产生了一种心理，觉得又有可能重新回到党内，甚至还可能变成积极分子。他们中间有不少人身居重要的经济工作岗位。而这时，托洛茨基却正严厉地批评斯大林政府所采取的许多“冒险主义的”，不负责任的措施。他呼吁停止全面地集体化，建议代之以在严格自愿的基础上，挑选一些村子，建立农庄的方法，这样就可以使这一制度适应农村有限的资源。他提议停止“消灭富农”的运动，而实行以前强制限制富农剥削他人劳动的政策。他坚持认为，斯大林迅速实现工业化的不现实的计划必须修改。托洛茨基无疑是提出了一些合理的建议，但是在那个时候，这些建议对斯大林主义的领导来说，是完全不能接受的。看来很清楚，托洛茨基对在苏联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真相太不了解。举例来说，他从来没有想到，1928年至1931年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破坏分子”的审判中，会有任何不实之处。他认为对“沙赫特分子”的审判是正确的，也从来没有怀疑过对所谓“工业党”^①的指

① 工业党、农业党、孟什维克联合局，是于1930年苏联政治保卫总局破获的三个“反革命组织”，苏官方称这三个组织受外国间谍机关的指使，企图在苏联制造混乱和破坏，从而促成外国主子预定的1930年武装干涉。工业党主要参加者据称是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农业党据称是由社会革命党人领导的“富农反革命组织”；联合局全称为孟什维克联合局。据称由原孟什维克分子组成。工业党的首领为拉姆金等五人，于1930年底判为死刑，后改为十年徒刑。拉姆金本人在监狱中发明了一种新型锅炉，获释后获列宁奖金。农民党首领为奎西诺夫和康德·拉·葛也夫。一般认为这三起案件是错案。——中译注

控，他甚至认为，对这个根本不存在的组织的领导人，如拉姆金、拉里契夫、加里尼柯夫和其他一些人，判决得太宽了，所以持反对态度。托洛茨基在《反对派简讯》上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对破坏分子的审判给我们哪些教益？》文中谴责斯大林和他的拥护者把“外国资本家和俄国逃亡买办的雇佣特务”提拔到国家经济和计划委员会这样高级的岗位上。他写道：“基里连科对工业党的控告，同时也是对斯大林主义的头面人物的控告，难道这一点还不清楚吗？这些斯大林主义的头面人物，由于反对真正的布尔什维列宁主义，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世界资本家的工具。”①

托洛茨基完全相信神话似的“劳苦农民党”确实存在，这个党据说是由经济学家N·康德拉第也夫和A·查亚诺夫负责领导。“工业党”案件之后几个月，在莫斯科又进行了一次类似的表演——对孟什维克“联合局”的审讯。托洛茨基又一次相信了骗子基里连科没有事实根据的指控，而不相信在国外的孟什维克中央提出的令人信服的论据。他绝对相信达维德·梁赞诺夫有“罪”。梁赞诺夫被解除了职务并被开除出党，理由是说他在马克思恩格斯学院的仓库里保存了“联合局”档案。在法庭上没有出示这一“地下档案”的任何样本，但是托洛茨基还是写道，这一项被指控的罪行是“无可争议地确认了的”。②他虽然强烈反对枪毙布留姆金——以前的左翼社会革命党人，以后又是契卡的工作人员，曾在国外秘密访问过托洛茨基——但是当所谓的留定集团被粉碎的时候，托洛茨基除了在一旁幸灾

① 《反对派简讯》1931年第17—18期，第21页。——原注

② 《反对派简讯》1931年第20期，第7页。五年过后，在《简讯》上发表的一项文件的注释中，托洛茨基写道：“《简讯》的出版人必须承认，在审判孟什维克的时候，我们大大低估了斯大林统治下的司法机关的卑鄙，而这已经成为他们的特征了。由于这个缘故，我们过于认真地相信了前孟什维克的供词。”见同上刊物1939年第51期第15页。

乐祸以外，什么也没有做——正是留定曾领导了在莫斯科克拉斯诺普列辛斯基区对托洛茨基分子的攻击。在严厉谴责斯大林的不负责任的经济政策的时候，托洛茨基甚至还写道：“当然，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困难超过了领导的意愿。问题的根子，就在于不可能在一个落后国家里，特别是在一个极端落后的国家里建成社会主义。①

但是，当托洛茨基最后不得不承认，苏联社会主义工业的可观成就和十月革命政权基本稳定的时候，他说：“这证明他们可以做到出人意料的坚韧不拔，这对我们中间最乐观的分子来说，是出乎预料之外的。”但即使如此，他也仍坚持认为：“除非社会主义建设得到全世界范围无产阶级革命和国际经济的支持，否则无法进一步往下发展”。②

在前面我已经提到了斯大林和第三国际对社会民主党人的错误政策。但是当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取得胜利，同时考虑到法西斯主义在整个欧洲的危险之后，共产党终于吸取了教训，虽说至此已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从1934年开始，首先在法国，然后在西班牙，接着在第三国际其他的支部，开展了一场与社会党人，包括社会民主党领导层人物建立统一战线的运动。但是，托洛茨基那时正倾其全力要建立第四国际，他在社会党问题上继续采取宗派主义的路线。在日内瓦出版的《第四国际与战争》一书中他写道：

“我们将利用无产阶级的组织和方法来捍卫民主，使其不受法西斯主义的侵害。与社会民主党人不同，我们不会把这一重任交给他人。既然在和平时期，我们尚且反对‘民主’政府而毫不与之妥协，那么到了战时，到了资本主义的卑鄙、罪恶

① 《反对派简讯》第10期（1930年）第2页。——原注

② 《反对派简讯》第29—30期（1932年）第3页和其它地方。——原注

全都以其最狰狞、最杀气腾腾的面目出现的关头，我们如何还能够相信他们的行动有丝毫的责任感呢？

“现在大国之间的对抗，并非是民主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斗争，而是两个帝国主义之间为重新瓜分世界而进行的争夺。因为在两个阵营中既有法西斯主义、半法西斯主义的国家，又有波拿巴主义的和‘民主的’国家，那么争夺就势必要演变成国际战争……”

“社会民主党的政策与无产阶级历史任务之间的鸿沟，现在要比在帝国主义战争前夜更为明显。反对群众的爱国迷信的斗争，首先意味着从组织方面、政党方面、纲领方面、旗帜方面反对第二国际，并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①

但是，如果前左倾反对派不能取代斯大林的领导地位的话，那么右派就更不可能了。右倾反对派的领导人从政治上和心理上都崩溃了。布哈林分子最担心的事情，在三十年代初都变成了现实，他们的一线生机，被党报上的一次猛攻给扼杀了。

但这并不是说，斯大林的地位就无可争议了。党内的情绪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国家所遭受的灾难，以及普通人民群众不满的影响。许多在党的机构里工作的人，思想上都很混乱，特别是中下级干部，因为他们在区、市、地区党委一级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措施时首当其冲。那些年，党和国家机器是个极其复杂的有机体，象托洛茨基那样，用“热月党人专政”来形容，就过分简单化了。这架机器里，老一辈的党的工作者占压倒多数，由于地下斗争、革命和内战的磨炼，他们已变得十分坚强。他们并不是斯大林操纵的这架行政机器上顺从的齿轮轮

^① 托洛茨基：《第四国际与战争》（日内瓦，1934年），第12、16页。——原注

牙，他们当中，当然也有官僚分子，也有丝毫没有理想的精疲力竭的墮落人物，这些人只关心自己如何升官发财。但是有许多人只是受了斯大林的骗，而其他一些人，即使是受了骗，却仍然相信着社会主义的理想，并保持着相当的革命干劲。现在，因为他们开始思考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对斯大林其人的怀疑也就开始产生了。他们虽然正在失去对斯大林的信任，但是也不存在转到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或布哈林方面去的可能。这些党的机关工作人员心目中，还没有一个有足够权威或名望的领袖。但是，在1932年年底前后，政治局在讨论国内及外交政策的时候，已经越来越明显地形成两个界线分明的集团：温和派与极端派，或是如他们当时所称的“鸽派”和“鹰派”。政治局里的投票情况变化多端，这要看讨论什么议题，但是设想温和派中包括基洛夫、奥尔忠尼启泽、古比雪夫和加里宁，我们这样说也不会担犯太大错误的风险。在这期间，无论政治局内的分歧，还是党内下层中的不满，都没有达到公开或直接对抗的地步，那时也不存在一个明确的反对派纲领，当然斯大林也不会坐等其出现的。

有些历史学家提出，如果托洛茨基早十年，即在1923到1924年掌权的话，三十年代的大恐怖——斯大林在三十年代初期开始制造的残忍的绞肉机——就可以避免。但是我们不应把托洛茨基理想化。

我已经提到过维克多·谢尔盖关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在二十年代的相互地位的看法。作为一个托洛茨基分子，谢尔盖大大夸大了托洛茨基在党内的潜在作用。埃里奇·沃伦堡在为谢尔盖的书所写的序言中，对谢尔盖的许多论点做了批判，他写道：

“谢尔盖设想托洛茨基是斯大林在政治上的代替者。毫无

疑问，作为一个人、一个革命家和列宁主义者，托洛茨基绝对优于这个毁灭了党的全部列宁主义老干部的残酷的格鲁吉亚暴君。但是我们知道，托洛茨基于1924年曾精心炮制了一个政治纲领，提出取消新经济政策，主张实行集体化——为了不出大毛病，要尽可能地谨慎从事，并且最好‘分期分批’地小规模进行。然而，斯大林在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一开始也只‘仅仅’注意了重工业的优先发展，他所设想的集体化进度也非常缓慢。但是这些温和的措施，却意外地遇到了绝大部分农民的反反对，这使得城乡之间的关系变得麻烦起来。列宁曾认为城乡关系是成功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保证，而斯大林对农民反抗作出了很粗暴的反应。他说：‘我们不能容忍在军事危险的同时（那时是有日本人进攻的威胁），乡村用手枪逼着我们的脑袋。①他命令在百分之四十的农民中间实行集体化，并使用严厉的行政手段来将其付诸实现。这一举动的直接后果就是对农民的不宣而战，由于枪杀、大规模流放和集中营关押，结果造成无数生命的牺牲，财产和牲畜的损失。背弃新经济政策的政治后果，就是使社会主义社会丧失了列宁指出过的那些特点。

“但问题的逻辑是一样的：由于托洛茨基的政策是逐步取消新经济政策，那么他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人们不能想象这位创建了红军的人会对农民和耐普曼投降”。②

许多党的活动家并没有支持托洛茨基，因为他们对列宁在遗嘱中，提到他的过分严厉的工作方法非常熟悉，对他爱使用命令和法令的手段也很熟悉。三十年代初，托洛茨基意识到，不仅斯大林和布哈林的支持者反对他，而且那些他认为他最信得过的追随者，那些能够独立站在苏联工人阶级前列的“经

① 此处原作者引用斯大林的话未注出处。——中译注

② 谢尔盖：《革命者的回忆1901—1941年》，第12—13页。——原注

过战斗洗礼的共产主义左派”也反对他。他悲愤交集地写道：

“革命是一所严厉的学校。它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毫不怜悯那些骨干力量。整个一代人都已经精疲力竭，从肉体上和精神上被耗干了。只有很少的人活了下来，但是在斯大林主义官僚机器顶层的大多数人，精神上已经崩溃了。……在托洛茨基主义问题上的投降，已使成千上万的人学会了投降术。

“政治的传宗接代是巨大而又复杂的问题——每一个阶级和政党，都会以它自己的特殊方式面对这个问题。列宁常常嘲讽所谓的老布尔什维克，他甚至说革命者过了五十岁以后就应该送他回他们的祖宗那儿去。但是这个冷酷的笑话，却包含着一个严肃的政治思想。每一代革命者都有一个发展的顶点，在这点上，他们将变成他们自己思想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人们很快就会被政治搞得精疲力竭……当然例外总还是有的，否则就不会有思想意识的延续了。

“今天，我们面临的最重要任务就是教育年轻的一代，这就是我们反对模仿者的斗争的目的。模仿者可能仍然在表面有力量，但从思想上说，他们已经一无所有了。”^①

托洛茨基不是个老布尔什维克，无疑，列宁的话从形式上和本质上都被他歪曲了。托洛茨基偏偏好使用华丽词藻，对于生活在流放之中的他来说，这些华丽词藻只不过是些空话，但斯大林却经常读托洛茨基的书和文章，有时还很认真地对待他的观点。斯大林在1928年到1930年间，有许多政策毕竟包含了不少托洛茨基的思想，虽然是以非常粗糙的形式出现的。如果我们把上面所引的托洛茨基被逐出苏联以后，以极端愤怒的心情所写的东西，与斯大林1936年到1939年的实际所为拿来做一

^① 托洛茨基：《斯大林的伪造学》（柏林，1932），第110—111页。——原注

番比较的话，就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斯大林几乎把所有党的老战士都“送回祖宗那儿去”了，包括左倾和右倾反对派，甚至连同那些与一切反对派作斗争的人。这是老布尔什维克的整整一代人，他们中的大多数还不到四、五十岁。斯大林在这里是不是也听从了托洛茨基的意见呢？但是情况并非如此，斯大林是独自作出决定的。消灭党的整整一代人，并不是因为他们已经“精疲力尽”或“气息奄奄”了，而是因为他们可能具有力量，斯大林担心这种力量会转而反对他。因此斯大林决定把他们都送回老家去，而将来在党的青年一代工作者中寻找支持，他们从没有进过革命的学校，但却走进了斯大林主义的伪造术学校。

第五章

大恐怖

1934年——标志着斯大林的阴险经历中一个新阶段的开始。现在，这把斧头已落到党自身的头上。这次恐怖不仅是针对着以前的反对派，而且还针对着在二十年代党的机构、政府、红军和其它群众团体的基本干部。

这一切是从基洛夫被谋杀开始的。

托洛茨基于1929年开始，在国外出版了《反对派简讯》杂志。在第一期里，他曾写了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文章坚持认为：为了一劳永逸地粉碎反对派，斯大林“迫切需要把暗杀行动、武装暴乱的阴谋等等，与反对派联系在一起……。运转不灵的政策，回避正视堆积如山的经济问题和党对它的领导人信心的丧失，这一切使斯大林感到需要一次打击、一次冲击、一场灾难……。将发生的正是这种性质的事件，斯大林打算通过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①

这一次托洛茨基估计的错误只是在时间问题上。1929年至1931年间，斯大林只满足于筹划对“破坏分子”、“工业党”、“农业党”和“联合局”^②的审判工作。对党自身的致命一击，

① 《反对派简讯》第1—2期（1929）第2页。——原注

② 工业党、农业劳动党和联合局：见第四章注。——中译注

是几年之后——1934年12月——才来到的。斯大林确实做到了将谋杀活动和反对派联系在一起，他声称反对派仍然在进行积极的地下活动。他自己杜撰了一个列宁格勒的“原季诺维也夫分子”的名单，他们被命名为“卡塔勒诺夫恐怖集团”，并于1934年12月对他们进行了秘密的审判。这些人都是二十年代共青团的主要活动家，当时曾在政府的各种机构中工作，因此他们相互之间仍然继续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34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又倾向于彻底地批判斯大林，而且当时国家的具体状况也助长了这种情绪。但是，无论如何他们并没有组织什么集团，更没有任何从事恐怖活动的问题。可是所有的被告都被判处了死刑。我们大家都知道，V·列文曾在审判庭上，发表了长篇演说，控诉了斯大林和他的政策。

但奇怪的是，托洛茨基完全错误地解释了基洛夫被谋害的事件，他在简讯中写道：

“尼古拉也夫被苏联的宣传机构描绘成为一个由党员组成的恐怖组织的成员，如果这个报道是真实的话（而且我们也没有理由去怀疑它，因为对官僚机构来说，承认这样的事情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就应该面对着大量线索都很清楚的新事实。由于暂时的狂乱，而导致的偶然的枪击事件，可能在任何时候发生，然而，正如我们从全部革命历史中所知道的那样，一次有预谋的、在某一专门组织授意下进行的恐怖活动，没有适当的政治气氛是不能想象的。如果发生这样的事，就一定会出现对统治集团的剧烈和广泛的敌对情绪，而且有可能在青年党员中，甚至在与中下层官僚有密切联系的上层分子中间，出现恐怖主义集团。”^①

① 《反对派简讯》第41期（1935年）第6页。——原注

然而，托洛茨基当时也没能理解自1935年开始的、党的领导阶层所采取的新的经济措施。那时，在城乡间，经济形势都有所改善。为了推动这一进程的发展，以及缓和在1932年至1933年已经显露出来的政治紧张空气，中央委员会决定，废除配给制和实行在城里的集体农庄市场上，自由出售剩余农产品的政策。采取这些措施，是为了刺激贸易的发展和增加消费品的生产。所有这些步骤，使产业工人和机关工作人员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高。虽然步子迈得很慢，但是农村的经济形势也开始改观。然而，托洛茨基却将这种发展解释为“向右转”，并争辩说，向“新的新经济政策”转变的真正受害者是工人，而不是农民。他写道：“只要让步政策是反映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利益，那么官僚机关就绝不会愿意作长久的让步，恰恰相反，这个机构将以破坏工人阶级和学生青年的生命力与才智的疯狂政策，开始又一次转向‘富裕的集体农民’一边去。”^①因此，托洛茨基再一次呼吁“无产阶级先锋队”，应对“官僚机器进行自上而下无情地清洗”。

1935年，“官僚机器”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以及他们从前的支持者进行了首次审判。在这些月份里，国内所有的大城市里都在大批抓人，被捕的大多数人是二十年代积极参加了左倾反对派的人们。但这些只不过是对党进行决定性打击的一次演习而已。与此同时，通过了几项法令，为即将到来的恐怖铺平了道路。在这些法令中，有一个法令是中央执行委员会1935年4月7日颁布的，该法令规定：对十二岁以上的儿童可以进行刑事犯罪起诉。

1936年，列宁的老同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其他

① 《反对派简讯》第42期（1935年）第3—4页。——原注

所有的被告，在第二次庭审后，均被判处极刑而枪决了。8月间，当这个案件还在进行审理的时候，米哈依尔·托姆斯基自杀了。他一直是党内令人瞩目的人物，多年来一直担任工会委员会主席，并且曾是右倾反对派的前领导人之一。他的儿子尤里（托姆斯基家庭的唯一幸存者）曾回忆说：他父亲的自杀，是在斯大林的一次来访之后立即发生的，斯大林曾经带着一瓶酒，来到了托姆斯基的寓所，和托姆斯基一同走进了书房，而后关上了房门。开始时，他们的谈话很平静，后来尤里便听到他父亲向斯大林叫喊起来，托姆斯基诅咒他并指责斯大林在进行谋杀活动，其后托姆斯基猛然推开了门，让斯大林滚出去，斯大林愤怒地离去了，他走后不久，就从书房里传出了枪声。

当时，自列宁死后曾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近八年之久的阿列克赛·李可夫也曾想自杀。然而他的家人及时地把枪从他手中夺了下来，后来当他和布哈林一起受审的时候，李可夫的家人为阻止李可夫自杀而十分懊悔。

1936年秋，一直精力充沛、全力以赴地协助斯大林进行一切冒险活动的内务人民委员亨利希·雅哥达，被撤消了职务，并在不久之后也遭到了逮捕。刚刚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的尼古拉·叶若夫取代了他的职务。从那以后，叶若夫便迅速地扶摇直上：他被任命为中央委员会工业部和党的干部部的负责人，并从1935年初起，任中央委员会书记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罗伯特·康奎斯特在《大恐怖》一书中写道：“老练的、残忍无情的刽子手尼古拉·叶若夫成了中央书记处书记，并于2月23日被任命到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首脑这样关键性的岗位上。”^①但是，一位老党员I·A·萨茨在

① 罗伯特·康奎斯特：《大恐怖》（马克米利安出版社，伦敦，1971）127页。
——原注

他的回忆录中却对叶若夫作了完全不同的描述：

“在这些新的任命之前，叶若夫是中央委员会人事部门的负责人，据在那些年代里了解他的人们说：当他还是党的中级干部，甚至更早一些只是一个基层干部时，他肯定不是一个‘老练的和残忍无情刽子手’。当他在外省工作的时候，他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有些神经质，但却是一个相当愉快的人，他能够体谅别人，并且完全没有官僚的傲慢劲儿。这可能是他的一副假面具，但这一切更可能是斯大林主义下的制度，以及斯大林本人给予他的影响，以致于他变成了一个刽子手。无论如何，叶若夫后来的命运，他在内务人民委员部中的作用和行为，使许多从前了解他的人们都感到目瞪口呆。”^①

事实上叶若夫并不是一个某种魔鬼式的人物。他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幼小时即失去了父母成了一个孤儿，从十二岁起就由施略亚普尼柯夫一家抚养成人^②。青年时代的叶若夫身上并没有出现任何欺骗、仇恨和邪恶的性格，这点他和贝利亚不一样，贝利亚的性格从他生活的最初阶段就十分明显地表现出来了。那些在共青团或在苏联东部地区执行党任务，以及在他临时担任农业人民委员的时候就认识他，并与他共过事的人们曾告诉我说，那时他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干部，给人留下的是活泼愉快的印象，而且在任何方面都不是一个残忍的人。但自从他和斯大林初次见面之后，他就完全落入了斯大林的那种几乎具有催眠术魅力的影响之下。斯大林深知自己的这种影响，于是他便将叶若夫迅速地沿着权力的阶梯提升了起来。于1936年秋，叶若夫和斯大林开始准备新的逮捕和对原反对派领

① I·A·萨茨：《回忆散记》，未发表的手稿。——原注

② 亚历山大·施略亚普尼柯夫1937年被枪毙，他的妻子和女儿都被逮捕和流放。——原注

人的“装模作样”的审判，然而，他们最主要的目标，却是消灭党和国家的中央一级的领导人。

在《让历史来审判》一书中，我记录了从1937年至1938年间，成为他们的牺牲品的将近一千名知名人士的名字。这些人是在党中央、政府和经济部门、地方的党委会，以及中央执行委员会、工会和共青团组织工作的干部，他们当时是红军、红海军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指挥官、法官、检查官、科学家、作家、艺术家和外国共产党领导人。

此外，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不属于知名和显赫人物的名字，以后也应该被加进牺牲者的名单里。我个人收集的档案资料中，就有一个206人的名单。这些人都是州、地区、市和一些较大城市的市政区的党委书记。他们都是在那些年代里被消灭的。当然，这个名单还非常不完整，没有包括全部受难者。另一个名单上（也是不完整的）有129个人名，他们是各地区执行委员会主席、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各民族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以及市（较大城市的）苏维埃主席。我还有个共青团干部中被捕者的名单，其中有团中央委员和共和国、地区及大城市的团委书记，共126人，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都被杀害了。我们还可以开列出一个长长的、在苏联被处决的外国共产党人的名单，例如，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机关刊物——“共产党人”周刊，1969年4月3日发表了牺牲于斯大林恐怖之下的85位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名单。在由意大利共产党提供的同样的名单上，列举了120多人的名字。《让历史来审判》一书中，我没有提到的1937年至1938年间，被惩罚机构所消灭的大批科学家、作家、艺术家和演员中有：白俄罗斯共和国科学院院长I·Z·舒尔特；杰出的语言学家E·D·波里万诺夫；优秀的西藏学权威沃斯特里科夫；空气动力学专家K·I·斯特拉

霍维奇；历史学家M·A·萨维列夫；诗人尼古拉·克留耶夫和弗拉吉米尔·斯米连斯基；指挥家E·米柯拉译；艺术家O·什切尔宾斯卡娅和Z·斯米尔诺娃。这些还只不过是大量可以提及的人名中的几例而已。

总而言之，据我计算，从1936年至1939年间，近一百万党员（也可能还超过这个数字）在清洗时期被杀害了。那些在1933年至1934年间被驱逐出党，但仍然自视为共产党员的人，也应该列进受害者的名单中去。这部分人1933年达80万之多，1934年又有30多万人。这些党员中，即使不是大多数，也还是有许多人于后来被捕。当然，1937年至1938年间，也有些非党群众遭到了逮捕，但这些人主要都是那些被捕的共产党员的亲属、朋友或同事。众所周知，在那些年代里，非党群众晚上躺下来睡觉时，他们的心境要比共产党员安稳得多，因为三十年代末的“大恐怖”主要是针对党内的。1937年，某个人虚构了一个“故事”，并把这个“故事”小心地散布了开来，“故事”中讲道：

“夜半三更的时候，有人在拳打脚踢某个人家的房门，有一个粗野的声音喊叫着：‘我是内务部的，开门！’于是紧锁着的门里面有人回答说：‘可我们是非党人士呀！共产党员在楼上。’”

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一书中和其他许多地方曾一再声明：他并不认为于1936年至1939年间被捕的共产党员是“大恐怖”的牺牲者，因为他们之中大多数人都参与了1918年至1922年的红色恐怖，并且直接或间接地为1929年至1933年反对农民和老知识分子阶层的暴行卖过力，索尔仁尼琴写道：“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即那些直到最后的时刻，还在协助刽子手把别人送上刑场，甚至自己还高举过斧头杀过人们，他们也死去了，那么，他们究竟是真正的牺牲者呢？还是另一类型

的刽子手?!”^①

托洛茨基对三十年代初的党和国家的官员，从未表示过恭维。在他看来，他们都是一些严重蜕化了的“热月”分子^②、官僚分子和党棍；这些人已经变成了革命向前发展的障碍。这些丧失了斗志、意志衰退的人们，已经变成了一堆废物，在道德上和心理上早已举手投降了，而现在他们正象“恭顺的官员”那样活着，精疲力竭，端着一杯茶，在他的领导人面前大发牢骚，一肚子不满。托洛茨基还批评了那些最后的“反对派”和他自己的支持者，他写道：

“但是，至少这些人（即：恭顺的官员）没干欺骗的勾当，没有装扮成雄鹰，没有卷入反对派的斗争，也没有写过自己的政纲。但他们却慢慢地、悄悄地由革命者蜕变成为官僚分子。我们不应该认为“反对派”能够消除热月党人的影响。我们亲眼见到过一些老布尔什维克，为了维护他们自己的观点和党的传统，为‘反对派’贡献了自己最后的力量。对一些人来说，具有决定性的年份是1925年，对另一些人来说是1927年或1929年，但是最后，他们自己的精力已经耗尽，他们的神经已无法再经受住新的打击了。”^③

托洛茨基的看法不可避免地导致人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那些被斯大林所消灭掉的人们是命该如此，而只有几个人属于例外。托洛茨基认为克鲁普斯卡娅是个特殊的例子，当他听到她的死讯时，曾写下了下面的讣告：

“我们绝不能因为在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身上，没

① 见《俄罗斯思想》（1975年1月16日）。——原注

② 热月分子，1794年7月27—28日，富歇·巴拉斯等人领导了政变，推翻了以罗伯斯庇尔领导的雅各宾党人的专政，从而结束了法国大革命。由于7月在法国革命日历中为热月，故这次政变历史上称之为热月政变，政变参加者为热月分子。——中译注

③ 《反对派简讯》第1—2期（1929）第15页。——原注

有发现与波拿巴主义的官僚分子公开决裂的行动而责备她。许多更有主见、更有才智的人，都有犹犹豫豫的表现，他们都曾试图同历史和死神玩捉迷藏的游戏。克鲁普斯卡娅具有高度成熟的个人责任感和足够的个人勇气，她那种罕见的勇气是来自她的信念。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向列宁的伴侣——一位无可指责的革命家和历史上的一个最悲剧性的人物告别。”^①

在这个例子中，不难看清托洛茨基的看法。为了证明他在列宁晚年同列宁的亲密关系，托洛茨基引用了一些列宁对他的工作所作的最带有褒奖的提法，并且一再重复“十月革命”之后列宁讲过的一句话：“我们之中没有一个比托洛茨基更好的布尔什维克。”但除了列宁的信件和讲话之外，他还使用了许多列宁死后克鲁普斯卡娅写给他的信件。如果他对克鲁普斯卡娅发表一些不太好的评价的话，那么他就会有损她对托洛茨基所作评价的正确性。

无可非议，任何一位历史学家（同样也适用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是不会接受托洛茨基对克鲁普斯卡娅的这种评价的。克鲁普斯卡娅无疑是一个悲剧性人物，她目击了她的亲密朋友和列宁最信任的同事们的毁灭。但她却保持了沉默，并且很快地放弃了抵制斯大林或内务部行为的那怕是最微小的企图。大段大段地颂扬斯大林的文字，被编辑们和出版人员插进她于1937年至1938年发表的几乎所有的文章和讲话中，然而，她也并没有提出过抗议。

克鲁普斯卡娅保持了沉默的原因是什么呢？许多发现自己已被投入监狱的共产党员几曾被这个问题所困惑，许多五十年代获释出狱的幸存者，曾继续寻找过关于这个问题的合理解

① 《反对派简讯》第75—76期（1939）第32页。——原注

释。当然斯大林和贝利亚完全可能将她秘密地害死，但是，甚至对他们来说，明目张胆地逮捕她也是不敢出此一举的。有关此问题，我曾问过一些了解克鲁普斯卡娅或曾在她属下工作过的老布尔什维克。他们所有人的答复有一点基本上是一致的，即早在1937年之前很久的时候起，克鲁普斯卡娅已被斯大林从精神上摧垮了，她已经强迫自己屈从于他的意志。

罗伯特·康奎斯特在《大恐怖》一书中引用了A·奥尔洛夫^①——一位叛逃到西方的内务部高级间谍——所讲的一件事情，他说：“斯大林为迫使她保持缄默而使用了什么手段，人们是不能得知其详情的，据说斯大林曾对她表示过：如果她不停止对他的批评，党将宣布不是她，而是老布尔什维克叶莲娜·斯塔索娃是列宁的遗孀。他还严厉的补充说：‘党是能做到一切的’。”^②

老布尔什维克I·A·萨茨说，这一定只是一种“谣传”，因为没有事实根据，他说：“那时，有许多谣言四处流传着，其中许多来自于卡尔·拉狄克，我确实相信机智和玩世不恭的拉狄克或其他什么人，是能够使这样的故事在“十四大”之后得以流传开来，并且可能已传到了内务部的圈子里去了。虽然这种谣传在某种程度上说，是象征了当时存在的气氛，然而把它当作事实就未免太天真了。”^③

根据萨茨的看法，当克鲁普斯卡娅同意在她的第二版《列宁回忆录》出版时，删去几处重要章节，并允许进行编辑性的修改时，她已经完全被摧毁了。三十年代初期，她是一个完全

① A·奥尔洛夫，原内务部高级干部，参加过西班牙内战，1936年拒绝回国，1954年出版《斯大林罪行密录》（香港中文版）。——中译注

② 罗伯特·康奎斯特：《大恐怖》第126页。——原注

③ I·A·萨茨：《回忆散记》，未发表的手稿。——原注

与世隔绝的人物，同工人和农民的接触都被切断了，她和教师们不能有任何真正的联系，她的周围除了诸如薇拉·德里佐这样少数几个亲密朋友陪伴以外，没有任何其他可谈点什么的人与之来往。她不再有参加党的一般生活的奢望，从而把她的精力，集中在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上。但于1929年，因为整个人民委员部的执行委员会，抗议政治局作出的有关职业教育的政策而提出集体辞职，因而卢那察尔斯基的人民委员职务，被A·布勃诺夫所取代。克鲁普斯卡娅的辞职没有被接受，她的关于综合技术教育的设想也被付诸东流。尽管她不同意新政治局的措施，但她还是作了让步。当布勃诺夫在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不是不理睬她，就是羞辱她的时候，克鲁普斯卡娅一直保持沉默。最终除了离开人民委员部之外别无他择，她不得不隐退了。当然，对克鲁普斯卡娅来说，这是一个悲剧性步骤，但事情也不是象托洛茨基所说的那样简单，即她仅仅是缺乏坚定的勇气，而是因为她又老又病和丧失了斗志。

有些作家，对于1936年至1939年间被杀害的党的一代工作者，持有不同的看法，将他们在各个方面理想化。维克多·谢尔盖的小说《图拉耶夫同志案件》中的主人公基里尔·卢布廖夫，是一位老布尔什维克，根据斯大林的命令他被处决了。内务部人员在他的笔记本上发现了下述的一段话：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杀害了这么多的人——这些人正是我们最大的力量所在——如今又轮到我自己了……，我们是一批非同寻常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正走向毁灭的原因。史无前例的半个世纪，造就了我们这一代人……，我们是在斗争中成长的，我们没有成为两种思潮的俘虏，其一是“神圣俄国”的思潮，另一个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影响。同时我们也从这两个思想世界借鉴了它们最有生命力的因素，即：调研精神、大胆革新、

相信西方十九世纪的进步、农民群众对真理和行动的直感，以及由于许多世纪以来的暴政而形成的造反精神。

我们在一定的程度上，已经变得清醒和超脱了，这便给新的和旧的既得利益者造成了困难，也使我们不可能使自己同反动派同流合污。当我们掌权的时候，我们被真实的、由于我们自己的行为而产生的传说所包围。然而我们又是如此的危险，以至于我们的毁灭会超出肉体的毁灭，我们的尸体上还会被涂上背信弃义的谎言。

整个世界的重量都压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简直快被这种重量压垮了。在这场成功的革命中，还有大量既不打算积极参加，也并非不支持它的人们的汪洋大海，也快把我们淹没了；……对那些在革命中一帆风顺的人们来说，我们则代表了冒险和危险……。因为我们需要的是继续创立丰功伟绩的勇气，而其他需要的是更多的安全、平静、忘却艰难困苦和鲜血，此外就再无所求了……。”^①

毫无疑问，关于三十年代被清洗掉的那一代布尔什维克的情况，应该在上述两类极端不同的人们之间，去寻找我们的答案。

我当然并不想为那部分共产党员开脱罪责，他们曾积极地参与了对农民，对臆造出来的“破坏分子”或是对其他党员采取的野蛮行动。在《让历史来审判》一书中，我已经提到过这样的人，如：波斯蒂舍夫、埃赫、贝塔尔·卡尔梅科夫、阿马图尼、特里泽·舍鲍尔达耶夫、克雷连科、沙朗哥维奇和其他的一些人，在他们自己于1937年至1938年间成为刽子手刀下的牺牲者之前，曾将成千上万的无辜人们送上了死亡道路。安东

^① 维克多·谢尔盖：《图拉耶夫同志案件》（纽约，双日出版社，1963年），第358—360页。——原注

诺夫·奥弗申科的例子是很有趣的，作为彼得格勒“十月起义”的最著名组织者之一，他也许是谢尔盖小说中的主人公的模特。斯大林将他送到了西班牙，在那里，他在“消灭”托洛茨基分子（帕乌姆^①）和无政府主义团体的活动中大打出手，完全不想考虑在西班牙建立人民阵线的要求。无政府主义者和帕乌姆的极端分子在政治上是极左的，这导致他们犯了许多盲动性的错误，但是在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他们却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具有各种不同观点的共和党人，本应为了共同的斗争目标而抛弃他们之间的分歧，把他们的力量联合在一起。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那时无政府主义者在卡塔尔尼亚是握有实力的。他们在工人之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在1936年至1937年的冬季，许多前线战区都掌握在帕乌姆领导下的民兵组织的手中。然而，由于具有不同观点的共和党派别之间的斗争，还在继续，这就损害了西班牙共和国的防卫力量，从而有利于法西斯主义在西班牙的胜利。安东诺夫·奥弗申科的活动完全是遵照斯大林的命令行事的，然而当他于1938年回到莫斯科之后，他却被捕并被枪决了。

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书记A·米尔沙柯夫一直到他自己被捕之前都是个最积极揭发别人的人物，许多共青团的工作人员都是根据他所提供的“材料”，而被投入监狱的。甚至在1937年中央委员会的2月至3月全会上，尽管在叶若夫向全会所作的报告中，已经明显地对中央委员们进行了威胁，然而却没有一个人对党内正在扩大化的镇压措施提出过强烈的反对意见。当莫洛托夫在他作的关于“工业部门中的破坏情况”的报告中，谈到破坏活动在轻工业部门已产生的作用时，瓦雷基斯曾对轻工

^① 帕乌姆：The POUM，托洛茨基派团体的缩写，全称不详。——中译注

业人民委员柳比莫夫喊道：“听听这些情况！听见了没有？！你可是说过，轻工业部门中从来没有钻进什么破坏分子。”这件事之后不到一年工夫，瓦雷基斯和柳比莫夫都遭逮捕并被处决了。通常，逮捕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应由加里宁亲自批准，1937年，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例会期间，加里宁的秘书将委员会的四位委员一个一个地叫到加里宁那里，加里宁流着泪签署了逮捕他们的命令，他的命令被等在隔壁的一个内务部行动小组立即执行了。^①

有些共产党员甚至在度过了监狱或集中营生活之后，还继续为斯大林辩护，并企图证明恐怖时代的政策是对的。老布尔什维克V·K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当然，我从未想象过布哈林和托洛茨基是盖世太保的特务，或者他们曾打算谋害列宁。此外，我也很清楚，斯大林也从未相信过这类说法。但是我曾认为1937年至1938年的审判，是一种具有远见的政治战术，并认为斯大林在如此严峻的环境中一劳永逸地消灭形形色色的反对派是正确的。我们毕竟是一个被包围的堡垒，我们不能不纯洁我们的队伍，不能给怀疑和动摇留下一点余地。那些理论性的论战对‘广大群众’难道有什么意义吗？大多数‘普通的人民群众’甚至从来没想过左派和右派之间的区别……。因此，所有的异端分子，所有类型的怀疑论者，不得被描绘成为如此令人厌恶的恶棍，以至于令其他人望而怯步。他们会变为彻底被人民唾弃、痛恨和诅咒的人，……在监狱中（V·K公开地宣称），我甚至变成了一个比过去更顽固的斯大林分子。我确信，虽然内务部的大多数人都是一帮平庸的野心家，只是一伙仅仅关心自己切身利益的愚昧

^① P·阿克谢诺夫（原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喀山市苏维埃主席，是在加里宁办公室被捕人之一）的证词。——原注

之徒，但他们这些专横的行为，却仍然是为正义的事业服务的，并向我们所期望的目标迈了一大步。鉴于这种原因，这些错误和不公正的个别例子，无论如何不能改变整个国家的面貌，并且不能阻挡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胜利前进。”^①

当然，象V·K这样的人在监狱和集中营里是不多见的。总的来说，我反对索尔仁尼琴的观点，他的评价只适用于在清洗中死去的少数人。雅哥达、叶若夫当然不能和牺牲者同日而语，他们不是牺牲者。其他刽子手或他们直接的、自觉的帮凶，当然也不能被尊称为“牺牲者”。然而，在死于三十年代的一、二百万（其估计数字有许多种）共产党员之中，有各种类型的人，他们对上述这些年代里所犯下的罪行，应该承担责任的程度也是不同的。有些人虽然犯了错误，但他们是诚实的，或者是另一种崇拜——对党纪的崇拜的牺牲品；许多诚实和无私的人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但已经为时过晚了。有许多人对国内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到非常苦恼，但他们找不到改变这种状况的方法。用我们现在所了解的情况来看，尽管说党作为一个整体，对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事件应负有全部历史的和政治责任，然而，把他们不加分别地混为一谈，统统称之为罪有应得的罪犯是过于简单化了。这种认识也同样适用于“契卡分子”，虽然这个组织特别应负重大的责任。然而我却不能不把一位名叫阿尔图佐夫的契卡人员看作是恐怖的牺牲者，在被处决之前，他在死牢的墙上用血写下了下面的一句话：“杀死斯大林是一个诚实人的职责。”

大规模的镇压活动于1938年秋开始有所缓和，当时斯大林以极其伪善的作风，任命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来调查内务部的工

① 未发表的手稿。——原注

作，贝利亚和马林科夫都是该委员会的成员。为了使贝利亚能够接触到全部内务部的档案，根据卡冈诺维奇的建议，贝利亚被任命为第一副内务人民委员。该委员会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了许多“非法行为”，而后，对于这些发现的结果，莫洛托夫、维辛斯基和贝利亚签署了一份给中央的调查汇报，汇报中认为，在审讯和复审案件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暴行。几周之后，中央委员会批准了两个决议，即：《关于逮捕应置于监察机关监督之下和关于调查方式的决议》和《关于在安全机构中录用忠实人员工作的决议》。决议被批准后还不到两周，叶若夫便被撤掉了内务人民委员的职务，其后，作为水运人民委员，他在这个职务上残喘了几个月。因为叶若夫是中央委员，所以他照例参加了2月举行的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然而在大会上提出的新中央委员的名单中，却没再出现他的名字。

1938年底和1939年初，敖德萨区的党委第一书记E·G·费尔德曼以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代表和以敖德萨代表团团长的身分出席了大会的“元老委员会”^①。有关这次会议，他给他的朋友们留下了如下的描述：

“当大会接近闭幕的时候，元老委员会聚集于克里姆林宫的某一大厅中。我记得好象在台上放着一个长桌，在长桌前方就坐的有安德烈也夫、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斯大林则在他们后面——在远远的后排左角上坐着，吸着他的烟斗。安德烈也夫发言说，在大会即将结束自己工作的时候，需要提出中央委员会的候选人名单。首先被提名的是那些即将要离开中央委员会的人，其中当然不包括那些已经成为死者的人们。然后就轮到叶若夫。

^① 即“老布尔什维克协会”。——中译注

“有什么意见？”安德烈也夫问道。在短暂的沉默之后，有人说，叶若夫是一位忠于斯大林的人民委员，这是大家都了解的，因此他应该连任。

“有反对的吗？”又是一阵沉默，然后斯大林请求发言。他站了起来，走向长桌，仍然吸着他的烟斗，喊道：

“叶若夫！你在哪儿？到这边来！”叶若夫从后排站了起来，向长桌走去。

“好，你对你自己怎么看？”斯大林问道，‘你适合做中央委员吗？’

“叶若夫的脸色唰地一下白了，他用嘶哑的声音回答说，他不明白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他说他把全部生命都献给了党和斯大林，他热爱斯大林胜过热爱自己的生命，他不明白为什么提出这样的问题？

“真的吗？”斯大林讥讽地问道，‘那么谁是弗里诺夫斯基？你认识他吗？’

“是的，的确，我认识他，’叶若夫回答说，‘弗里诺夫斯基是我的副手，他……’

“斯大林打断了叶若夫的话，然后开始问他有关其他人的情况：谁是沙皮罗？他认不认识雷若夫（叶若夫的秘书）？费多罗夫怎么样，等等等等（所有这些人已经被逮捕了）。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您是知道的，那是…我…我自己…揭露了他们的阴谋，我曾向您汇报过他们的事……。”

“斯大林没有让他继续说下去，是的，当然是你！当你感到你的把戏要失败的时候，你便急急忙忙地来了。可是以前呢？以前有过一个要谋害斯大林的阴谋。你的意思是想告诉我，内务部的上层人士曾组织过一个阴谋，而你不在其中，是吗？你以为我是个瞎子吗？”斯大林接着说，‘好，你过来！想想看！你曾

派过什么人来警卫斯大林的？他们为什么带着左轮手枪？为什么带着左轮手枪的人那么靠近斯大林？为什么？是打算谋害斯大林吗？如果不是被我看到了的话，那会怎么样？’

“斯大林指控叶若夫以一种疯狂的方式管理内务部，逮捕无辜的人们，同时又掩护另一些坏人。

“怎么样，休息一下吧！同志们，我不知道这样一个人能不能当中央委员？我有怀疑。当然，要仔细考虑一下，……这要由你们来决定，……但我对此有怀疑。’

“无疑，将叶若夫从名单中勾掉的动议被一致通过了，会间休息之后，他再也没有回到这个大厅里来，也再没有人在大会上见过他。”^①

然而，直至几天之后，因为水运人民委员部正在召开部务会议，叶若夫未遭逮捕。但自从叶若夫被派去任这个兼任职务（自1938年4月8日）的时刻起，尽管叶若夫很少光顾他的这个新人民委员部，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便处于一种恐惧和工作停滞的气氛之中。在被免去内务部的职务之后，他出席了水运人民委员部的部务会议，但并未参加会议的讨论。他默默地坐在那里，有时用纸叠几个小飞机或纸鸟，将他们扔到空中，如果它们飞到了椅子下面，他就爬下去将它们拾回来，然而他却始终沉默不语，一句话也没有说。当内务部的特务终于出现的时候，叶若夫站了起来，他的表情几乎是高兴的，他说：“这一时刻我已经等得太久了！”他将他的枪放在了桌子上，随之，就被他们带走了。^②

1939年至1941年间，有少数以前遭到逮捕的人被恢复了自由和名誉。当局对待那些受审查的人们，态度变得宽厚了一

^① 见《E·G·费尔德曼的证词》，——原注

^② 见《V M的证词》，V M为前水运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原注

些，虽然仍然使用严刑拷打等办法，但和过去相比，其规模还是小得多了。这是一个具有以下特点的阶段：在这段时间里，法院和种种调查机构，开释了许多人，其数量超过了内务部所能容忍的程度。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许多问题已被查清的人，却并没有被释放出狱，这样，有关他们案件的调查工作，又再一次从头开始了。为了防止纠纷和难以预料的事态的扩散，这些“免了罪”的囚徒，被集中到同其余犯人隔离起来的单独牢房里。因而，除了被判有罪的人们的专门牢房之外，在一个时期内还为“免了罪”的囚犯设立了专门的牢房，毋需说，这些牢房的条件与过去他们坐过的牢房相比，并没有什么区别。

历史学家从未试图真正搞清楚，为什么斯大林于1918年在察里津发动了大规模的恐怖？对1930年至1932年间，他在农村制造恐怖的动机也缺乏足够的研究^①，然而对三十年代末期的大恐怖，却出现了许多不同的解释。曾有过一种说法，即斯大林已被内务部所左右；也有人说他已经变成了个疯子；又有人说，他害怕败露他以前和沙皇秘密警察的关系。所有这些解释，在《让历史来审判》一书中，均遭到了批判。我确信，斯大林应该对他的行为负完全责任，这些反党的恐怖行动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是预谋的。我还相信，正是斯大林无节制的虚荣心和权力欲，促使他制造了恐怖。他决心象一个独裁者那样，使自己处于不受任何约束，能绝对控制国家一切的地位上。为了树立自己在创建年轻的苏维埃国家方面的功绩，斯大林推行了“个人迷信”。然而，他所宣称的功绩实际上是并不存在的，而当党和国家的骨干力量，成为他要达到上述这些目标的障碍时，斯大林就毫不犹豫地都将他们都全部消灭了，正如他对待富裕农民或“资

^① 指集体化期间蓄意使农民陷入饥荒的作法。——中译注

产阶级投机分子”时一样，他一点也不心慈手软。

对于1936年至1939年大清洗的企图，最近又出现了一种新的解释。这种新观点主要出现在米哈依尔·阿古尔斯基写的一系列文章之中。阿古尔斯基认为：1917年的革命不仅是一场民族革命，而且也是一场社会革命。这场革命，首先是大俄罗斯帝国的边远民族地区反抗宗主国的胜利。作为这次革命的结果，非俄罗斯民族成分在新政府的领导人中占有优势地位。然而，在三十年代中期出现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趋向，阿古尔斯基写道：

“大清洗的原因要深刻的多。在大清洗的烟幕下，发生了一场深刻的社会和民族（同样重要的）变革，其结果是：一个由大多数出身于农民的新阶层执掌了政权，在这个新阶层中没有多少异族人（犹太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波兰人等）。这是一个大斯拉夫国家，对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所进行的忽视民族因素的“国际主义者”和“世界主义者”的试验的反动。斯大林仅仅是使这个新的阶层掌握了权力。这个新阶层并不是斯大林创造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936年至1938年间的清洗，可以看作是俄国内战的最后一幕。

为了进行分段的清洗，并为最终消灭那些在革命和内战中参与决策，参与党的生活，以及了解1937年前党的组织情况的积极分子，出现了一个替代老一辈精萃人物（虽并不能将他们理想化）的，却又并不打算继承其前辈传统的新阶层。显然，事实上也是，造就这批新人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其成员直至1937年只应处于最低的生活水平上。”^①

无疑，阿古尔斯基的论点中确有些真实的因素。然而，他只是选择了那些年代中所发生的某一个方面的，但不是最关键

^① M 阿古尔斯基：《白俄罗斯的诞生》，时代周刊的文学增刊，1972年6月30日。——原注

的事件,并把它们认作是最基本的因素。很明显,在1934年党的领导人和1939年党的十八大之后的领导人之间,有着一定程度的延续性。留在政治局里的不只是俄罗斯人莫洛托夫,而且还有亚美尼亚人米高扬,犹太人卡冈诺维奇。当然,还有斯大林——格鲁吉亚人,另一个更加地道的格鲁吉亚人贝利亚也进入了政治局(代替了俄罗斯人叶若夫)。在以前的政治局委员中,安德烈也夫、伏罗希洛夫和加里宁,仍然被保留了原来的职位。日丹诺夫、赫鲁晓夫于1939年也都进了政治局,很难说他们是来自于“最低生活水平”的阶层,因为他们二位在进入政治局之前,就早已是中央委员了。

众所周知,当时的俄国革命政党的成员中,有过不少犹太人、拉脱维亚人、波兰人、芬兰人等,高加索的各民族也有许多代表人物,鉴于当时俄罗斯帝国中各少数民族的恶劣处境,这种情况是很容易理解的。这些少数民族,都处于各种形式的社会的、经济的压迫之中,这种压迫甚至是不堪忍受的,而同时他们还遭受着民族压迫。虽然如此,这并不能说明:1917年的革命是代表了大俄罗斯帝国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的胜利,“十月革命”的政治军队主要还是由俄罗斯人组成的,“十月革命”的核心是同俄罗斯士兵,即穿着军装的农民结成联盟的俄罗斯工人阶级。虽然在革命后的党政领导机关中,确有一定百分比的非俄罗斯人,但俄罗斯人却一直还是居于多数。例如: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是在内战结束和成立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后,首次召开的代表大会,它的民族组成情况是很说明问题的:

出席大会的代表中:	占%
俄罗斯人	60.8
犹太人	11.3
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人	7.1

乌克兰人	4.7
格鲁吉亚人	2.7
亚美尼亚人	2.4
白俄罗斯人	1.2
吉尔吉斯人	1.7
鞑靼人	1.0
其他	7.1 ^①

这些数字绝不能证明阿古尔斯基的分析是正确的，特别是考虑到这样的事实，即在以后各次代表大会中，俄罗斯人一直处于稳定的多数地位，而犹太人、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的数量却逐步下降（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的数量却有所增长）。虽然十八次代表大会和其后的代表大会的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报告中，没有再提供有关代表们的民族成分的数字，然而间接的证据说明：俄罗斯人和其他民族间的比例基本上没有改变，并且这种状况在党政高层人员的组成中，也是如此。1936年至1938年间的镇压措施，导致了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芬兰人、波兰人和匈牙利人的数量，在苏维埃的头面人物之中显著地下降，这可以从当时拉脱维亚、爱沙尼亚、芬兰、波兰、匈牙利并不属于苏联的联盟成员这样的事实得到解释，因而这些民族不能成为新干部的来源。在苏联头面人物中间犹太人也减少了许多，B·D是《俄国犹太人的今昔》一书的作者，关于这个问题他作了如下的叙述，他写道：

苏维埃的知识分子及党政工作人员，在三十年代受到的镇压比起工人群众要严酷得多，在知识界和党政工作人员中的共产党员们，遭到镇压的程度也远远大于非党人士。最后，在共

① 联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速记稿（莫斯科，1968年）第420页。——原注

产党员中间，入党时间长的党员较之新入党的党员，则更为严重地遭到了整肃和清洗。准确地说，在犹太人中间白领工人和知识分子多于产业工人，因而，犹太共产党员遭到清洗的百分比，往往是二倍、三倍，有时则是四倍地大于其他民族的党员。在党的组织里，老党员中有极大一部分是犹太人。虽然当时并没有打算将犹太人作为专门的打击目标，然而综合上述所有不同因素，其结果是：犹太人作为清洗的对象，较之其他民族，遭受了十分巨大的损失。他们失去了他们中间的最杰出的人物，而这些人曾将自己的一切贡献给了革命。^①

这种看法比阿古尔斯基所写文章的结论更接近事实。此外，人们不能不注意到：1939年之后，高加索血统的人们（特别是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的数量在内务部上层，以及那个时期苏维埃最重要的头面人物中剧增。同时可以看到，更多来自中亚细亚和哈萨克斯坦的人们，也被安排在国家领导的岗位上。斯大林曾助长了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这是事实，而这也都曾反映在他选择干部的政策中，但上述这种情况是在稍后的战争时期和1948年至1953年这段期间中才出现的。

从遥远的地方观察苏联各种事件的托洛茨基，从来没有真正弄明白过大清洗的规模及其背后的真正原因。的确，他谴责过那些对前反对派领导人的“装模作样的审判”，也谴责过党内正在进行的大规模的镇压活动。但是，在企图评价可能会出现后果的时候，托洛茨基却继续沉湎在幻想之中，他写道：

“暂时拯救了斯大林统治的血腥清洗，彻底地动摇了波拿巴主义的社会和政治基础。斯大林的悲惨使命正在接近尾声，他

^① B·D：《俄国犹太人的今昔》，未发表的手稿。——原注

越是感到他不再需要任何人，就越接近了他自己也不再被人需要的时刻。如果能够通过改变所有制形式，使官僚们成功地使自己变成一个新的有产阶级，这个新阶级将会找到其他的一些领袖人物。这些人同革命的过去没有任何关系，但却受过良好的教育。人们对斯大林的成就，是不会说一句感谢话的。公开的反革命会采取和当年指控托洛茨基主义一样的方式，迅速地除掉他。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将会沦为他自己所创建的制度下的牺牲者。然而，这条道路绝不是注定非此不可的，人类正义一次进入一个战争和革命的时代，那时，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会象一个纸片搭的房子一样地倒坍。亚洲和欧洲的革命动乱，将抢先在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之前推翻斯大林集团，并为这个集团将在劳苦大众的打击下垮台，而作好准备。在这类的事件中，斯大林甚至找不到理由去指望别人会感谢他。”^①

莫斯科的第二次“装模作样的审判”之后（审判拉狄克和皮达科夫），托洛茨基决定组织一次“反审判”，其目的在于揭露这场在苏联发生的司法滑稽戏。克服了很多困难之后，托洛茨基还是成功了。在他的美国追随者的帮助下，成立了一个由美国著名哲学家、八十岁的约翰·杜威为首的专门委员会。虽然有许多受到托洛茨基邀请的重要人物拒绝参加他所倡导的这个委员会，但是，代表各种不同政治倾向的社会名流组成的委员会，还是成立了。委员会在严密的警卫下，于墨西哥托洛茨基的寓所里举行了听证会。约翰·杜威拜访了苏联大使馆和墨西哥共产党总部，邀请他们派代表出席，但正如可以预见的那样，他们都谢绝了。委员会于1937年4月10日召开了首次会议，会议几乎是未间断地进行了一个星期之久。西方的舆论界对这一

① 《反对派简讯》第58—59期（1937年）第4页。——原注

事件的反映是微弱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因为在资产阶级舆论界的眼里，托洛茨基本身就是一个危险的革命家。另一个原因是：“反审判”的目的过于狭窄，仅仅是为了确定托洛茨基和他的儿子列夫·谢多夫，是否犯有在莫斯科的审判中所加在他们身上的罪行。因为这些罪行，他们在莫斯科的缺席审判中被判处了死刑。

杜威和其他的委员会委员用了几个月的时间，研究了许多文件和托洛茨基的证词，在召开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之前，没有公布过任何结论。会议结束时，国际委员会对“莫斯科的审判”作出了如下的裁决：

“委员会认为：

(1) 莫斯科的审判使任何一位不带偏见的人确信：这次审判没有为查明事情的真相作出任何努力。

(2) 对所有的供词应进行最严肃的分析，委员会认定：这些供词本身由于其固有的荒谬性^①，因而不能被认为是代表了事实的真相，不管它们是用什么手段获得的。”

排除了所有针对托洛茨基及其儿子的指控之后，委员会作了如下的裁决：

“(20) 基于一切证据，我们认为：托洛茨基从未鼓动、策划和企图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相反，他从来都毫不妥协地反对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以及资本主义在任何地方的存在。

(21) 我们认为：检察长荒谬地篡改了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前、十月革命中和十月革命后的作用。

(22) 因此我们认为：莫斯科的审判纯属诬陷。

(23) 因此我们认为：托洛茨基和谢多夫无罪。”^①

① 《无罪，——关于委员会于1938年调查莫斯科对列夫·托洛茨基指控的报告》，纽约，1972年第2版，第21—23页。这一报告曾在第62—63期（1938年）《反对派简讯》的第1—2页上发表过。——原注

托洛茨基的传记作者——艾萨克·丢彻尔告诉我们，“托洛茨基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裁决。然而，这个裁决的影响，如果不能说是微不足道的话，那么起码也应该说是很微弱的。在美国，杜威的呼声虽然引起了人们的一些注意，但在欧洲却根本无人理睬，那里的舆论都集中于那一年所发生的更重要的事件上，在慕尼黑事件发生之前的那一年里，人们更关切的是‘法国人民阵线’和‘西班牙内战’的胜败兴衰。”^①

国际委员会的这次裁决，并没有能保护托洛茨基免于斯大林的报复。斯大林往国外派遣了内务部的特务去执行谋害托洛茨基的任务。1938年初，托洛茨基的儿子（也是他的亲密助手）列夫·谢多夫由于至今尚未弄清的、极其可疑的原因，死于法国的一家医院里。在苏联，谢尔盖——曾拒绝随父流亡国外的托洛茨基的二儿子，遭到了逮捕，并在被捕后不久被杀害了。同时，从沃尔库塔集中营开始，而后在所有的集中营里，都进行了大规模地处决托洛茨基分子的活动。这次屠杀是不加选择地进行的，他们枪决了所有自二十年代后期就被投入监狱的忠于托洛茨基纲领的人们，以及那些后来已经宣布反对这个纲领的托洛茨基分子。他们之中几乎没有一个幸存者。^②

整个1938年，野蛮的恐怖席卷了整个苏联，并在最后一次“装模作样的审判”之后达到了新的高峰。这次审判是例次审判的总结。托洛茨基为了继续保护自己，免于诽谤，他论证了在布哈林——李可夫——雅哥达受审的过程中，针对托洛茨基的指控的荒谬性。但是，他的抗议完全没有受到人们的理会。

① 伊萨克·丢彻尔：《流亡的预言家》(Oup, 伦敦, 1970年), 第393页。——原注

② 1956年至1957年间，有几千名老布尔什维克获释回到了莫斯科。在他们中间，我只找到了两名原托洛茨基分子和一名原季诺维也夫分子。——原注

此外，甚至对托洛茨基来说，恐怖的难以置信的规模，也是完全不可理解的。他同苏联的联系几乎全被切断了，在那些日子里，西方没有任何一人能够提供可以详细了解发生在俄国的有关情况的渠道。丢彻尔写道：

“莫斯科的审判引起了全世界的震惊和关注，而在各集中营的大屠杀，却是几乎在无声无息地、极其秘密地进行着。许多年过去了，其真相才得以被透露出来。托洛茨基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知道：通过审判所揭示出来的恐怖行为，仅仅是其很小的一部分。对发生在那里的事态的背景，他也曾作过一些判断。然而，即便是他，也没有能够判断或想象出来全部的真相，而且正如他的思维能力所能达到的那样，在他生前的短短时间里，他的头脑几乎不能理解审判的全部罪恶和含义。他一直断言反斯大林的力量正在涌现，并且越来越具有发言权和政治上的影响……。他不知道这样一个事实，这就是所有反斯大林的力量早已被扫荡殆尽，托洛茨基主义、季诺维也夫主义、布哈林主义已被血泊所淹没，象大西岛^①那样，已从政治地平线上完全消失了，他自己也已经成为大西岛的唯一幸存者了。”^②

在1938年至1939年的冬天，托洛茨基忙于新的第四国际的组织工作，他的支持者们设法召开了成立大会。然而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一个很狭窄的、托洛茨基分子的宗派主义会议，只有二十名来自不同国家的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托洛茨基本人则未能来参加。这个大会是在离巴黎不远的地方，在绝密的情况下召开的，前后只开了一天时间，从早晨至深夜，会议一直在

^① 大西岛——希腊传说。现在的大西洋底下曾经是一个岛屿，叫大西岛，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后沉没，即为现在的大西洋。——中译注

^② 伊萨克·丢彻尔：《流亡的预言家》第21页。——原注

进行，中途未曾休息。

托洛茨基曾对成立第四国际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他确信，这个新组织在未来十年的阶级斗争中，将起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在这场即将来临的战争之前的每个逝去的一天，都将有利于托洛茨基分子。他曾写道：预计第四国际将很快地赢得千百万名支持者，为“天翻地覆的暴风骤雨”作好准备。然而，历史的进程是完全不同的，它是更为错综复杂，并且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自称为托洛茨基主义者（他们至今还是这样自称）的极左组织，没能在工人阶级中获得有分量的影响。而托洛茨基本人的命运则是众所周知的：在内务部的特务们渗入进了托洛茨基支持者的团体时，对托洛茨基的长期围猎便大功告成了，其中的一个特务于1940年在墨西哥托洛茨基的住所里杀害了他。斯大林得胜了。他不仅慷慨地酬谢了所有参与这次行动的人，而且还允诺：只要他——斯大林还活着，就不允许任何人动一下这次行动的主要组织者的一根毫毛。有许多参与了斯大林罪恶行动的主要帮凶，到头来由于“知道的太多”而被干掉了，这种做法早已成了惯例，然而这一次斯大林的确恪守了他的诺言。

三十年代初，斯大林就已开始以间接的方式，试探劝说一位当代最杰出的作家撰写斯大林传记的可能性。但是，同里昂·福伊特万格^①和安德烈·纪德就这个问题所进行的讨论，最终却没有获得任何结果。这两位作家都愿意到苏联来，可是却没有一个人同意撰写斯大林的传记。因此，进行这项工作的沉重压力便落到了高尔基的身上。据老党员、高尔基的朋友——V·捷斯尼茨基说，高尔基终于屈从了，并同意承担这项任务。大

^① 里昂·福伊特万格：作家，1884年7月7日生于慕尼黑，自1933年流亡法国、俄国。1940年进法国集中营，1941年后生活在加里福尼亚，著有近代史等，死于1958年。——中译注

约在几个月的时间里，高尔基每天在早饭之后就和他的门锁起来，坐在自己的书房里，研究大量的由信使从中央委员会送来的文件卷宗。然而有一天，高尔基在饭桌上，当着捷斯尼茨基的面，搓着手，愉快地宣布说：他觉得这样的写法太令人肉麻了，因而他不得不停止这项工作。自此之后他从未再靠近过斯大林。最后，著名的法国共产党作家亨利·巴比塞答应承揽这项“创造性的任务”，他写了一本名叫《斯大林——通过一个人看待一个新世界》的书。这是一本在美学观点上是失败的，在历史研究中也是毫无意义的著作。据巴比塞说：“通过阴谋、诡计、行贿、政治措施和犯罪手段，通过夜间谋害政敌的手段……，某人可以成为一个国王或帝王，领袖或总理，甚至能够保持他的权力，然而，没有人能用这些方法成为一个共产党的书记。”^①

对上文中所说的一切，毋需作过多的评论。巴比塞没能活着亲眼看见1937年所发生的事件。在他那本有关斯大林的著作问世之前几个月——即1935年年底，他便与世长辞了。

^① A·巴比塞：《斯大林》（莫斯科，1936年）第61页。——原注

第六章

战争年代的斯大林， 1939—1945年

在这一章里，我将触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大林活动的某些方面，并尽可能地避免重述苏联国内外已经发表过的材料。

众所周知，德国人于1941年6月22日清晨对苏联发动的突然袭击，是完全出乎斯大林的意料之外的。当时他正在莫斯科郊外戒备森严的别墅里高枕无忧地睡大觉，而对德国入侵苏联却毫无防范。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就早已十分露骨地写道：“德国……只在这样的意义上看待法兰西的毁灭，即我们的人民终于能在另一个方向进行扩张了……，当我在西方达到目的之后，什么都不能阻止我去进攻俄国。”^①

对这些野心勃勃的词句，斯大林肯定是熟知的。那么为什么当时他同意和德国签订互不侵犯和友好条约呢？他的这一行动是有许多原因的。1939年苏联尚未准备好同德国进行战争，并且斯大林也非常惧怕一场大战。当时几乎所有最优秀的陆海军指挥员都被处决了，而接替他们的人则缺乏足够的训练和经验。军事生产的能力还没有发展到完备的程度，同时装备部队

^① 转引自D·M·普罗埃克特的《侵略与灾难》(莫斯科, 1972), 第42页。

——原注

的工作也才开始。在这样的情况下，斯大林企图利用欧洲的军事形势，将苏联边界进一步向西推移。无论人们从道义上或政治上如何看待，这些计划都具有潜在的战略上的重要意义。但这不是最主要的。事后我们去谴责斯大林——希特勒条约的签订是容易的，因为从这项条约中得益最多的不是斯大林而是希特勒。然而，于1939年，西方民主国家玩弄的是双重游戏，因此斯大林有实实在在的理由，担心德国在击败波兰之后，越过苏联边界，同时与英国和法国缔结某种反苏联盟的危险。斯大林希望先发制人地建立苏德之间的联盟，不管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并且图谋挑起西欧国家之间的冲突。这一次斯大林很容易地就成功了，因为希特勒也抱有同样的目的。然而斯大林万万没有料到的是：德国在西方的敌人于1940年夏季，就如此迅速地被击溃了。在那一年的春天，法国、英国、比利时和荷兰都拥有装备精良的，数量上优于德国武装力量的军队。大多数军事专家曾预言：西线的战争会是一场长期的拉锯战。然而，由于德国采用了闪电战术，西方军事形势急转直下，这种情况向斯大林提出了使他一时拿不出解决办法的困难问题。

当然为可能爆发的苏德战争所做的紧急准备工作已经着手进行，补充兵源，改善装备，扩大军事工业等工作都在迅速开展。对冬季芬兰战役的失败教训也进行了仔细的研究。然而，整个这一计划的效果是有赖于时间的，它所需要的时间比起历史所准备给与的要长得多。至于斯大林同希特勒之间的所谓“友谊”的真诚与否，毋需存有什么疑问。斯大林正在同德国、英国和法国玩着一场游戏，一场危险、复杂、照他自己的话说是狡猾的游戏，他确信在这场游戏中自己能赢得胜利。然而他失算了，在1941年输掉了这一局，虽然人们可以说：那时西方的许多政治家也同样是失败者。

战争的开局是灾难性的。德国军队一鼓作气摧毁了红军的主力，突进到顿河的罗斯托夫，攻占了基辅、敖德萨、白俄罗斯全境和波罗的海地区，一直推进到列宁格勒和莫斯科郊区。1941年，法西斯军队遭受了极其沉重的损失——伤亡一百多万人（与此相比，德国人在西线只损失三十万人）。然而与此同时，红军却至少损失了五百万人（死、伤，特别是被俘）。大片国土沦于敌手，几千万人民突然发现自己已经生活在法西斯的占领之下。这次毁灭性的失败是由许多原因造成的。曾参加过这些战斗的I·A·萨茨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战争的头几个月表明：对上至将军，下至连排级指挥员的大量减员所做的补员工作是微不足道的，同样，对军事学院教师和各学校及专科学校教师的补缺，也是微乎其微的。没有哪一次战争能象毫无道理的镇压年代那样，消灭掉了如此众多的军官。如果没有那次大清洗，德国人根本就不会长驱直入，一口气攻到伏尔加河，而且恐怕连第聂伯河都到不了。我手头现在没有有关那时军事人员和装备情况的精确材料，但我相信当时的形势对德国人并不那么有利。德国人在摩托化方面装备得比较好，然而在这方面赶上他们并不困难，特别是因为苏联已经有了德国人还没有的卡秋莎大炮。炮兵方面，在整个战争期间，德国人则从来没有赶上过苏联。起初，我们的空军力量是落后的，其原因仍然是因为在航空工业部门中的镇压阻碍了新型飞机的发展。德国的T—4重型坦克的机动性不如我们的T—34中型坦克，而且火力也不占优势。在苏联西部地区，苏联所拥有的师团的数量，几乎同德国师团一样多。但是如果计算一下部队在人口中的比例，我们在数量上则不占优势。我们还必须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苏联不得不在它的后方——远东和沿苏联整个领土的几万英里的边界线上保持更多的人员（军

事人员和非军事运输人员),而德国战线的内部联系渠道,则要比苏联的短得多。在战争开始的第一个星期里,我们失去了大量技术上和物质上的储备,这使得敌人得到了极大的好处。这些损失与我们暂时的军事劣势的基本原因有关——这就是军队干部在战前年代里所遭受的打击。德国人主要的优势在于他们出色的管理和联络,在于他们的战争机器各部分之间出色的协作,也在于他们的中下级指挥员乃至军士长的良好的基本地形学知识。苏联人民在前线和后方为此付出了几百万人生命的代价,并被迫丧失了大片领土。”^①

德国进攻苏联,以及战争第一天在边境地区击败红军时,斯大林虚弱地发了一通脾气,随之便深陷于颓唐之中。赫鲁晓夫在二十大的秘密报告中宣称:战争的第二天,斯大林将自己关在别墅里,拒绝会见任何人或发布任何指示,这样他便在事实上擅离职守了。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发表的大量回忆录,对赫鲁晓夫说法的真实性曾表示过怀疑。比如N·G·库兹涅佐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1941年6月22日和23日斯大林在“精力充沛地工作着”,而且在6月24日晚上,他自己曾亲眼见到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他的办公室里主持一个十分重要的会议。^②朱可夫元帅在回忆录中回顾了6月26日和29日同斯大林的多次接触。^③其他回忆录中也提到了在战争的最初日子里,一些人同斯大林的电话谈话。但是,许多这一类的证词,是六十年代后半期重新为斯大林恢复名誉运动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谢苗·铁木辛哥的回忆录证实了斯大林在这段时间内“失踪”的传说。^④

① 萨茨未发表的手稿。——原注

② 《十月》杂志1968年第8期,第138页。——原注

③ 朱可夫《回忆与思考》(莫斯科,1969)。——原注

④ 亚历山大·查科夫斯基的小说《在封锁中》,有一部分是根据铁木辛哥的回忆录写成。——原注

作为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元帅在战争的初期负责红军的工作，所有主要的命令都是由他签署的，其中有些命令意图不清、措辞混乱和对战术情况无知。虽然如此，但由于红军初期的失败而责怪铁木辛哥是不公正的，因为甚至早在战争之前，军事上所有根本问题都是由斯大林个人来决定的。国防人民委员无权指挥海军、边防部队或内务部的师团；他不负责运输系统，也不能对军事工业部门下达命令；他无权进行国民动员，也无权将民用企业转产以满足国防的需要；地方苏维埃和党的机构也不从属于他。所以，他无法组织起一个更有效力的防卫体系。自然，铁木辛哥愿意在他的回忆录中直截了当地叙述真实的情况。

朱可夫元帅的回忆录问世前几年，他先将回忆录录在了录音磁带上，这些录音就是他第一稿的基础，其打字稿长达四百页。在这些最初的叙述中——毋需说也是更为忠实的——朱可夫也肯定了斯大林在战争最初的日子里擅离了他的岗位。1966年，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写道：“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斯大林在当时最高统帅部做出的决定中起过任何作用。”^① 基于绝对可靠的证据，美国新闻记者哈里逊·索尔兹伯里就战争初期写道：“此刻，纳粹的进攻使斯大林处于一种濒于精神失常、身心崩溃的状态之中。他把自己禁关在他的房间里，不能够也不愿意参与国事……。在好几天的时间里，这个伟大的苏维埃国家根本就无人领导，苏联面对着致命的危险，象一个没有舵手的无畏战舰一样，茫然地漂泊着^②。”无论斯大林的仰慕者（其中有许多是苏联的指挥员）多么痛苦，斯大林在战争初期和战争

① 《军事史杂志》1966年第6期第12页。——原注

② 哈里逊 E 索尔兹伯里：《列宁格勒之围》（塞克尔和瓦伯格，伦敦，1969），第199页。——原注

紧要关头的表现，在他作为“杰出军事领导人”的荣誉上留下了难以洗清的污点。

斯大林于7月初重新回到了领导岗位上。7月3日他发表了首次无线电广播演说，用对他来说是异乎寻常的开场白向全体人民呼吁：“同志们！公民们！兄弟姐妹们！我们的陆海军战士们！我的朋友们，我现在向你们讲话！”^①据一个在那些年代里，曾在党的机关中工作的消息灵通人士说，这个演说稿是斯大林亲自在叶莲娜·斯塔索娃的公寓里写成的，斯塔索娃的意见斯大林尚能尊重。斯大林当时非常神经质，手在发抖。他向斯塔索娃念了演说的初稿，斯塔索娃的观点是倾向于教条主义的，她发怒了，她说：“这叫什么？难道你打算将整个国家拱手送给德国人吗？你光说撤退和毁灭。难道我们的国家和党真的就是这样束手无策了吗？神秘主义在你的身上已到了何种地步，我们怎么能打着亚历山大·涅夫斯基、苏沃洛夫之流的旗号来保卫我们自己……”。然而斯大林回答说：“单单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去唤起人民来进行这场战争，是不可能的。”

在这一点上，正确的是斯大林而不是斯塔索娃。尽管在战前的年代里，对俄国东正教会进行了长期严酷的迫害，尽管事实上几乎全体牧师都被关进了监狱——到了1930年莫斯科教区只剩下四位主教尚有人身自由，然而教会却从战争的第一天起就站在了爱国主义的立场上。早在6月22日谢尔基乌斯大主教便呼吁牧师和信徒们，并号召全体人民武装起来，敦促善男信女起来投入战斗。6月26日在莫斯科主显节大教堂里，谢尔基乌斯举行了一次庄严的感恩早祷，为俄罗斯祈求胜利。教会还从它当时已枯竭的财源中为红军捐赠了一笔相当可观的款子。

^① 《斯大林文选》(中文版，1962年8月)第262页。——中译注

当然，并非所有的教士都响应了谢尔基乌斯的呼吁。在德占区（如：几乎整个白俄罗斯）有一些教士转到了敌人方面，并希望德国武装力量尽快地取得胜利。然而这类人在教士和高级牧师中为数甚少。

在战争年代里，斯大林逐渐开始放弃他对教会的迫害政策，在教会和国家的关系中形成了一种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

1943年9月，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谢尔基乌斯大主教、列宁格勒的亚历克西斯大主教和乌克兰教区的尼古拉大主教。他们得到准许召集选举最高牧首的会议。数日后，谢尔基乌斯大主教被选为莫斯科和全俄罗斯的最高牧首。斯大林还同意重新开放那些早已被关闭但还未被拆毁的教堂，并授权教会为培养教士而开办专门的教会学校和一所神学院。有相当一批教士从监狱里被释放出来。斯大林当着新当选的谢尔基乌斯最高牧首的面，亲自命令莫洛托夫起草一份关于改善教会和国家之间关系的，由部长会议签发的法令。据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科学与宗教》杂志编辑部的高级人员说，斯大林向谢尔基乌斯提了许多建议之后，向谢尔基乌斯问道：

“好，为了进行正常的活动，教会还需要什么别的吗？”

“谢尔基乌斯保持沉默——他从来没有想到在苏维埃国家中能有这样的事情。

“‘我知道，’斯大林说，‘你需要一个杂志。革命前有一个《莫斯科东正教会》杂志——而你正是需要这样一个杂志，只是要弄到纸张和工作人员，现在可不是个好时候。……那么好吧！把这些记下来，’斯大林转向莫洛托夫说，‘要办一个莫斯科东亚教会的杂志，我们从《无神论者》杂志那里给这个刊物提供纸张和几位工作人员。’”

很可能这不过是一个典型的斯大林式的“玩笑”而已，也可能这个故事本来就是杜撰。然而于1941年战争开始后不久，《无神论者》杂志跟着其他几十家杂志一起，确实是停刊了。而斯大林同教会的关系则继续在改善，在战争和战后的年代里，教会的地位也因此而大大地巩固了。和那些顽固的教条主义者的意见相反，斯大林的新政策不仅对教会及其信徒有利，而且也是苏维埃国家的整体利益之所在，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在上述这一实例中，对斯大林的首创精神所带来的重大积极成果，应给予应有的评价，虽然并不能因此而饶恕他在战争最初几个月中的盲目和混乱的行为。

七十年代，有一些作者在大量出版的书籍和文章中，一再企图推翻那些证明斯大林及其最高统帅部，在1941年夏天处于混乱状态的证据。他们指出，虽然德国总参谋部在制订战争计划的时候，曾估计苏联在半年以内不可能动员六十个师以上的兵力，然而最高统帅部从6月底到9月初的几个星期里，却成功地将大约三百五十个师送上了前线。在一些有关战争的文献中也一再强调指出：1941年有一千五百多个工厂被疏散到了东部地区。

无疑，动员成百的师团，疏散大量的企业是斯大林、最高统帅部和所有军事及非军事当局异乎寻常努力的结果。然而这些事实和数据，完全可以用另外的方式来加以说明和解释。如果不存在大部分红军在1941年夏天被消灭或被俘虏的事实，那么也就毋需动员多达三百五十个师的兵力，急急忙忙把他们送上前线。这些士兵多数装备很差，缺乏必要的训练，新兵和那些重新被征召入伍的老兵都是一样的情况。一个指挥部门，如果不得不把它的全部后备力量孤注一掷地投入战斗，以挽救前线的危局，这个指挥部门便已陷入了困境，而这场战争还要进

行四年。苏联军队缺乏足够的训练，因而在战争的初期便遭到了巨大的损失，致使他们到莫斯科城下才挡住了敌军。斯大林在对全国演说中号召成立的非常时期的民团，实际上根本就没受过任何训练，他们的情况就更为糟糕。至于向东部地区大规模疏散工业企业的工作，如果我们在战争最初几个星期内没有遭受如此毁灭性失败的话，本来根本就不必要去进行。再者，由于德国人的迅速推进，几百个对国防至关重要的工厂企业未能被抢救出来而沦于敌手。

长期任总参谋长的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在他的回忆录中较客观地为我们描绘了“天才的”军事领导人斯大林的形象，他写道：

“最高统帅部没有自己的工作机构，总参谋部便承担了这一任务。总参谋部为最高统帅部提供和整理情报，并提出自己的建议，这些建议则成为最高统帅部其后所发布命令的基础。开始的时候，斯大林对总参谋部的工作极为不满，然而我不能掩盖这样的事实，即斯大林不是随时都能够作出最理想的决定，而且往往不能理解我们的困难……。那时候斯大林的言行决策中，常常有失算、不妥之处，有时甚至是很严重的。他过于自信、刚愎自用、不愿意听取别人的意见，并且过高地估计了自己亲自指挥作战的学识和能力。他很少依靠总参谋部，也没有充分利用总参工作人员的专长和经验。他经常毫无道理地、轻率地更换高级军事领导人。在这样的条件下，总参谋部就不能发挥其全部能力，也不能发挥作为最高统帅部的工作机关应有的效率。斯大林正确地坚持军队必须抛弃过时的战略概念，然而不幸的是，他自己却也相当缓慢地才做到了这一点。斯大林有喜好正面交锋的倾向。当然除了其他因素之外，他还受到了前线形势的影响，当时敌人已兵临莫斯科城下，而且深入到

祖国的心脏地带……。斯大林格勒战役是整个战争的重要里程碑。但是人们可以这样说，斯大林只到库尔斯克战役才真正掌握了指挥军事战斗的现代化方法。”^①

换句话说，在战争的头两年时间里，我们是在没有真正能力的最高统帅部的指导下度过的。当然，把自己置于统帅地位，统领德国武装力量的希特勒，在军事事务方面也是一个半瓶子醋的外行。他在1941年也同样犯了一些纯属失算的重大军事错误，战后德国历史学家和幸存的军官，对这些错误进行过详细的探讨。由于南斯拉夫和希腊的战事，希特勒不得不把进攻苏联的日期推迟了六个星期。在8、9两个月里，他命令停止进攻莫斯科，并将其部队中的主力部分转向南方，去完成对基辅的合围。尽管德军占有数量上的优势，但由于确信不废一兵一卒，被包围的列宁格勒定会在两、三个月内投降，所以希特勒命令停止对列宁格勒发起攻势。由于陶醉于夏季的胜利，希特勒是如此地确信胜利指日可待，所以他没有为其部队的过冬装备做出什么安排。1941年的秋季，他甚至下令减少德国的军火生产。如果不是因为德国统帅部犯了这些，以及其他类似的错误，那么，红军于1941年和1942年的景况可能更会复杂得多。

在我的档案里，保存着有关莫斯科城郊秋季战役的大量文件。德国人突破了城市附近的外围防线，并包围了保卫首都的四个军（第十九、二十、二十四和三十二军）。通向莫斯科的大道，在没有任何有效屏障的情况下向敌人打开了。根据华西列夫斯基的说法，红军这次令人震惊的失败，部分地是由于最高统帅部对敌人的主攻方向做了错误的判断而造成的，其结果是，在敌人向前推进的主要方向上，红军的防卫力量却十分薄弱。

^① A·M·华西列夫斯基：《毕生献身的事业》（莫斯科，1974），第126—127页。——中译注

1941年10月15日，莫斯科党组织的负责人亚历山大·谢尔巴科夫，召开了一次莫斯科各区党委书记的紧急会议。他在那一天所下达的指示，表明局势已经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下达的指示是：除了担任特殊任务的人员——爆破专家以及所有做为游击队员而应继续进行战斗的人要留在城里之外，其余的人都必须撤离这个城市。富有讽刺意味的是：被选来用于进行疏散的公路名叫“积极分子之路”。^①高尔基区是最近的疏散中心，那里的政府机关已经开始向古比雪夫^②转移。自从莫斯科的失陷成为一个极其现实的危险起，苏联领导人便决定利用1812年战争^③的经验，就是说，如果莫斯科这个城市确实保不住的话，就决定放弃它。与此同时，开始进行炸毁发电站、部分地铁和难以疏散的企业的准备工作。然而这一切是难以向群众保密的。上述会议的第二天（10月16日），不安情绪开始在城市中到处蔓延。成千上万的人们自作主张地离开了莫斯科，而他们这种溃逃行为不仅助长了已有的混乱，而且导致了真正的恐慌。一些当事人曾作证说，斯大林本人于10月16日夜里也离开了莫斯科，然而这种说法一直未能得以完全证实，因为那些先前声称斯大林肯定已逃离莫斯科的人们，后来却又含糊其辞起来。我们确实知道，当时为斯大林准备了一系列随时可以开往东部地区的专列，然而，10月16日和17日，在高尔基和古比雪夫，却没有人见过斯大林。最大的可能性是：习惯夜间工作的斯大林，实际上于10月16日至17日的夜里离开了莫斯科，十至十五个小

① 这是三十年代部分地由共青团义务劳动者所建成的公路。——英译注

② 古比雪夫是工业重镇，又是伏尔加河上的重要港口，距莫斯科东南约400英里。——英译注

③ 1812年俄法战争期间，俄军在库图佐夫元帅的统帅下，先撤出莫斯科，将莫斯科让给拿破仑，之后经积蓄力量，进行反击，终于打败了法军。——中译注

时之后，他收到了德国人的攻势受阻的消息，其后他回到了克里姆林宫，又静下心来作他的日常工作。

航空工业部部长 A·沙库林在他的回忆录中，恰好为我们提供了10月16日这一天的详细情况：那天早晨，他正在一个将要撤退到后方的飞机制造厂里，接到了要他立即前往斯大林克里姆林宫公寓的通知。他写道：

“克里姆林宫显得冷冷落落。我进入了大厅，脱掉了外衣，穿过了过厅。通常会议都在餐厅里举行。当我进去之后，斯大林便从卧室里出来了。他象平时一样抽着烟斗，开始来回踱步。一张桌子正对着餐厅的入口，左面放着一个酒柜，右面摆着一排书橱，书橱里面空空如也。斯大林穿着和平时一样——上身穿一件制服，裤脚塞在靴子里（稍后他才开始穿军服）。随后政治局委员们也都来了。斯大林向他们一一问候，继续抽着烟斗，来回踱步。没有一个人坐下。斯大林站住了，然后并不是针对某一个人问道：

“‘莫斯科的形势如何？’

“他们都保持着沉默，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我实在忍不住了，于是便发了言：‘今天早晨我视察了几家飞机制造厂。在一家工厂里，工人们看见我很惊奇。一位女工告诉我说，我们还以为所有的人都已经离开了这里。在另一家工厂里工人们因为一些人没有领到工资而怒气冲天，有人告诉他们说，国家银行行长带着大部分钞票，已经离开了莫斯科，所以银行里已经没剩多少钱了。’

“斯大林向莫洛托夫问道：‘茨维列夫（财政人民委员）哪去了？’

“‘在高尔基市。’莫洛托夫回答说。

“‘钱必须马上用飞机送回来。’斯大林说。

“我告诉他电车已经停驶了，地铁已经不工作了，面包房和其他的商店也都关了门了……。

“斯大林转向谢尔巴科夫问道，为什么事情弄到了这步田地，然而没等对方回答，他便转过身子，又开始来回踱步了。过了一会，斯大林说：‘嗯，一切还不算坏，我原以为情况要糟得多。’然后又对谢尔巴科夫说道：‘叫电车立即恢复行驶，地铁马上恢复工作。立即让面包房、商店、饮食网点都开门营业，让诊疗所立即开始看病，把所有你能找到的医生都找来。你和波罗宁今天就到广播电台，去发布一个呼吁书，要求人们遵守秩序，保持镇静，并且宣布：公共交通、饭店和其他服务行业在短期内一定会恢复正常。’

“这是一个简短的会议。几分钟后，斯大林说：‘好，就这样吧！’于是我们便分手，各自处理自己的事情去了。”

沙库林所讲述的这次会议无疑是开过的，但整个会议的基调，斯大林的言论以及他非同寻常的举动都向我们暗示：这次会议不是于10月16日，而是于两天之后召开的，即在斯大林突然离开莫斯科，后来又重返克里姆林宫之后召开的。否则，如何才能解释他对城里的情况如此一无所知，又如何解释他所说的“我原以为情况要糟得多”这句话呢？难道有谁可以不经斯大林的批准而能够擅自停止公共交通和关闭商店吗？

我们不能肯定10月16日斯大林是否离开过莫斯科，然而这一情况可能并不十分重要，特别是因为我们已经确切知道，他于战争的第二天曾擅离职守。虽然如此，斯大林的崇拜者们在论及斯大林于10月中旬——当莫斯科处于严峻时刻——的表现时，还是感到非常难堪。例如，1977年发表的P·普罗斯库林的小说《你的名字》中，有关于这段情节的如下描写：

“他（斯大林）正在思考着41年秋曾有过的 一项 决定，

就是说他必须离开莫斯科前往古比雪夫，10月19日那天早晨的情景历历在目：罗戈日斯克——西莫诺夫斯基铁路支线、专列、荒凉的站台、前来为他送行而在耐心等待着他的同志们……。这是他一生中几个关键性的时刻之一，下一步决策必须绝对正确，因为形势没有给过失留下丝毫余地。在这全人类生死存亡搏斗的中心，在这世界各派势力可怕地交织在一起，大地在空前震颤的地方，他那冰冷发木的脊背，感到了这个伟大城市的无数双眼睛在注视着他。

“回首往事，不寒而慄。时间是多么沉重啊，此时和世界其余部分隔绝的他，躲开了那些前来给他送行的人们，躬着背，避开寒风，来回踱步。他毕竟还是一个人，然而不论他喜欢与否，他的名字却凝聚着千百万死于进攻，在众多的甚至超出国界的战斗中浴血奋战的人们的喜怒哀乐。在这一段严峻的日月里，他已经身心憔悴了，然而在这种心绪中，正是在这样一个时刻——他在一个空旷的站台上徘徊踱步达两小时之久，这是多么可怕的两小时，当时没有一个在场的人敢于接近他，他的心灵比他的理性更加痛楚地感受到责任重担的巨大压力。他绝不能把这一重担——哪怕是它最微小的部分，推给别人分担。此时此刻，他又一次感到了从这座不朽的城市中所发出的，几乎是活生生的、痛苦的哭号。没有人看见他面部的表情。他迈着他那特有的缓慢的步子，走到月台的前沿，没有和任何人说话，然后他突然转过身来，背比平时更驼，走向他的汽车，坐了进去，径直向家里驶去。”^①

看来上面这段摘录中所提到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假造的，作者意在强调斯大林离去一事，发生于形势事实上已有所改观的

^① P·普罗斯库林：《你的名字》（莫斯科，1977）。——原注

10月19日。那么10月16日又是怎么回事呢？做为一个小说家，普罗斯库林完全可以随意虚构斯大林在那些关键性的日子里的想法和感受，然而整个这段故事给人的印象是作者杜撰出来的，包括所谓斯大林默默地在铁路支线的月台上徘徊踱步两个小时之久的描写。此外，有谁能决定斯大林必须离开莫斯科呢？只有斯大林自己才有权作出这样的决定。

这里我们必须提一提下述的事实，即在整个战争进行的四年时间里，斯大林只去过一次前线，那是在1943年8月上旬，正值加里宁方面军和西方方面军的部队，开始为斯摩棱斯克战役作准备工作的时候，8月3日他视察了西方方面军司令部，8月5日他又视察了设在尔热夫附近霍罗舍沃村里的加里宁方面军司令部。在其余的时间里，甚至于1944年当战线已远远地移到西方的时候，斯大林都一直是在莫斯科指挥战争的。这就给前线司令员们的日常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为了协调作战和使他们的作战计划得以批准，他们不得不经常离开前线，飞往莫斯科。

在西方出版物中常有这样的讲法，即斯大林在战争期间，为了达到将一切力量团结在党和武装力量的周围这一目的，在国内实行了相对“温和的”和调合的政策。他们提到：在保卫俄罗斯，反对德国无休止的扩张主义的口号中有明显的民族主义成分，还提到了斯大林同教会的和解。在一定程度上，这些是真实的。从1943年起，对教会的迫害停止了，为了鼓励教会更为正常地行使执能，采取了前述的种种措施。很多年轻人，他们的父母是前不久的大清洗中失踪的共产党人，还有一些原富农家庭出身的子女，他们随全家在1930年至1932年间被放逐到西伯利亚、乌拉尔和南部地区，并在战争开始之前一直被剥夺了自由迁移权，这些人现在都重新征召入伍了。在每个“特

别居民区”，内务部都建立了他们的指挥部，并通过内务部的秘密渠道同流亡者中的反法西斯组织建立了联系。有证据表明，战争期间，甚至象米留可夫和邓尼金这样的人，都向苏联提供过有价值的情报。当然，对取得这些进展，斯大林是有他的功劳的。然而，对他另外的“业绩”，人们也不是没有议论的。

战争期间，“古拉格群岛”的集中营人满为患，其中很多人被送上前线，充当炮灰。他们之中有上千名指挥员和政委，这部分人对当时我们伤亡惨重的军队来说，当然是非常需要的。但是这些人却处于成千上万身强力壮的看守和内务部警察部队的监管之下，而这些警卫人员本来在前线也是能够发挥巨大作用的。

在许多科学技术领域里，也由于战前的大恐怖而出现了同样的情况。航空工业、炮兵和军事技术其他领域，以及光学、无线电电子学等方面的主要专家们都被逮捕了。这类清洗无疑阻碍了军队的技术更新，而1941年苏联军队的失败，恰恰是与德国战争机器的技术优势密切相关的。奇怪的是，当时我们却着手制订一项独特的计划，即建立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监狱和集中营军事技术中心。^①那些还活着的专家们得到允许，在“科学研究集中营”里设计新式军用设备、新式飞机和其他装备。由于大规模疏散而引起的流行病的蔓延，迫使斯大林不得不释放了在1937年至1938年间被捕的细菌学和药理学专家。但是，那些从事比较一般的，用于和平领域科学研究工作的专家，处境未能有所改善，这些在大恐怖年代中被捕的人们仍然关在集中营里，而且食品定量还减少了。他们之中很少有人得以幸存。

^① 这样的集中营很多，图波列夫就是在集中营里研制出“图——104”喷气式飞机的，请参阅《图波列夫囚徒设计所》一书。——中译注

战争期间，政治镇压活动仍在继续，虽然社会秩序仅用民兵部队就足以维持，然而就在那些完全不重要的地方，以及城乡的每一个政区里，内务部都建立了自己的指挥总部。这里我们还应该提及，在战争时期，由于斯大林对苏联囚犯的态度，而使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成千上万的囚徒饿死狱中，还有二、三十万人被逼无奈，参加了伏拉索夫^①及其他同法西斯合作的军事或准军事组织。然而战争期间，斯大林最令人发指的罪行，却是将一些少数民族驱逐出他们家园。他们本来也可以为共同的事业做出他们的贡献，但情况却与此相反——他们被押上了专用的列车并被送往东部无人居住的地区，在那里几十万被流放的车臣人、印古什人、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卡尔梅克人、伏尔加地区的日耳曼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人死于饥饿、寒冷和流行病。

1949年8月，我的一位朋友曾在离格鲁吉亚军事公路上的拉尔西城不远的，位于车臣——印古什区（那时已并入格鲁吉亚）山中的阿尔姆基疗养院度假。他在斯托洛沃亚山间偶然发现了一处完全被遗弃的，一半已变成废墟的小山庄。几天以后，他认识了一位来自斯维德洛夫斯克，和他同住一个疗养院的民防部队上校。这位上校坦率地向他讲述了发生在这里的事情，我的朋友记下了这位上校讲述的下述故事：

“1943年7月末，我们大家被带到了贝利亚的办公室里。一再强调必须保守秘密之后，他们告诉我们，最近将要采取的

① A·A·伏拉索夫在卫国战争期间为陆军中将，伏尔加方面军第二突击军军长，1942年6月全军被围，向德军投降，并改编了他的部队为希特勒服务。1945年5月他的残余部队在捷克境内被苏军消灭，他本人及其他军官被俘，后苏联最高军事法庭以叛国罪处决了他们。他的部队中有几千人逃散到世界各地，有一大部分人被加拿大收留，他们被称之为“伏拉索夫分子”。加拿大为他们建立了一个居民区。——中译注

行动，并对我们说明了我们的具体任务。我们每个人都被套上了一身某一部队指挥官的军装，并且协同一支部队占据了村庄附近的指定地点。在这里我们奉命同村民们友好相处，用向他们赠送礼品、说奉承话的办法，来取得他们对我们的好感。我们还要和村里有影响的人物发展密切的关系，对他们的习惯和生活方式表示非常尊重。简言之，就是要我们尽快地和他们交上朋友，创造条件让他们习惯于村庄附近驻扎红军。大多数车臣人能够不费力地听懂俄语，不过我们还要学习他们的基本语言，了解他们习惯、生活方式、爱好等等。他们都是穆斯林教徒，至今仍实行一夫多妻制，因此他们的妇女处于被动的和毫无生气的地位。在我们奉命同他们一起生活的半年里，上级要求我们这些军官挨家挨户地编写名册，并要弄清离村外出村民的下落。我们奉命为庆祝即将来临的红军节做好准备，村里所有的男人将会得到参加庆祝会的邀请。我们告诉他们，到那一天，车臣人民在反对德国侵略者的斗争中所做出的贡献将受到承认，他们会收到奖品和由最高统帅部颁发的奖状，等等。我们执行了命令，在村子里——就是这里可以看到的那座——住了半年。1944年2月23日上午八时，我们组织了一个联欢会纪念红军建军节。村里所有的人都聚集在一起参加庆祝仪式，大会选出了主席团，其中包括丝毫未起疑心的苏维埃主席、地区内务部负责人和地方知名人士，同时还选出了以斯大林同志为首的，由整个政治局组成的名誉主席团。会议由部队的代表，即由我来主持。演讲开始了，那些在战争年代打过仗的人在会上致了辞。当然，按照穆斯林的习俗，只有男人出席了大会。

“十点整，我站了起来，从我军上衣的兜里掏出了一个打着封印的信封。我撕下了蜡封，同时宣布说：我即将宣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法令。接下去我就读了。我的听众则目瞪口呆

呆，他们被告知说，车臣人和印古什人在战争期间背叛了祖国，帮助了法西斯分子，如此等等，因此必须将他们流放。

“‘抵抗或是企图逃跑是没有用的，’我补充说，‘这所俱乐部已被包围。’然后转向内务部军官和他的副手，命令说：‘我以党的名义命令你们，把他们的枪放在桌子上！’

“大厅里爆发了不可名状的混乱，人们向门窗撞去，然而外面机枪在等着他们。在庆祝会进行之中，军队已经用几道警戒线，把这座建筑包围得水泄不通。可以想象，没有任何认真的抵抗（尽管所有在场的人都身穿礼服，佩带短剑或类似武器）。我们毫不费力就缴了他们的械，并将他们分成小组，在森严的警卫下，把他们押送到离这里最近的扎乌基考（奥尔忠尼启泽市的前身）火车站，一列配有专门押运囚犯车厢的专列已等候在那里。

在我们对付男人的时候，其他人则包围了手无寸铁的妇女和儿童，把她们也带走了。在另外一个火车站上，她们也被赶进了运货车厢。一列列满载的火车，将她们送往了哈萨克斯坦。一些妇女进行了抵抗，她们不能允许任何人触碰她们。有一个女人飞刀杀死了一个士兵，此外还发生了两起士兵受伤事件。村民们被赶走之后，他们的财产和牲畜（事先就造好了清单），被集中起来运走了。在整个高加索，这些行动是由贝利亚亲自指挥的。”

这里还需要讲一讲托洛茨基及其在西方各国的追随者们对战争爆发的反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前几年，托洛茨基对苏联抗击国外入侵和干涉的能力持极其悲观的看法。1935年他写道，如果法西斯在欧洲取得胜利，它也同样会征服苏联，因为苏联经不起法西斯的迎头一击。托洛茨基宣称：“没有世界革

命，无人能拯救苏联。”^①

战争爆发后，托洛茨基从未能把握战争的本质，他一再教条地重复布尔什维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口号，坚持认为战争的双方都是非正义的，因此，不仅是德国的，还有英国和法国的革命者，都只能采取反对他们本国的帝国主义政府的立场。这一立场实质上同斯大林和第三国际领导人所奉行的路线非常相近，最初他们也不愿意承认这是一场反法西斯战争，不愿意承认西方国家的无产阶级别无其他选择，只有奋起保卫他们的民族独立，民主自由制度，不管这种制度是如何有限，然而这个制度也是人民不懈斗争的成果。

1940年8月21日，托洛茨基被斯大林的特务暗杀了。不过在他临死之前，第四国际非常会议通过了一个名为“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特别宣言。托洛茨基无疑参加了起草宣言的工作。其内容如下：

“本宣言是在德军向巴黎和英吉利海峡挺进，已经打败了荷兰和比利时，以及以压倒优势的兵力粉碎了盟军首次抵抗的时候，由第四国际代表大会予以通过的。在柏林，人们已经急不可待地准备庆祝胜利。而在盟军阵营里，人们则惊恐万状。对我们说，这里不是对战争的下一幕进行战略性的推测的地方，而且也无此必要。

形势如此，难道工人阶级不是应该责无旁贷地支持民主制度反对德国法西斯的斗争吗？只有小资产阶级的各派人物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对这些人来说无产阶级只不过是某一派资产阶级手上的辅助武器。我们为了我们的尊严拒绝这种政策。不错，资本主义社会里不同的政治集团之间确实存在分歧，就如

① 《反对派简讯》，第42期（1935年），第5页。——原注

同火车车厢有几种不同的舒适等级一样，但是一旦火车冲向悬崖，那么车厢里的不同舒适程度便失去一切意义了。资本主义的文明目前正向悬崖滑去。腐朽的民主制和野蛮的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区别在整个资本主义体系面临土崩瓦解的情况下，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希特勒的胜利和他的暴行，引起了全世界工人的痛恨。然而，是否帮助处于弱势但是同样反动的敌人，这一难以调合的分歧分化了人们合理的愤怒。即使胜利者是英、法帝国主义，他们也绝不会比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更关心人类的命运。资产阶级民主是不应该去挽救的。工人们要是去帮助本国的资产阶级反对外国的法西斯分子，则促成了法西斯在本国的胜利。历史赋予我们的任务，不是去支持帝国主义体系中的一方反对另一方，而是要我们将整个体系扔下悬崖……。这场战争不是我们的战争。同第二、第三国际的政策相反，第四国际将不把自己的政策立足于资产阶级政府的战争运气上，而立足于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立足于在所有国家推翻统治阶级，立足于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出于这种观点，战线的转移，大城市的毁灭，领土的占领，某些国家的陷落，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在重建当代社会的道路上的一段悲剧性的插曲而已。”^①

很明显，这种极左的政策是绝对错误的，它不会产生任何好结果。因此毫不奇怪，托洛茨基和他的追随者们向欧洲工人阶级发出的“在第四国际的旗帜下联合起来”的呼吁，没有得到沦陷区工人人们的任何响应。与此相反，第三国际的共产党终于获得了较大的影响。在一度摇摆不定之后，参加了包括为了同一目标而奋斗的资产阶级社会党在内的、所有反法西斯力量

① 《反对派简讯》，第84期（1940年），第27—28页。——原注

的统一战线，强烈主张对法西斯进行不妥协的斗争。

应该说句公道话，当德国于1941年6月进攻苏联的时候，第四国际执行委员会在最后一期《反对派简讯》中发表了题为《保卫苏联》的呼吁书。呼吁书敦促全世界工人阶级：斯大林毕竟没有将十月革命的成果全部毁灭殆尽，所以工人们仍应该奋起保卫苏联。但与此同时，托洛茨基分子又反对与英美建立反希特勒的联盟。

“第四国际一次又一次地宣布，苏维埃工人阶级出自本能地懂得：应该无条件地保卫苏联！尽管官僚集团背叛了革命，我们应该不顾这种背叛，奋起保卫苏联。我们对苏联的支持是无条件的，不取决于斯大林官僚机构所作出的任何让步。我们将以我们自己的方式去保卫苏联。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我们的武器就是革命阶级的斗争。克里姆林宫的帝国主义盟国不是我们的盟国，我们将在每个地方继续进行革命斗争，包括同“民主阵营”的斗争。如果我们去支持英美帝国主义老板，那么这便意味着帮助希特勒去统治德国工人。我们寄希望于革命，对德国工人革命的前途来说，最有利的道路就是把革命斗争扩大到敌人的阵营……。”^①

显然，这一立场是完全不现实的。如果苏联和英国将他们的力量联合起来，进行反法西斯斗争，那么这样的斗争怎么会给希特勒以帮助呢？这个问题，呼吁书的作者们即使借助于那些极左的词藻，也是无法解释的。在当时的新形势下，仍然宣扬俄国内战时期的口号，在政治上是荒谬的，很自然，他们发现在被占领的欧洲几乎没有追随者。为了打垮德国强大的，正向苏联逼进的战争机器，必须同所有的反法西斯力量结成联盟，

① 《反对派简讯》，第87期（1941年），第3—4页。——原注

因此加入有美、英、法及其他国家参加的同盟，绝不是犯罪行为，相反这是斯大林政府的一桩值得赞扬的功绩。尽管也不能否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大林集团在苏联也犯下了数不清的罪行。

德国人于1941年到1942年的冬季遭到失败之后，斯大林从战争初期的失常状态中恢复了过来，并变得盲目乐观，他自以为是地预言红军将会迅速取得胜利。他相信，再过几个月战争便能结束，在1942年5月1日的命令中，他要求：“全体红军，争取1942年成为彻底粉碎德国法西斯军队，从希特勒恶棍手中解放苏联国土的一年。”^①

然而，仅仅几周之后，德军便开始了他们的南方攻势，突破了苏军防线并于1942年秋推进到伏尔加河畔，他们占领了克里米亚和北高加索大部，再次重创红军，占领了大片新的领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斯大林才停止号召红军在数月内摧毁法西斯军队，至此才认识到，这场艰苦的战争还要打很长时间。斯大林解释说，他的军队之所以遭到了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少在欧洲的第二战场。在某些演说中，他甚至说，如果不开辟第二战场苏联便不能继续坚持了。斯大林在1942年11月6日的演说中宣称：“我们的盟国不可能不了解，在法国失败以后，不开辟反对法西斯德国的第二战场，会使一切爱好自由的国家，包括盟国自己在内，遭到不好的结局。”^②

尽管1944年夏开辟的第二战场大大加速了最终胜利的到来，但是随着战争的进展，看来苏联似乎没有第二战场的支

① 《真理报》，1942年5月1日（《斯大林文选》人民出版社，1962年8月，第302页）。——原注

② 《真理报》，1942年11月7日（《斯大林文选》人民出版社，1962年8月，第315页）。——原注

持，也同样能赢得这场战争。因为这场战争从它开始的第一天起，就具有爱国主义解放战争的特点，人民大众在这场战争中从来没有考虑过个人的得失。然而现在，战争结束了，历史学家们便面对着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这就是：为了胜利，我们到底付出了多大代价？

在战争年代里，斯大林再三地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夸大德军的伤亡，隐瞒苏军的伤亡数字。战争结束数年之后，报刊上曾经公布过一个报告，宣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有两千万人丧生，其中包括军人、平民和战俘。相应的德方数字（包括各战场的），大约为七、八百万人。这样的数字已经十分庞大了。人们可以回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情况，在那场战争中俄国一共损失了一百六十六万人，其中包括军人、平民、战俘和负伤死亡人员。因此，甚至根据官方的数字，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损失比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损失高出十一至十二倍之多，尽管在两场战争中投入部队的规模不见得有多大的区别。1917年有一千二百多万人被征召入伍，1916年和1917年战场上军队的人数超过了五百万人。这一数字并不比朱可夫元帅在他回忆录所引证的数字少多少。如1942年末，苏联投入战场的人数为六百多万人。^①

确实，苏联这次所面对的敌人，大约两倍于1914年至1917年沙皇俄国面对的军队。根据斯大林的计算，希特勒于1942年年底在苏德战场上拥有二百四十个师（包括芬兰、意大利和匈牙利师）的兵力。朱可夫提供的更为精确的数字表明：于1942年11月，德国人在苏德战场有二百六十六个师，人数总计达六百二十万。^②因此，战斗变得更为激烈，特别又因为双方在各

^① G·朱可夫：《回忆与思考》，第430页（莫斯科，1969年）。——原注

^② G·朱可夫：《回忆与思考》，第429页（莫斯科，1969年）。——原注

自的配置中，都使用了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不知强大多少倍的火力。即使这样，也不能完全解释苏军如此之高的伤亡率，情况之所以如此，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斯大林在战争的第一阶段所犯下的拙劣的错误所致。如果指挥情况不是如此，而是比较胜任的话，那么苏联的军事人员和平民的损失可能只会是实际数字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

西方出版物经常夸大死于斯大林恐怖或战争时期的人数。如索尔仁尼琴根据库尔加诺夫教授的统计数字宣布：苏联在恐怖年代里有六千六百万人丧生，其后又在战争中损失了四千四百万人。换句话说，他们宣称1918年至1953年这段时间里，苏联损失了一亿一千万人，其中大多数是男人。用最简单的人口统计学的方法都可以表明，上述的统计数字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因为如果认为这些数字是准确的话，则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自1918年至1953年，在苏联没有一个人死于正常死亡。苏联人口统计学家M·马克苏多夫指出，1932年至1949年间有四千二百万人死于各种原因，这一数字是人口死亡估计的最高数字。据马克苏多夫统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年代里，七百五十万士兵和军官阵亡或因伤死亡，另有大约七百五十万平民，在同一时期战死或牺牲于敌占区的大规模镇压。如果我们再加上战时死于饥荒和流行病的人数，死亡人数可达两千万人左右——即同官方的统计数字相吻合。马克苏多夫的数据表明：约两千二百万至两千三百万牺牲者死于1918年至1953年间的饥荒或镇压活动中。他的数字表明：在斯大林统治的年代里，几乎是半数的男人和四分之一的妇女未尽他们应有的自然寿命。这个数字已经如此地惊人，哪里还有必要象某些流亡国外的人们那样，两倍三倍地夸大这些数字呢？在斯大林时代，我们所失去的人口超过了各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所失去的人口

的总数。马克苏多夫正确地指出：“从古至今，还没有哪一个暴君，能够用其臣民和他最痛恨的敌人的头颅堆起如此巨大的枯骨白堆。”^①

^① M·马克苏多夫：《1918年至1958年苏联人口损失》第243页。——原注

第七章

战后年代

托洛茨基的预言没有成为事实。法西斯德国发动了一场对苏战争，但是尽管德国得到了几乎整个欧洲经济实力的支持，尽管得到了意大利、匈牙利、芬兰、罗马尼亚和西班牙的直接军事援助，以及日本和土耳其的间接军事支持，德国还是无可挽回地战败了。尽管苏联蒙受了重大的损失，在战争初期又遭到挫折，然而斯大林的统治也并没有垮台。相反，虽然为取得胜利，人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斯大林的威望在国内外却大为提高。战争的胜利，还加强了他插手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地位。尽管解散了第三国际，各国共产党的影响几乎在每个地方都有较大的增长。而第四国际的各党派，却仍然处于弱小的、孤立的政治团体的地位。在苏联和红军的支持下，共产党人在欧洲和亚洲的许多国家中执掌了政权。战争年代造成的破坏是巨大的，但苏联在战争的废墟中勇敢地站立起来，并作为一个在军事和经济实力上，仅次于美国的超级大国而出现于世界上。

第二次世界大战确立了美国的地位，美国成了一个最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无可争议的领袖。借助于它庞大的军事机器和对核武器的垄断，美国放弃了从前的孤立

主义，在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等前“列强”国家的经济、政治影响急剧下降的时候，美国转而变成了另一个超级大国。欧洲国家所建立的庞大的殖民帝国，一个接一个地崩溃了。前殖民地则纷纷独立。在这一过程中，独立印度的出现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印度之后，毛泽东所领导的共产党在中国取得了政权。

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新地位，要求斯大林改变苏联的对外政策。然而，斯大林适应战后现实世界的能力是有限的，常常以其不明智的方式处理国际事务。在《让历史来审判》一书中，我列举了斯大林在同欧洲国家，“第三世界”和美国的关系上，以及同他的最坚定的盟友，许多西方共产党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关系中所犯的错误。在这里，我还想提出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斯大林同毛泽东的关系问题，这种关系是他们在战后年代里发展起来的。

索尔仁尼琴在他那封著名的“致苏联领导人的公开信”中声称：斯大林自己要为养育了一个死敌——毛泽东的中国——而负责。他说：“我们喂养了毛泽东，我们用毛泽东取代了象蒋介石这样和平的邻居。”然而，这一说法是完全错误的，苏联学者和批评家列夫·科别列夫逐条驳斥了这一说法：

“毛泽东是由斯大林养大的”这一论断，不但是一种牵强附会的看法，而且与实际发生的事情恰恰相反。毛的得势并非因为斯大林的对华政策，而恰恰是因为他没有理会这一政策。从1926年和1927年起，还在斯大林同布哈林联盟的时代，斯大林就曾指示中国共产党（C. C. P.）听命于蒋介石。稍后不久，少数中国斯大林分子指责毛和毛的支持者为“冒险主义”、“游击战术”、“农民民族主义的异端邪说”，并冠以其他异端的罪名。直到1947年至1948年，当国民党的失败已经变得十分明显的时

候，斯大林仍然不信任毛分子。他一贯企图阻止他们的胜利，指责他们是托洛茨基主义和民族主义异端。

毛和朱德无视共产国际的指示，于1931年至1933年^①领导了“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毛被选为中国共产党主席，^②从而取代了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当时斯大林正试图通过王明劝说中国共产党人，加入蒋介石大元帅领导下的“抗日联合阵线”。事实上，从日本于1931年强占满洲到1945年，苏联一直在用一切可能的方式支持其“和平的邻居”——蒋介石。苏联向他提供了战略设施和武器，派给他军事顾问和战斗机驾驶员。与此同时，对共产党军队（新四军和八路军）和共产党人控制区的帮助，仅限于一般的问候，派少数几个医生和名为“政治”顾问，实则侦察中共领导人活动的情报特务。1945年，苏军占领满洲之后，不允许中共军队进入这一地区。1946年，斯大林在英、美的坚持下，命令苏军迅速撤离满洲，在蒋介石的部分师团已被美国飞机空运到满洲各城市之后，毛才得知这一情况。因此，虽然毛的军队比国民党军队更接近满洲，他们却仅仅抓到了几个苏联老大哥“慷慨”丢下的日本老军械库。为了补偿这一慷慨的“珍贵礼物”，苏军拆除了包括靠近他们“兄弟”党占领区的整个铁路线。1946年至1948年，中国共产党用从国民党军队那里缴获的日美武器初步地装备了他们的军队。而从投降的蒋介石的将军们手里，则得到了大量的苏制大炮和机关枪。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根本就没使斯大林高兴——事实上他反而十分惊恐。那几年恰逢南斯拉夫和苏联发生了麻烦，作为在远东的政治对手，倔强和不可思议的毛，比起铁托和潜在

① 原文如此，恐系作者之误，应为1934年至1935年。——中译注

② 原文如此，恐系作者之误。毛泽东于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被选为中央军委主席，而不是中国共产党主席。——中译注

的铁托的仿效者要强大的多和更加危险。因此，在毛分子取得最终的、完全不可逆转的胜利之后，斯大林在大量宣传词藻的掩盖下，在同中国的条约中，塞进了大量对苏联有利的特权，并强化了他对中国东部铁路、①新疆，和设在旅顺和大连港口的海军基地的控制……。同时采取措施，在中国军队的所有重要军事基地和部队中，设置了军事顾问。斯大林挑起了朝鲜战争，想让中国卷入一场同美国相抗衡的地区性战争之中，借此削弱中国的力量并加强其对苏联的依赖。而这正是中苏关系史的真相……。”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去莫斯科就两国之间的未来关系问题进行会谈，而斯大林却尽其所能来拖延这次会谈。斯大林不止一次使毛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虽然他还没有用对待季米特洛夫那样的态度来侮辱毛。斯大林同意给中国人三亿卢布的借款，而不是如他们所要求的三十亿卢布贷款。毛在莫斯科一直住到1949年底。在庆祝斯大林七十岁寿辰的盛大宴会上，毛还发表了演说。然而，人民共和国在最初几年中，从苏联那里得到的仅仅只是些价值不大的帮助。

战后的年代里，铁托成了斯大林最为憎恨的人。早在1944年和1945年，斯大林就已感到，铁托所表现出来的过分的独立性正在露头。他从未能迫使铁托从属于他和对他屈服，这就导致了斯大林同南斯拉夫断绝了一切关系。铁托被宣布为“头号敌人”。在斯大林的观念中，“铁托主义”的概念莫名其妙地取代了“托洛茨基主义”。在共产党情报局的文件中，以及苏联的

① 即中东铁路，解放后改名为中长路（中国长春铁路），由俄国建于1905年。
——中译注

② 列夫·科别列夫：《只有真理才能战胜谎言》未发表的手稿（这篇文章最近发表于英文《地下出版物Register》第一期上（伦敦，梅林出版社，1977），罗伊·麦德维杰夫主编）。——英译注

宣传中，铁托同时被称为“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法西斯分子”和“帝国主义的仆从”。

斯大林曾认真的考虑过从苏联亚美尼亚入侵南斯拉夫的计划，但最后还是没让自己莽撞从事，而是决定在南斯拉夫建立秘密组织，并通过这些组织策划谋害铁托。然而，铁托受到的保护比起1939年和1940年的托洛茨基要严密的多，几乎所有送到南斯拉夫的恐怖分子都被保安部队抓住了。斯大林对自己的内务部和保安部如此无能大为不满，他一再问起贝利亚：“在哪方面受到了阻碍？”——斯大林所问的即是暗杀铁托一事。

斯大林死后，在他的书桌里，同威吓斯大林要同他断绝一切关系的列宁的信，以及某些来自党的档案室的其他文件（如第一届全俄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1917年3月至4月召开——的记录稿）一起，还发现了铁托写的一张便条：

“斯大林同志，我请您不要再向南斯拉夫派遣意在杀害我的恐怖分子，我们已经抓住了七个人，有一个带着手枪，另一个带着手榴弹，第三个带着炸弹，等等。如果这样的事情还不停止的话，我也将向莫斯科派去一个人，而且可能用不着再派第二个。”

1945年，“古拉格”的人数大减，其主要原因是战争期间囚徒的死亡率极高。当然这也是事实，即有一些人在战后立即被释放，那时这些人已经服满了他们五年或八年的刑期，然而却一直继续关在狱中，等待着“战争结束”或“另行通知”。但是很快一列列装运新囚徒的火车又来到了集中营，他们之中有在占领时期和德军合作过的人、伏拉索夫分子，还有先被送到专门“甄别营”的普通犯人，这些普通犯人后来大多数被判了各种徒刑。成千上百名在德国、奥地利和其他占领国中工作过的苏联公民，在武装押送下被遣送回国并送进了集中营。除那些真

正从事武装反对苏军的乌克兰、白俄罗斯的民族主义者和立陶宛游击队员外，所有以任何方式同那些民族主义者“合作”过的人们，也被送进了集中营。波罗的海地区、西乌克兰以及白俄罗斯地区的迅速的集体化运动，使这些地方的几千个富裕农民家庭被逐出家园，并被送往了东部。1948年至1949年，成千名党的官员，由于同被称为“列宁格勒事件”^①案件有关而遭逮捕，从而又一次被关进集中营。上千名“世界主义者”也被逮捕，或简言之，犹太人、犹太人文化团体的成员，突然受到指控后便失踪了。许多科学家也遭到镇压，生物学家则首当其冲。在囚徒的案卷中，除人们所熟悉的那类罪名——诸如“托洛茨基分子的反革命活动”——之外，又出现了新的罪名：“宣扬美国的技术”、“宣扬美国的民主”、“崇拜西方”等。那些在1945年到1946年刚被释放的人们，又重新被捕，作为“重犯”再次出现在集中营。战后初期，在国外俄侨居住地的俄国人（内战以后，白俄在国外建立的居民点）发动了一场鼓励人们回到祖国去的特别运动。上千人——多数为白俄的子女和亲属——响应了这一号召。一些原俄国军官也回来了。可是，他们的新式“苏维埃”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其中大多数人于1949年至1950年以“谍报活动”或“在国外进行反苏活动”等老一套罪名遭到了逮捕。遭到这一命运的人中，有老布尔什维克G·米亚斯尼科夫，他于二十年代初离开了苏联，后来作为一个普通劳动者在法国一家工厂里工作。另外一个人是I·A·克里沃谢因，他曾是法国抵抗运动中引人注目的人物，他获得了苏联公民权，然而两年之后便遭逮捕，并由专门委员会判了十年徒刑。

在第二版的《让历史来审判》一书中，我曾提到过这样一

^① 在列宁格勒党组织的首脑安德烈·日丹诺夫于1948年8月死后，他那些最亲近的合作者们，被各种指控和判决逐出了他们原先的岗位。——英译注

个事实，即：在战后抓人的浪潮中，被捕的囚徒中间包括了确有自己政治目标的学生小集团的一些成员。从前曾属于这类集团的亚历山大·沃罗涅尔说，早在莫斯科，他就听说过他们有几十个人，而且还亲自认识九名属于不同的反斯大林小组的成员。他们的纲领全部都是严格的马克思主义的。偶然几次，他们还出过打印的公告和草拟过宣言。沃罗涅尔自己由于牵涉到某一个这样的集团，而在那一时期最先遭到逮捕。^①

由于苏联转而成为了一个世界强国，全世界突然开始关注在苏联所发生的事件了。这在某种意义上对斯大林的专制行为起了一定的抑制性影响。这当然不是说，斯大林对可能成为其对手的人，或对那些不管为了何种理由被他认为是应该反对的人，变得更宽厚了（这些人包括一些名人、各个阶层的人和某些民族主义者）。较之过去，他被迫更经常地求助于秘密的暗杀和伪装的欺骗手段，如杰出的知名演员所罗门·米赫尔斯被悄悄的谋杀了。在1949年至1950年，对著名的犹太文化界人士进行的大规模逮捕，大部分就是以秘密方式进行的，而从未见诸于报刊。在国外的苏联官方通讯社接到指示，要驳斥有关逮捕犹太作家和演员的“谣言”。那几年，有几位苏联公民访问了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在那里完全避开各种官方的或非正式的旅行、会议及记者招待会是不可能的。鲍里斯·波列沃依、康斯坦丁·西蒙诺夫、伊里亚·爱伦堡和其余一些人去国外旅行的时候，接到指示，要他们坚决否认任何去苏联进行逮捕的说法。一般来说，他们都以最让人信服的，然而又是最不真诚的方式照办了。他们说：“上帝啊！他是我的邻居。我们每天在一起下国际象棋！”或“几天前我还见过他！”很多人相信了他们，原因很简单：人们很难设想，会有这样深思熟虑的和露骨的谎

^① A·沃罗涅尔：《令人心惊胆战的关切》，未发表的手稿。——原注

言存在。事实上也不是每个人都被骗了，如美国歌唱家伟大的保罗·罗伯逊，同犹太共产党员作家伊兹克·费弗是在战争年代里，当费弗作为犹太个人团体的一员访问美国时成为朋友的。罗伯逊一直为费弗和其他犹太作家已遭逮捕的谣传所困扰，并准备为表示抗议而辞去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工作。于是便有人来诱劝他前往莫斯科，并答应安排他与费弗会面。这次会面由于需要作的各种准备工作和将被捕的费弗喂胖，而被推迟了多次。期待已久的晚餐终于在大都市饭店的餐厅里举行了。桌旁在座的有：保罗·罗伯逊、伊兹克·费弗、作为费弗的朋友而出席晚餐的一位“译员”，以及亚历山大·法捷耶夫。费弗穿戴整洁并出色的扮演了他的角色。罗伯逊对这一骗局毫无所察。晚宴之后，罗伯逊回到了他的旅馆房间，法捷耶夫回了家，而费弗在“译员”的护送下回到了他的囚室。不久，他就和其他的犹太作家和诗人一起被枪决了。那么为什么他会和他的刽子手一起演这出戏呢？最大的可能是，他们答应改善他和他的同事们的条件——正如在通常情况下做的那样，虽然从来没人打算履行过这些诺言。

甚至在战前，在许多犹太文化中心受到排挤，大量犹太组织受到压制的时候，斯大林的“反犹太主义”迹象就已很明显了。希特勒则十分满意地注视着这种折磨犹太人的行径。战后，迫害和镇压犹太人的措施，以更为激烈的和严酷的方式重新恢复起来。后来，斯大林提出了“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的计划，试图将全苏联的犹太人放逐到哈萨克斯坦的南部地区。^①

① 最近十几年出版的各种著作，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关于斯大林的反犹太人的详情。如：《关于俄国犹太人》，第2卷（纽约，1968年）；《俄国的反犹太主义与犹太人》（伦敦，1968）；《时代与我们》（特拉维夫出版的流亡者杂志）；《苏联犹太人》（地下出版物，某些文章曾在国外发表）。——原注

然而需要补充一点：战后斯大林的许多更为兽性的政策，开始受到政治局的某种抵制。某些政治局委员曾非常谨慎地暗示说：如果加强这类镇压措施，则在国际上会产生不利后果。他们知道，当李森科成功地将传统的遗传学在苏联宣布为非法之后，许多杰出的外国科学家已经辞去了他们在科学院的名誉职务。他们也已听说，对犹太人的迫害引起了更广泛的抗议，而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对这一事态的发展感到不安。甚至那些通常只知道执行斯大林的种种指示的、负责经济工作的部长们，也失去了从前的奴性和热情。某些部长，如I·捷沃西安、A·茨维列夫等人，偶尔还敢于提出反对意见。他们很清楚：斯大林的许多命令表明了他对国家、各种工业部门、特别是农业的真实状况一无所知。茨维列夫在他的回忆录里向我们提供了几个实例，这些实例说明了斯大林当时是何等惊人地地与世隔绝。虽然在战后——在三十年代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农村处于赤贫的状况下，集体农庄庄员和其他农村居民，被毁灭性的苛税的重担所窒息，然而斯大林却认定农民是相当富有的。茨维列夫写道：“有一次，”当斯大林提议增收更多的农业税时：

“他甚至指责我，说我对集体农庄庄员的物质状况作了错误的汇报。他半开玩笑、半严肃地告诉我：‘只要每个庄员卖掉一只小鸡，就能使财政部满意。’”

“‘不幸的是，斯大林同志，’我回答说：‘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有些庄员即使卖掉一头牛，也交不起税款。’”^①

斯大林感到了这种消极的抵抗情绪，以及他某些最亲近的助手们的越来越大的独立性。毋需说，他逐渐地开始采取必要的措施。他将所有的政治局委员置于更为精心的监视之下，鼓

^① A·茨维列夫：《部长札记》（莫斯科，1973）第244页。——原注

励他们相互敌视，并在上层进行了许多重要的人事调动。朱可夫元帅调离了莫斯科，维辛斯基被任命为外交部长，与此同时莫洛托夫则获得了较高的然而却次要得多的部长会议副主席的职位。内务部被分成了两个相互独立的部，即克鲁格洛夫为首的内务部(МВД)和阿巴库莫夫为首的国家保安部(МГБ)。与此同时贝利亚^①也调任部长会议副主席。两位政治局委员：尼克拉·沃兹涅夫斯基和阿历克赛·库兹涅佐夫被逮捕，然后很快就被枪毙了。斯大林还批准逮捕了莫洛托夫的夫人、卡冈诺维奇的弟弟、米高扬的两个儿子和波斯克列别舍夫的夫人。赫鲁晓夫被暂时撤掉了乌克兰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职务，仅保留了不很重要的乌克兰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安德烈·日丹诺夫失宠后不久，这位无所不能的（或直至近日是无所不能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在他的别墅里暴卒，年仅五十二岁。他的死给人们留下一些疑点。

斯大林加强了他的私人卫队。派去保护斯大林及其别墅的内务部（国家保安部）的部队，改为直属斯大林本人管辖，并被置于斯大林和伏拉西克将军的指挥之下。伏拉西克从1918年起（当时他还是一名普通红军士兵），就负责斯大林的安全工作。如果斯大林命令他逮捕包括贝利亚在内的任何一位政治局委员的话，那么伏拉西克和他的那伙人会毫不犹豫地去做。

斯大林的疑心与日俱增。二十年代后期，他还喜欢在克里姆林宫花园里散散步，晚上还经常走出去，在克里姆林宫附近蹒跚蹒跚。那时候，虽然街道的照明条件很差，他却并不带多少警卫人员。但是现在，他不再住在克里姆林宫的别墅里了，就算他难得有一次从阿巴特乘车去克里姆林宫，也一定要

^① 原内务部长。——中译注

有一长串官方的车队同行护驾。他害怕坐飞机，一生中只是去出席德黑兰会议时，才坐了一次飞机。他不会游泳，而且怕水，甚至在南方度假的时候，也从未洗过海水浴。当斯大林的专列驶往南方的时候，要对所有其他列车关闭铁路，而内务部的部队要沿整个铁路线每隔一百至一百五十米设岗。斯大林的火车中途从不停车，并且只在白天行驶，也成了一种惯例。

我不知道是斯大林本人，还是他的哪位侍从，首先想到建筑一条从莫斯科市中心到斯大林最近的别墅——孔策沃别墅的专线地下铁路。总之，从莫斯科市中心至基辅火车站有两条高度不同的、平行的地铁线路，直至今日，这仍是莫斯科地铁的一个特色。这是因为在1949年决定将现在通往孔策沃的那条高层铁路加长，并决定在较低的位置上铺设一条新的、为莫斯科人用的、带有装饰豪华车站（阿巴特站，斯摩棱斯克站和基辅站）的新线路。斯大林却没能活到可以享用这条专线的那一天。他死后，从加里宁站到基辅站^①的那条位于高层的地铁线路，因为多余而关闭了。后来早些时候，因为开始了几个新区（如菲里—孔策沃区）的建设，这条线路又被加长并对公众开放了。

可能是在战争年代里，为联络克里姆林宫和诺金广场上的中央委员会大厦，以及某些莫斯科市中心的其他建筑物（工会大楼和大戏院等），而建造了一些长长的地下铁道。这样，政府成员和上层军事领导人就可以不走上大街，而从一处来到另一处或进入克里姆林宫。当时是内务部的部队而不是斯大林的私人卫队负责这个地下线路的安全工作。这一点使斯大林感到不悦，并引起了他的怀疑。伊萨科夫上将回忆说：

“有一次，我们同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长长的地下隧道里散

① 以上提到的阿巴特、斯摩棱斯克、基辅、加里宁等站均为莫斯科市的地铁车站。——中译注

步。在每个拐角处，一些警卫人员根据例行的程序，目送每一个经过他们身边的人，直到他们认为这个人进入了下一个警卫哨的目力所及处为止。我本无暇去注意这些事情，但斯大林突然打断了我的思路，用一种痛恨的声调说：‘他们站在这儿看着你……但是他们也可能在任何时候往你背上开一枪’。”^①

斯大林晚年很少生活在莫斯科。在那一时期，他连续几个星期呆在别墅里，并在那里召见他要见的每一个人。谢尔盖·什捷缅科在《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一书第二卷中，为我们提供了斯大林战后的生活和他周围环境的奇特细节：

“斯大林除了在某些正式仪式之后，出席一下专场音乐会或演出之外，一般来说是哪也不去的。在家里，他用收音机或唱机收听音乐，以此来进行自我消遣。新唱片照例要送到他那里，大部分唱片他都要亲自试听，并马上给予评价：“好”、“还行”、“不好”、“无聊”等等。每张唱片他都要亲手登记编号。在他的饭厅里，有一架1945年美国作为礼物送给他的粗大唱机，旁边放有一个碗柜和一张桌子，里面放唱片。不过这些唱片都是被评价为头两栏里的，其余的都被扔掉了。他还有一架国产的手摇唱机，每当斯大林外出的时候，它便由它的主人亲自从一处带到另一处。”^②

斯大林喜欢打台球，也喜欢看木棒球游戏。虽然他自己并不擅长此道，偶然也自己玩玩。在那些日子里，他有大量的时间需要打发。当什捷缅科追述这位年老的独裁者，如何全神贯注地观看木棒球游戏的时候，恻隐之心油然而起。他写道：

“离房子（指离莫斯科最近的斯大林别墅，斯大林的大部

① I·S·伊萨科夫：《回忆散记》，未发表的手稿。——原注

② S·M·什捷缅科：《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第2卷（莫斯科，1974），第39—40页。——原注

分时间就是在那里度过的) 不远的地方有几株没有树枝的空心树干, 上面有鸟和松鼠筑的巢穴。这是一个文学中才有的鸟类的天堂。在这些空心树干群落的附近, 有一个喂鸟用的小桌子, 斯大林几乎每天来这里喂他的带翅膀的朋友……。”^①

“在门口左边的阳台角上立着一把铁锹, 木头把手已经用的发光。其他的园林工具则放在一个大柜内。斯大林喜欢摆弄种在池塘边的玫瑰花和苹果树。在小暖房里, 他还种了几颗柠檬树……在那里甚至还种了西瓜。”^②

我们知道, 在那些年代里, 国家是怎样被迫忍受着艰难困苦, 因此今天读到这种文章的时候, 会感到十分怪诞。可是几乎所有的独裁者和暴君总是有一点自己的怪癖。希特勒是个素食者, 而且还特别喜欢动物。战争期间, 希特勒甚至到前线去的时候, 都要随身带着他所钟爱的狗, 并在每天傍晚带着它散步。这一现象激发萨姆伊尔·玛尔沙克为“塔斯社的窗口”展览会的会刊写了首讽刺诗, 其最后几行如下: “我不需要羊的鲜血, 我需要的是人血。”虽然斯大林不是一个素食者, 但这话也适用于斯大林。

斯大林在其生前的最后几年里, 决定清肃他最亲近的仆从和助手——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米高扬、贝利亚等人。他的两位“将军”——波斯科列别舍夫和伏拉西克, 甚至也在清洗之例, 这在今天已不是秘密了。很多政治局委员不再被邀往他的别墅, 当他们请求看望他的时候, 他一连几个月拒绝接见他们。“医生谋杀案”, 逮捕国家保安部长阿巴库莫夫; 逮捕格鲁吉亚内务部头子; 这一些和其他类似的事件均出于斯大林的手笔。

① S·M·什捷缅科:《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第2卷(莫斯科, 1974), 第40页。——原注

② S·M·什捷缅科:《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第2卷, 第389页。——原注

其目的不仅是为迫害犹太人，而且还为计划消灭所有在三十年代曾帮助过斯大林摧毁党的那些人作好准备。斯大林打算掀起一个新的恐怖浪潮。象往常一样，斯大林抓紧时机行动，而突然的死亡打断了他。

在《让历史来审判》一书中，我已描述了斯大林之死和其葬礼的情况。在他死后几个月，一种斯大林是被谋杀的说法，在格鲁吉亚某些最虔诚的崇拜者中间开始广为流传。这些谣传部分地出自不久前还在斯大林卫队或“服务处”工作的人之口；其他的讲法则是由他的儿子，突然间被剥夺了一切权利和影响的瓦西里所传播的。

所有这些谣传都是胡编的，甚至是离奇的。如有谣传说，贝利亚带给斯大林一瓶他所喜欢的格鲁吉亚葡萄酒——金兹马拉鲁里，在这瓶酒里贝利亚放入了特制的升血压药物。斯大林和贝利亚一起饮了几杯酒，血压本来就低的贝利亚状态良好的回家了，然而患有高血压的斯大林则在夜里或是第二天早上患了中风，并差不多立刻就死了。另一种说法是：斯大林其实死于3月1日或2日，但有二十四小时之久，无人敢进他的带钢筋混凝土大门的房间。后来据说赫鲁晓夫在花园里架了个梯子爬了上去，试图通过百叶窗窥视一下位于别墅二楼的卧室，但是什么也没看到。最后政治局委员们用撬棍撬开了房门，这才发现斯大林躺在地上，而且已经失去了知觉。毋庸说，对这类言过其实的故事，用不着认真对待。

然而，最近有一位西方作家，收集了所有他能找到的有关斯大林之死的文章，将它们捏合在一起，搞了一部类似犯罪惊险小说一样的东西。我指的是阿夫托洛哈诺夫的《斯大林死之谜》^①

① A·阿夫托洛哈诺夫：《斯大林死之谜》（法兰克富·梅因，1976年）。——原注

一书。他的大多数理论和主张是如此远离大家所确认的事实，以至于在这里去反驳它们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此，我们只简单地考察一下他的论断。

阿夫托洛哈诺夫声称，于1953年初，斯大林“尽管已年过七十三岁，但在外观上却是个完全健康的人。”^①这当然不是事实。斯大林从前的秘书巴扎诺夫，在我们于第二章所提到过的那本回忆录中写道：“他过的完全是案牍生活，他的生活方式是极其有害的。他从不进行任何活动，抽烟斗、喝酒，尤嗜卡赫提安酒。在他进行统治的后半期，每一个晚上他都同他那一伙政治局委员们在桌旁的吃喝中度过。过着这样的生活，他能幸存到七十三岁是个奇迹。”^②事实上斯大林从不知道，早在1933年底或1934年初，他便得了严重的心脏病。他的左胸感到剧痛，呼吸也感到困难。斯大林的病症是由于其有害的生活方式，特别因为抽烟而引起的。在那几个月中，斯大林的健康状况是如此地糟糕，以至于政治局认为有必要指定一位大家都能接受的接班人（基洛夫）。最后斯大林虽然不是全部，但还算是恢复了健康。不过他仍患有高血压并一再发作心绞痛。1948年底，他同疾病进行了特别长久和严峻的搏斗。人们认为：战争期间巨大的压力，以及抽烟过度是引起这场大病的原因。他几乎病了六个月，而他的医生们则为这场疾病的前景着实担心了一番。他七十岁的时候，已经变成了病魔缠身的人。在祝贺他七十寿辰庆典上，斯大林默默地坐着，倾听着人们对他的喝采。在这之后，他都没站起来作一个短短的发言以示感谢。人们在评论斯大林当时这一行为时，曾作过不同的、相互矛盾的解释。然而，事实是斯大林尚未从1949年12月的重病中完全恢复过来。在那段时间

① A·阿夫托洛哈诺夫：《斯大林死之谜》第197页。——原注

② 《大陆》第9期（1976年）第379页。——原注

里，他很少发表演说。最大的可能是，斯大林的病况不允许他对贺词进行答谢。斯大林未能在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作冗长的总结报告，而将这一任务委托给马林科夫去做，自己仅限于作了一个短短的总结发言，其原因之一也是斯大林的健康状况不好。斯大林在其生前的最后几个月里，因高血压发作而多次患病，经常性的头痛也折磨着他。虽然如此，他却顽固地拒绝系统的医疗，甚至拒绝进行全面的检查。索尔仁尼琴同阿夫托洛哈诺夫的看法大相径庭。他在《第一圈》一书中为我们描述了年逾七旬的斯大林。他写道：

“虽然他害怕承认这一点，但他已注意到自己的健康情况愈下。他记忆力衰退，常常感到恶心。虽然身上哪儿也不痛，但有时一连几小时都觉得可怕的虚弱，而不得不卧床休息。然而即便是睡觉也不能解除这种虚弱感：他起床时和上床时一样地感到瘫软无力，并且觉得行动困难。

他感到头的左半部有一重物在往下坠。他失去了思维的连续性，目光浑浊地环视着房间，辨不出墙壁的远近。

他成了一个没有任何朋友的老人。谁都不喜欢他。他自己则什么都不相信，什么都不需要。当他感到记忆力在减退，智力在衰朽的时候，一种无望的恐惧战胜了他。孤独感象瘫痪症一样蔓延到了他的全身，死亡已经向他伸出了双手，然而他却不相信这点。”^①

无疑，索尔仁尼琴笔下的年老的独裁者的形象，比阿夫托洛哈诺夫的“完全健康的人”更为接近事实。

阿夫托洛哈诺夫试图表明：斯大林于1952年实际上已失去了权力，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则掌握了大权。阿夫托洛哈诺夫声

①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第一圈》，第91、120页。——原注

称：自从这两位“狼狈为奸的同志”控制了党和内务部——国家保安部的机构之后，他们便无视斯大林的意见，甚至违背其意愿。据阿夫托洛哈诺夫说：由马林科夫在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上作总结报告这件事，没有征得斯大林的同意，而且是违反他的意愿的。他坚持认为：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根本没有同斯大林商量，便草拟了一个未来的苏共中央主席团^①委员的名单。名单中包括：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赫鲁晓夫、卡冈诺维奇和米高扬。然而当时斯大林已决定将这些人踢出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另外阿夫托洛哈诺夫还宣称：在代表大会结束后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斯大林提出辞呈，要求辞去党的领袖职务，而这个辞呈则被接受了。^②

所有这些说法当然都是杜撰的，斯大林尽管年事已高，心力衰退，但是在1952年他仍牢牢地把握着所有主要的权力杠杆。他周围的那些人——包括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在斯大林每次召见他们的时候，都怀有一种恐惧感，因为他们从来不知道这种召见将以什么而告终。斯大林的行为如同过去一样粗暴。如：他轻蔑的将他们所有的人称为“瞎猫崽子”。似乎是为了检验他们的“忠诚”，斯大林还搞过不少拙劣的恶作剧。在他别墅里举行的冗长的“宴会”上，他常常故意地将他们灌得酩酊大醉。米洛万·吉拉斯在《同斯大林谈话》一书中，以及斯大林女儿斯维特兰娜在《仅仅一年》一书中，都生动地描绘了这类“宴会”。斯大林晚间的客人们——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们，往往会发现自己坐在了事先偷偷放在椅子上的西红柿或者一块点心上，在别墅的花园里散步的时候，他们会被推进池塘里，而且

^① 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1952年10月），政治局被重新改组并更名为苏共中央主席团。——英译注

^② A·阿夫托洛哈诺夫：《斯大林死之谜》，第161页。——原注

经常受到令人难堪的对待。在克里姆林宫放映新片时——所有新电影在发行前都要由斯大林亲自过目——他会突然站起来，离开放映室。斯大林这一举动被视为是不高兴的表示，莫洛托夫便命令影片立即停放。可是，政治局委员也好，导演或剧作家（是他告诉我这一故事的）也好，却都不敢擅自离开放映厅。几分钟之后，斯大林回来了，他当众扣着裤子扣，问道：

“怎么停了？继续演啊！”这是一次典型的测试其仆从忠诚与否的“斯大林式试验”。斯大林经常喜欢以粗暴的态度，甚至带有明显蔑视的态度对待其下属。他通常在半夜打电话给某位部长或地区党委书记，听到对方回答之后，便发表几句含糊不清的意见，然后不表示感谢，不说一声再见，甚至不顾已经开始的谈话，而突然挂断电话。电话线另一端的人则被留在惊恐和迷惑不解的状态中。例外是很罕见的。甚至在今天，某些原斯大林的密友们，在回忆起这种例外的时候，都毫不掩饰其洋洋自得的心情。原财政部长茨维列夫就曾记述过一次同斯大林的电话谈话，他写道：“在谈话结束的时候，斯大林说了句‘再见’。这是极不寻常的。在通常情况下，他都是将电话一挂了事。”^①

确实，甚至在十九大之前，斯大林的粗暴、无礼已超出了他通常的界限。有几次他说过：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米高扬是英国特务。他还告诉过法捷耶夫：作家爱仑堡和巴甫连科是特务。此外，紧接苏共十九大之后召开的有关组织问题的第一届中央全会上，斯大林借口年事已高，突然出人意外地请求解除他的职务。然而在对这位领袖低三下四的崇拜气氛中举行的这届全会，拒绝接受斯大林的辞呈（同阿夫托洛哈诺夫的断言相反）。当斯大林宣布他希望离职“休息”的时候，中央委员

① A·茨维列夫：《部长札记》（莫斯科1973）第246页。——原注

们对此的反应是：在会议厅的各个角落里大吵大嚷起来。他们哭喊着“敬爱的斯大林”“我们生身的父亲”等等。坐在前排的中央委员们则跪倒在他面前哀求斯大林不要离开他的岗位。斯大林“答应”继续留任，同时对某些老政治局委员们表示了不满。然而，草拟中央主席团候选人人选的，不是马林科夫和贝利亚，而是斯大林本人。在这个名单中包括了几乎所有的前政治局委员（其中包括在他批评性的讲话中刚才提过的那些人），另外还包括了不少直至当时在党内还没有什么影响的人。这个扩大的主席团显然是因为斯大林准备更换其身边的仆从们而产生的。

阿夫托洛哈诺夫对有关斯大林之死的问题发表过不少看法，他向他的读者们提供了斯大林是如何被贝利亚用慢性毒药谋害的说法。然而为了“客观”起见，他也曾引述过据说是由爱仑堡告诉萨特的故事：于1953年3月1日，卡冈诺维奇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发言，要求成立一个对“医生谋杀案”进行客观调查的专门委员会，并要求撤销将犹太人放逐到苏联边远地区的斯大林的命令。卡冈诺维奇得到除贝利亚之外所有老政治局委员们的支持。这一统一行动向斯大林表明，一个针对他的阴谋已经形成。失去自制的斯大林用粗话破口大骂起来，以严厉的惩罚相威胁。然而他们早已料到了斯大林的这种反应，并采取了适当的预防措施。米高扬告诉暴怒的斯大林：“如果在半小时之内，我们不能作为自由人走出这所建筑物的话，军队便会占领克里姆林宫。”作此宣布之后，贝利亚改变了立场，并加入了多数人的行列。

贝利亚的背叛是对斯大林的最后一击，他的情绪完全失去了平衡。更有甚者，卡冈诺维奇当着斯大林的面，撕碎了他的中央主席团委员证件，并将碎片扔到了斯大林脸上。斯大林尚未来得及将克里姆林宫卫队召来，便中风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觉。直

到3月2日上午六时，医生们才终于被准许进入这个房间。①

可是，阿夫托洛哈诺夫对上述这个故事的可靠性表示怀疑，他坚持认为斯大林是由贝利亚用下毒或其他方式杀害的。他在他那本书的序言中写道：

“如果说，所有斯大林的最后一届政治局委员们，已经死于或能指望死于正常死亡，那么他们只应该感谢他们所杀死的那个人：贝利亚。事实上，比第一次甚至更要可怕的第二次‘大恐怖’没有出现，成千上万的人从契卡分子的枪弹下，几百万人从集中营中被解救了出来。也正是因为这一事实，全国大概最应该感谢的人就是贝利亚。虽然这一切并不是他的目的，这种贡献也并非出自他的本意……然而象他那样非常了解斯大林的人，象他那样熟知他前任命运的人，对斯大林是不可能抱有任何幻想的。问题很清楚：斯大林可能会要他的脑袋，而贝利亚除非成为第一个打击对象，不然他也决不会采取拯救自己的行动。因此，他策划了这个艰巨然而执行得十分出色的反斯大林的阴谋。他证明了：甚至是斯大林自认为无敌的政治谋杀艺术技巧，也是可以超越的。”②

虽然阿托洛哈诺夫在其书的后三百页中，企图证实他对这一事件的看法，然而他甚至未能成功地作出一个自圆其说的解释。他所讲述的爱仑堡的故事中，也存在不少令人难于相信的情节。米高扬也好，卡冈诺维奇也好，是不可能有所谓上述那种举动的。我无法知道爱仑堡对萨特到底说了些什么。我也不知道在（1956年9月1日，阿夫托洛哈诺夫所引证的）《世界报》上到底公布过些什么。可是，在我于1965年到1966年撰写《让历史来审判》一书的时候，曾几度遇见过爱仑堡，他曾详细地给我

① A·阿夫托洛哈诺夫：《斯大林死之谜》第226—227页。——原注

② 《斯大林死之谜》第1—2页。——原注

讲过所有他知道的有关斯大林和斯大林生命最后几天的情况。据爱仑堡说：放逐犹太人的计划于1952年底至1953年初开始付诸实施。在东部某地临时性简易房屋已经建造完毕。在正式开始移民之前，原打算还公布一个由犹太知识界最知名人士所签署的“致犹太人民呼吁书”，号召所有的苏联犹太人服从苏联政府的决定。爱仑堡当时断然拒绝在真理报上（国家监察部长，中央委员列夫·麦赫利茨和杰出的历史学家萨克·明茨已签了字）的“呼吁书”文本上签字。后来爱仑堡为此而十分自豪。麦赫利茨派人请来了爱仑堡，并花了许多时间劝他签字，然而当利诱与威胁都告无效以后，他便走向保险柜，从中取出了带有斯大林亲手批语的“呼吁书”草本，并问道：“你知道这是谁的笔迹吗？”可是甚至在这以后，爱仑堡仍然拒绝在呼吁书上签字。爱仑堡回家后，日复一日地等待着不可避免的报复到来，然而不久之后，他便发现在主席团内部对这一计划也存在着不少反对意见，而斯大林则未能使他的计划得到中央委员会或中央主席团的正式批准。斯大林无疑对此极为生气。但是爱仑堡从未听说过有任何由卡冈诺维奇和米高扬（一个亚美尼亚的犹太人）为首的，有军队参加的反斯大林阴谋。实际上，这个身患高血压的人，对中央主席团某些人“图谋不轨”的行为勃然大怒，这很可能是导致他得了脑溢血的真正原因。然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首脑或党的领袖（在这方面苏联当然并非唯一的），能指望自己不处于“有压力的情况下”——一种时髦的说法——而生活；也没有道理认为，斯大林不是由于疾病和年龄的正常原因而死亡。在一份由卫生部长A·特列基雅科夫，克里姆林宫医务首脑I·库泊林和一大批重要的内科医生所签署的斯大林死亡原因报告书中写道：

“死后进行的生理解剖表明，在大脑的左半部出现了大面

积溢血。溢血使大脑的一个重要部位完全损坏了，并导致了不可挽回的呼吸和血液循环紊乱。除脑溢血外，左心室实质性肥大，心肌、胃、肠粘膜也大面积出血。另有血管的动脉硬化病变，尤其是脑血管的硬化。这些都是慢性的高血压所致。病理解剖的结果，完全证实了斯大林的医生们所做的诊断。解剖结果说明，最初发生的脑溢血决定了斯大林所患疾病的特性。但是，所采用的所有应急措施都未能得到积极的效果，也未能避免最后的不幸结局。”^①

没有理由认为这份医学报告是不真实的。

关于斯大林，托洛茨基于1937年写道：

“斯大林绝不是什么天才。如果我们所理解的天才，是一种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与相互关联中理解它的能力，那么斯大林就连这个词的真正意义也没有理解（但是他并没有发疯。在热月的顶峰上，他开始相信自己是权力的源泉）……从人格的角度上，人们甚至无法将斯大林与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进行比较。不管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如何没有价值，作为这种反动学说的两位意大利式和德国式的成功的领导人，从一开始就显示出首创性，唤起了群众，并追随了群众选择的道路。斯大林则与此毫无共同之处。他从政党机构中产生，并且一直不能脱离它。斯大林与群众毫无接触，还不如那个政党可以做到的那样……。但是这种解释绝无替斯大林开脱罪责之意……相反，他的罪行是无与伦比的，因为任何一位严肃的革命者都不会想到使用恐怖手段。斯大林主义将历史地被群众革命的胜利所推翻，只有这样，才会出现现实的和道义上的圆满结果。这种结果是必然的，斯大林将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为血腥的人物而离开

^① 见1953年3月7日《消息报》。——原注

舞台。”^①

但是托洛茨基错了，他的希望全是幻想。斯大林并没有完全依靠恐怖手段，他得到了大多数人民的支持，所以根本不会有新的群众革命。由于受到有效的狡诈宣传的欺骗，人民曾给过斯大林“为人民服务”的荣誉，甚至还称他作出了其实是完全编造的“贡献”。如果法国作家埃马纽尔·德·阿斯蒂耶的话是可信的，那么就连托洛茨基的儿子列夫·谢多夫也不同意他父亲的说法，他写道：“人们不应该为选择与朱加什·维利进行斗争所需要的战术和手段而烦心。一个暴君必然要象暴君那样倒台。”^②

但是，在否认存在反斯大林的阴谋的同时，我并不认为这种方法在原则上是不可取的。暴君和专制者，篡位者和政治罪犯，都应受到比历史的法庭给予的更多的处罚。民主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托马斯·杰弗逊，于十八世纪末在一封信里写道：“国家的自由得以保存，只是由于统治者一再被警告：人民中存在着反抗情绪……。一两个世纪来的那些牺牲意味着什么呢？自由之树只能一遍遍地以爱国者和暴君的鲜血培育——这是它的天然养料。”^③

① L·托洛茨基：《斯大林的罪行》（苏黎世1937年），第14、110、114页。——原注

② 埃马纽尔·德·阿斯蒂耶夫：《论斯大林》（贝隆，巴黎，1963年）。——原注

③ 索尔·K·佩多沃：《杰弗逊》第156页（伦敦，乔纳森角，1942年）。——原注

第八章

斯大林之后的二十五年

斯大林死后的第三年，在莫斯科举行了苏共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1956年2月14日，大会宣布开幕后，代表和来宾们肃立默哀，悼念那个不久前还是他们的“父亲和导师”的人。

在集中开会的十一天中，代表们听到了不少来源于官方与非官方的消息，苏共新领导确实不负众望：农业方面，在经历了斯大林时代最后一个危急的年头后，1954年至1955年出现了明显好转。一直窒息着农村的过高税收被大大削减，同时对集体农庄产品收购价格做了令人满意的提高。对工业生产计划也重新进行了调整，以增加消费品生产和住宅建设，并加快了服务行业的发展步伐。

在外交政策方面，新的领导集团也取得了一些成就。苏联和一些国家诸如印度、埃及甚至南斯拉夫的关系都有明显好转；和中国的关系看来也有所改善。正是在1955年至1956年间，“缓和”的字眼第一次在我们的政治语汇中出现。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对大会的报告中提出：防止在强国之间重开大战不仅必要，也是可能的，武器竞赛应让位于“和平共处”、经济竞赛，甚至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合作。

在经历了1953年的种种事件之后，安全机构被置于党的有

效控制之下，对其人员和机构都做了大量裁减。由于斯大林死后立刻得到纠正的只有1949年至1950年间发生的“列宁格勒谋杀案”，所以事实上仍然有几百万犯人在密布全国的监狱和集中营里熬度时光。然而在一年内其他的一些案件正在重审并开始平反。到二十大召开时，大约有一万二千人获释，其中大部分是三十年代被捕的共青团和党的工作者，一些人甚至被邀请出席了大会。在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中赫鲁晓夫只提到战胜“贝利亚集团”，并没有触及斯大林。只有米高扬在发言中提到了“个人迷信”，他以极其谨慎的措词论述了个人迷信的严重后果，并谈到了为柯秀尔和安东诺夫·奥弗申科平反的问题。

根据会议的速记记录，二十大于2月25日闭幕，实际上，正式的闭幕式是在2月24日晚上。一百二十五名十九大中央委员中，只有七十九人重新当选；新当选的五十四人被用以加强赫鲁晓夫的个人地位。中央委员们聚集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一中全会，代表们则在讨论大会决议并收拾行李准备回家。临近午夜，所有的人又突然被召集到克里姆林宫，这次兄弟党的代表团和来宾们都没有在场。会上宣布这是一次特别的闭幕会议，然后赫鲁晓夫登上讲台，以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宣读了他著名的、长达四小时的“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报告。

惊呆了的代表们默默地听着，报告只是偶尔被台下震惊或愤怒的人声打断。赫鲁晓夫谈到了在斯大林认可下进行的大规模非法镇压，谈到了对许多入狱的人包括政治局成员的惨无人道的迫害和折磨，谈到了这些人临死前写的书信。他还提及了基洛夫之死的可疑背景以及牵涉到斯大林的可能性。从报告中代表们知道了斯大林在卫国战争初期精神崩溃，在战争爆发的关键时刻擅离职守；知道了斯大林对苏联红军在1941年至1942年间的惨败负有直接责任。按照赫鲁晓夫的说法，是斯大林发动

了战后年代的大规模镇压；而农业的危急景况和苏联对外政策的失算也应归罪于斯大林；正是斯大林自己纵容了个人迷信并且篡改了党史。

赫鲁晓夫发言以后，没有进行任何辩论或是通常的讨论。几个月后公布的官方决议说，大会通过了赫鲁晓夫的报告，并指示中央委员会“坚定不移地采取旨在彻底克服违反马列主义原则的个人迷信的措施，并消除其在党和国家以及意识形态各方面造成的后果。”^①

赫鲁晓夫的报告当然无法摆脱外界的注意，当天国外就报道了这个秘密会议举行的消息，几星期后，美国国务院散发了报告全文的英文文本。

这一报告对世界公众舆论和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有关这点在此我不准备详细谈论。^②我只想指出，对赫鲁晓夫报告中的疏漏和肤浅之处所进行的众多批评，并没有考虑到当时赫鲁晓夫地位的复杂性。

1956年初，中央委员会内部状况使赫鲁晓夫不可能对有关事件进行任何系统的调查。他不得不极端小心谨慎，因为他的行动显然危及很多当时的中央委员会和主席团成员，如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马林科夫等人。贝利亚被处决后，他的许多亲信也在各个城市受审，但在审判中从未提到斯大林的名字，一切违法的罪责全部推给了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赫鲁晓夫在准备二十大的发言时，他实在是铤而走险，

① 《苏共二十大记录稿》(莫斯科，1956年版)第498页。——原注

② 秘密会议结束后，某些可靠的外国共产党代表团被允许知道了赫鲁晓夫报告的内容。报告只能在他们手中放几个小时，要求他们掌握报告实质并绝对保密。甚至赫鲁晓夫本人在大会结束不久，也公开否认有过什么秘密报告的谣言。很多西方共产党领导人直到美国国务院于当年6月发表秘密报告后才看到它的原文。——原注

他必须依靠他的那些亲信，独立、果断并迅速地行动。赫鲁晓夫和他那伙人并不清白，这一事实使他们自身的地位非常脆弱。如果他们对斯大林时代的种种罪恶也要分担责任，那么对斯大林的揭露肯定会搞到他们自己头上。兴风作浪，到头来会不会把自己也卷进去呢？谁也无法预料。但结果证明，在这场赌博中赫鲁晓夫赢了，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赫鲁晓夫戏剧性揭露的积极意义，使任何暂时的问题都无足轻重了。

外国共产党人和西方的苏联问题专家们，至今还在讨论赫鲁晓夫的“动机”问题。他的决定无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有一种观点认为，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罪行的不太公平的谴责，是为了使官僚体制走上正规，因而他在发言中特别强调了非法逮捕党政官员的问题，似乎是在向上层官僚集团保证类似的镇压今后不会再次发生，以此改善极权体制的效能并巩固特权阶层的利益。^①

我们知道，虽然在斯大林统治的年代里无人能从恐怖中逃脱，但处境最危险的还是那些党的上层人物。如同拿破仑的将军们最终厌烦了没完没了的战争，斯大林手下的这帮人，包括那些为了升官而俯首听命的碌碌之辈，也对他那种病态的猜忌，以及朝不保夕的自身境况感到厌倦。对此赫鲁晓夫当然也有同感，这对他决定揭露斯大林崇拜无疑起了作用。很显然，他确信他能得到党的大多数干部的首先支持。但是这并不是最重要的一点。斯大林的官僚们不可能对如此直截了当地历数斯大林的罪恶感兴趣，因为这样做必将导致他们自己威望的下降。他们担心他们要承担和斯大林同谋的罪责，因此，尽管赫鲁晓夫的报告仍然有不少回避和保留，但对他们来讲，这还是过

^① 特权阶层指由党直接或间接掌握的登记名册中所有人的总称，这一名册几乎囊括了所有身居负责岗位的人。——英译注

于危险的一步。

更为常见的一种看法认为，这个报告是赫鲁晓夫在权力斗争中决定性的一着。为了争取主动，他对斯大林最亲密的战友莫洛托夫、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和米高扬等人先施一击，这些人踌躇满志，自认为是已故独裁者权力的当然继承者。尽管赫鲁晓夫从未指名道姓，但是这些人显然深深地陷入了他在二十大秘密会议上大加谈论的那些可怕罪行。这不失时机的一击，动摇了这些“领导人”脚下的基石，他们面临着一个简单的抉择：或者屈从，或者完全丧失权力。这种说法显然有相当合理的部分。

从赫鲁晓夫在二十大以及之后的发言中可以看出，他年轻时代对斯大林的狂热忠诚早已被小心深藏的敌视和恐惧心理代替了。斯大林经常用一种取笑和嘲弄的态度羞辱头脑简单的“尼基塔”。“尼基塔，给我们跳个舞吧！”在庆祝基辅解放的一次晚宴后，斯大林这样吩咐他。赫鲁晓夫曾经描述过斯大林有时怎样将他召往苏呼米附近的南部别墅或其他地方，让他在客厅一等就是几小时，然后斯大林偶然走过，用一种粗暴的腔调问道：“你在这儿干什么？回去！”因而，一旦权倾天下，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积压已久的仇恨终于爆发了。

赫鲁晓夫在1955年至1956年间的许多行为，与他值得称道的个人品质不无关系。与斯大林的其他同僚相比，他更愿意行善并忏悔；在斯大林的政治局全体成员中，似乎只有赫鲁晓夫能与工人，尤其是与农村保持直接接触。俄罗斯和乌克兰农民们令人震惊的困苦景况使他大为烦恼。当他在执行斯大林或马林科夫的指示，从饱受战火蹂躏的农村大规模征集农产品时，他的心情是沉重的。

不过，我还是倾向于这个观点：身为第一书记的赫鲁晓

夫，他的许多作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一个正统党务工作者多年形成的经验；在一生中，他身上保留了二十年代党的基层领导人的某种典型气质。在动乱年代应运而生的这一代人，历经革命、内战、新经济政策各个时期，尽管他们没有象最高领导层那样受过良好教育，却比他们更加团结。把这些党务工作者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那种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和相互信任、利益一致的气氛中产生的特殊友情，只有在战斗中生死与共的军人间的关系才能与之相比。党的中层领导人对斯大林外在的质朴，甚至对他的粗鲁，较之对傲慢的托洛茨基那种有教养的文雅，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那种典型知识分子议而不决的学究气，印象都要深刻得多。这个因素对于斯大林战胜左翼反对派所起的作用，可能比任何理论之争都重要得多。党的第二代领导人是实干家而不是理论家，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所有行动都经得起推敲，这些人几乎都在三十年代后期的大恐怖中遭到了清洗。赫鲁晓夫得以幸免，因为他接受了斯大林的准则，但他从来没有成为一个铁杆的斯大林主义者，在他的内心深处，一直对他的老朋友们的被捕，对那些将他引入革命生涯的老一辈党的活动家如沃拉斯·楚巴尔和斯坦尼斯拉夫·柯秀尔等人被控的罪行存在怀疑。当他终于当上了党的第一书记，并在马林科夫、朱可夫和布尔加宁协助下消灭了贝利亚一伙之后，除了要全力对付经济问题，他还决定为他以前的朋友们恢复名誉，并立即将这些人的家属从流放地接了回来。这些前乌克兰和莫斯科党组织中的朋友们的孤儿遗孀回到首都后，他们所说的许多事情是赫鲁晓夫意想不到的。——人们的痛苦和愤怒也促使他产生作秘密报告的动机。

虽然秘密报告在苏联从未公开发表，但是也不曾对苏联人民保密。3月下旬，市和区的党委代表们在有非党人士和党员

参加的群众大会上宣读了报告全文。人们当然会猜想这是赫鲁晓夫的授意。

不用说，承认斯大林时代种种骇人听闻的罪行，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一次痛苦和严峻的考验。在西方，许多共产主义者纷纷退党。在这之前，各国共产党一直否认苏联存在非法迫害和酷刑的传说和报道，并斥之为资产阶级报刊的恶意捏造。但是从莫斯科苏共代表大会突然传来的消息，证实迄今为止资产阶级报刊上的许多东西是千真万确的，甚至还有更多更加恶劣的闻所未闻的坏事。对于所有的苏联崇拜者和社会主义支持者来说，这是很难忍受的。但对于过去所犯的罪行来说，这种代价又是公正和不可避免的，而且这些往事终究不可能长久掩盖下去，隐瞒斯大林的罪行可能在将来导致更严重的后果。

显然，要想顶住这些惊人揭发带来的巨大打击，只有根据二十大的政策路线，对党领导的体制和方法进行大胆的改革。不幸，以后的政治发展道路却十分曲折，二十大后几个月，党员个人之间关于个人迷信问题的讨论被取缔了，其中有些人受到党纪处分；《历史问题》编委会因发表了一篇批评斯大林在1917年3月所犯错误的文章——尽管措词十分谨慎——而被解散。一篇译自中国《人民日报》的文章出现在《真理报》上，它以大量诡辩手法论证说，斯大林的“错误”甚至可以“丰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几个月之后，赫鲁晓夫本人也被迫声称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伟大的革命家”，党不会容许“斯大林的名字被共产主义的敌人所利用”，所谓“斯大林主义”的概念只是反苏宣传的捏造。

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平反还在继续：释放了几乎全部的政治犯；迅速地对有关档案材料进行复查；为1935年至1955年间

死于集中营和监狱的绝大多数人恢复名誉。根据赫鲁晓夫亲自下达的指示，成立了近百个特别委员会，每个委员会包括一名检察院的代表，一名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和一个1954年至1955年间得到释放和平反的党员。这些拥有最充分权力的委员会从莫斯科直达所有的“古拉格岛”，他们仔细审查各个案件并迅速予以解决——看一下申诉书，再和犯人简单谈上几句，然后就宣布判决（通常是释放），并且是终审判决。那些曾被判罪，但早已服刑期满的人也得到释放。被释放和平反的还有所有战俘和那些被诬为“叛国犯”的苏联公民。到1956年8月，已有几百万人获释。

如同大恐怖的千百万受害者死后得以平反一样，数百万囚犯能够重返家园，也是苏共二十大的一项成果，它对国内的影响不亚于对斯大林的公开批判。

当然，平反工作还是存在游移和妥协，在莫斯科和集中营都有这种情况。例如，没有为二十年代的反对派成员平反，也没有对1928年至1931年和1936年至1938年骗人的政治审判正式重审。二十大后，尼古拉·克列斯廷斯基的遗孀花了七年时间为她的丈夫争取平反，他在1938年与布哈林一起被判罪，当中央委员会终于通知她克列斯廷斯基已得到平反并恢复党籍时，她心脏病立即发作，倒在电话机旁死去。布哈林的遗孀在关押和流放十七年后，被允许返回莫斯科并予以平反，但至今却没有为她的丈夫恢复名誉。甚至对于图哈切夫斯基、雅基尔及其他红军将领的判决，也直到1957年底才重新审理。十月革命期间的彼得堡著名领袖费多·拉斯考尔尼柯夫则是在1963年才恢复名誉。

二十大后不久，成立了一个中央特别委员会，着手调查基洛夫被刺事件、组织1936年至1938年“公开审判”的情况、奥

尔忠尼启泽自杀的背景以及斯大林其他的一些罪行，包括暗杀高加索地区的重要领导人罕基安和拉科巴。但是，该委员会的工作进展缓慢，并且遇到不少阻力。此外，1956年的匈牙利和波兰事件使中央委员会内部的权力之争更趋尖锐，一边是赫鲁晓夫及其忠实支持者，另一边是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这些声名昭彰的斯大林分子。布尔加宁、别尔乌辛、萨布罗夫、谢皮洛夫等人也很快加入了他们一伙。表面上，这是一场围绕经济问题的斗争，实质则是二十大路线的继续和发展问题。虽然在一系列戏剧性的事件后赫鲁晓夫终于胜利了，他保住了并大大扩充了他的个人权力——他兼任了部长会议主席——但在一段时间内他还是不愿意在揭露斯大林问题上走得更远。装有斯大林遗体的水晶棺仍然停放在红场的列宁墓中，数以千计的城镇、街道、广场、工厂、集体农庄和建筑物仍然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1956年至1960年间，苏联报刊对那些与在斯大林恐怖时期遇害的最著名党政人物有关的纪念日仍然缄口不提，尽管这些人几乎都在死后得到了彻底平反。然而，1959年12月21日，全部报刊却以大量篇幅纪念斯大林八十周年诞辰。《共产党人》期刊曾这样写道：

“12月21日是约·维·斯大林八十周年诞辰。他是我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卓越最活跃的领导人之一。约·维·斯大林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组织家，是共产主义的坚强战士，他忠实于马列主义，献身于劳动人民的利益。三十多年来斯大林一直担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他没有辜负党的重托，对党，对苏维埃祖国和人民，对国际共产主义与工人运动都做出了伟大贡献。”^①

^① 《共产党人》1959年第18期，第47页。——原注

从1957年6月的中央全会到1961年二十二大召开，苏联进行了大规模的体制改革和计划调整，包括对工农业管理部门的一些整顿，改革教育制度，取消拖拉机站，采取紧急措施增加肉类和牛奶生产等等，改革和整顿的范围相当广泛。六十年代初的国际局势日趋复杂，东西方的缓和气氛经常被冷战的恶语所代替，与南斯拉夫的关系再次紧张，与中国的关系也在不断恶化，已经发展到了严重敌对的地步。这些年里，赫鲁晓夫的个人权力继续增加，与此同时他却在失去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问题成堆，前途未卜，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着预定于1961年秋召开的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

表面上，召开二十二大的目的是讨论通过新的党纲。根据这个纲领，苏联将在十年内，也就是在1970年以前，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产品生产及福利的人平均量），并在二十年内“基本”建成共产主义。但是，纲领草案的公布并没有在人民中引起多大的热情。农业在1959年至1961年一直处于停滞状态，随之而来的是城市肉类和奶制品供应的明显下降和集体农庄庄员收入的降低。左右群众情绪的自然是他们亲身体会到的与日俱增的种种困难，而不是甚为遥远的光明前景，尽管这种前景被描绘得十分富足。对赫鲁晓夫来说更为严重的还是其威望在各级主要党政部门中普遍下降。这主要是因为大家对他的那些没完没了的整顿感到厌烦。所有这些都为可被称作“新斯大林主义”的反击提供了有利条件。赫鲁晓夫和他自己的“内阁”无疑都知道在权力机构中日益增长的这种不满情绪，这也是促使赫鲁晓夫在二十二大上再一次公开提出斯大林问题的部分原因。

根据可靠消息，当时主席团讨论即将召开的党代表大会议程时，确实决定了会议不涉及斯大林，也不提“马林科夫、莫

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以及追随者谢皮洛夫的反党集团”。但是，出乎主席团很多成员的意料，当赫鲁晓夫1961年10月17日登上讲台时，却在一篇不留情面、措词激烈的发言中，提出了斯大林的个人迷信问题。不止于此，他的揭露在规模上更进了一步，不仅斯大林本人，他那些亲密的助手和同伴也都被公开点了名。

“首先，”赫鲁晓夫声称，“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顽固反对党内路线；他们反对指责个人迷信，反对开展党内民主，反对谴责和制止滥用权力，反对揭露那些迫害别人的实际罪犯。他们采取这种立场并不是偶然的，因为他们对大规模地迫害党、经济部门、军队和共青团的干部，以及个人迷信时期发生的其他类似事件负有个人责任。”^①

赫鲁晓夫发言的临时变动，在大厅休息室里引起了热烈的讨论。这也意味着代表们就此可以在党代会的公开会议上（这一点至关重要），指责斯大林时代的种种罪恶了。所有的人赶忙改写已经准备好的发言稿。第一批发言的K·T·马祖罗夫详细叙述了马林科夫是怎样消灭白俄罗斯党的干部的。福尔采娃和波利扬斯基揭露了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的罪行。米哈依·肖洛霍夫在10月24日的发言中要求将这一派别的成员开除出党，代表们对这个建议热烈鼓掌响应。特别是伊利切夫、什维尔尼克、谢列平和谢尔丘克提供了斯大林、莫洛托人、伏罗希洛夫等人罪行的详细材料，并揭发了1936年至1939年间种种骇人听闻的罪恶真相。根据讨论，赫鲁晓夫在闭幕词中又重提斯大林一伙所犯罪行的问题，火力比开幕词更为集中。

大会闭幕前，列宁格勒、莫斯科、格鲁吉亚和乌克兰代表

① 《苏共二十二大记录稿》（莫斯科，1962年版）第1集，105页。——原注

团的代表们要求将装有斯大林遗体的水晶棺搬出列宁墓，因为，如杰米切夫所说，“把它继续放在那里将是一种亵渎”。大会通过了一项特别决议：“鉴于斯大林严重违背了列宁的遗嘱，滥用职权，对忠诚正直的苏联公民进行广泛镇压，再将斯大林的水晶棺保存在列宁墓是不合适的；斯大林在个人迷信时期的这些和其他许多行为已使得自己的棺木继续存放在列宁墓成为不可能。”①

决议于10月30日上午通过，10月31日傍晚执行。著名诗人叶甫盖尼·叶甫图申克在一首轰动一时，题为“斯大林的继承者”的诗中写道：

大理石不会说话，水晶棺在无言中闪光。

默立的哨兵，脸色晒得黑红。

当他们把他抬出列宁墓的大门，

几缕青烟在棺木上环绕，

一丝气息从裂缝中漏去。

棺材慢慢地飘起，擦过了哨兵的刺刀。

他也不会说话，——他也不会！——他沉默、长眠。

紧紧地握着他那经过防腐的拳头。

他只不过是装死，实际上却在里边注视着……

他只不过是打个盹儿，他在筹划，

我呼吁我们的政府，我请求他们

派两倍、三倍的哨兵来看守这个棺材，

不要让他东山再起。②

但是在埋有斯大林遗体的墓石附近并未设置哨兵。在离列

① 《苏共二十二大记录稿》(莫斯科1962年版)第3集，第362页。——原注

② 《叶甫盖尼·叶甫图申克诗集》乔治·李维译(纽约十月房公司1965年版；伦敦卡尔得出版社1969年版)，第161页。——原注

宁墓不远的地方，他们挖了一个深坑，把棺材放了进去。他们没有往坑里填土，却运来了几大卡车水泥浆，浇灌到坑底的棺材上。墓上立了一块花岗岩石碑，后来又刻上了简单的碑文：“J·V·斯大林”。1961年10月31日，当赫鲁晓夫宣布二十二大结束时，列宁墓里已不再有斯大林的遗体了。

与二十大相比，二十二大在搞臭和谴责斯大林主义这一点上大大前进了一步。这不仅是指在大会上揭发了斯大林同伙们的许多新的材料和事实，关键的区别在于：这些问题都是公开谈论的，而且所有发言都全文见报。两个星期左右人们每天争相读报，为每一件新的揭发所吸引。相比之下，关于新的党纲问题自然就显得不重要了。只是在二十二大之后，才有可能清除斯大林迷信的各种象征。许多城市、广场、街道、工厂、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都重新命名。1956年，若干城市曾拆除了斯大林纪念像，如伏尔加——顿河水坝上用斯大林亲自批准动用的青铜建成的巨大塑像，当时就被搬去熔化了。但在许多城市中，斯大林像仍然矗立，只是二十二大以后，这些东西才全部消声匿迹。只有在格鲁吉亚，人们还可以穿过一条“斯大林大街”或“斯大林大堤”。甚至遇见个别纪念斯大林的小型展览会。

二十二大为许多学术性的研究和出版开了绿灯，这些在从前一直视为禁区。1962年至1964年间出版和发表的许多书籍和数以万计的文章，提供了斯大林及其追随者们的各种犯罪事实。所有中央和地方的报纸都开始登载斯大林的受害者的讣闻，包括政治家、经济学家、将领、作家和艺术家。二十大以后，少数几个人决定在绝对秘密的情况下撰写自己悲惨经历的回忆录。而现在却有数十人，甚至成百人开始写这种回忆录。当然水平和客观性各有不同。在文学上，“集中营主题”也得到

了反映。特别具有意义的是在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的《新世界》杂志上发表了索尔仁尼琴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还有其他一些同样题材的作品，除了在苏联出版（如《高尔巴托夫回忆录》），有些还以打字稿形式在国内流传（叶甫盖尼亚·金斯堡的《进入旋风》；瓦拉姆·沙拉莫夫的《科雷马河的故事》）。这些作品都给读者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二十二大以后，类似二十大后在西方一些共产党内曾出现的感情用事和重新评价的倾向，苏联也势不可当地经历了一段困难复杂的过程。因此，出现了“党的二十大和二十二大路线”的习惯性提法。

不幸，赫鲁晓夫在二十二大得到的主要政治资本很快就用完了。在党政机构中，对他前几年进行的无数欠考虑的体制改革出现了持久的怨恨，由于这种改革看来还要继续下去，沮丧情绪也不断增长。但在代表大会刚结束的头几个月里，赫鲁晓夫的威望仍然很高，而且由于对中央委员会的组成进行了根本改变，他的个人地位得到了空前的加强。从二十大开始的对他的过份赞扬日益暴露了新个人迷信的所有迹象。他变得越来越武断、急躁和粗暴。中央全会，甚至主席团会议都成了形式，因为重大问题都由赫鲁晓夫个人或是在其亲信和亲戚组成的圈子里决定，而这些人则根本不是中央委员或主席团成员。当赫鲁晓夫上台十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之际（这和他本人的七十岁生日几乎是同时），官方诩之为“伟大的十年”，他已经走上了一条失去各阶层人民支持的危险道路。因为消费品供应不足，食物短缺和物价持续上涨，工人和机关工作人员产生了不满；集体农庄庄员们由于收入减少和被迫减少家畜饲养（在小城镇和工厂住宅区内则完全禁止饲养）而感到不安；因为赫鲁晓夫对各种知识团体的事务的那些不懂装懂的干涉，有作为的知识分

子对他开始失望，他们反对那些无谓的争吵再现，反对意识形态方面的运动以及严格的审查制度。赫鲁晓夫还卷入了与科学团体的一连串激烈争权，特别是因为他支持了李森科。教师们因为他对于教育制度感情冲动的改革而感到愤懑，对他们的微薄薪水也感到不满。医生们所得到的报酬也很低。东部北部地区的各种较高待遇以及工资差别被取消，并煽动性地解释其原因。军队的年金减少了，军队和内务部官员们的许多特权和薪金差别也取消了。由于地方行政系统的变更和分离、区党委的改组和改革党的选举程序，激怒了那些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苏联外交官们对赫鲁晓夫在外交政策上一些临时拼凑的东西也大不以为然。当他最后失去了军队和克格勃的最上层的支持时，他的下台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赫鲁晓夫是在1964年10月中央全会上下台的。对于这个行动的发起者来说是不用冒什么重大危险的，因为在中央委员会，特别是在主席团里，赫鲁晓夫已经几乎没有支持者了。

十月全会上对赫鲁晓夫提出的全部指控，没有一条有关二十大和二十二大的路线问题。与此相反，对他的最严厉指控之一就是他在反对斯大林迷信的同时，开始传播对他自己的个人迷信，他还被指控滥用职权，破坏集体领导原则和党内生活的列宁主义准则。这样，赫鲁晓夫的有名的党代会决定此时此刻就成了砸在他自己脚上的石头。

“伟大的十年”期间推行的许多体制改革在十月全会后的几个月立即被取消了。在某些方面，要改变和清除五花八门的改革则需更多的时间。不过，赫鲁晓夫的不少发明创造还是保留了下来，这只是因为要对它们有所改变不是不明智就是为时过晚。即使在赫鲁晓夫时代，“集中营文学”的出版也实际上中断了，这类作品似潮水般涌出，引起了赫鲁晓夫及其智囊班子

的恐慌。但是在十月全会以后仍然出现了一些批评斯大林的书籍和文章。例如，只有在赫鲁晓夫下台以后，才有可能揭露李森科及其一伙，并且发表了相当多的材料来证明斯大林个人迷信对生物学和药理学产生的恶劣影响。一些非常杰出的、在三十年代受到贬抑或遭到杀害的科学家的名字，重新被列入苏联科学史中。1965年至1966年，亚历山大·涅克里奇、尤里·特里方诺夫、鲍里斯·季亚科夫、伊万·麦斯基、茨·阿加扬、P·奥谢普科夫等人写了有关个人迷信问题的著作。

1965年头几个月，一批有影响的意识形态问题专家，军队的高级将领和一些作家开始要求重新审议二十大和二十二大决定，实际上也就是要为斯大林恢复名誉，这些人中包括中央委员会科学部首脑特拉佩兹尼科夫，红军政治部主任叶皮谢夫和马列主义研究院院长波斯别洛夫。这些与中央新领导有密切联系的新斯大林主义分子的复活，引起了广大有作为的知识分子的不安。正是在几个月中，各种手抄本和资料在知识阶层传播，以不同的形式抗议为斯大林恢复名誉（如恩斯特·亨利写给伊利亚爱伦堡的信；格里高利·波梅兰茨的小册子等等）。这就是不久后称之为“地下出版物”的由来。同时，安德烈·希尼亚夫斯基和尤里·丹尼尔被逮捕，他们被控撰写并在国外出版“造谣中伤，诋毁苏联政治和社会制度”的东西。

1966年初，开始讨论即将召开的苏共二十三大有关材料，一些有影响的团体企图借筹备党代会的时机，促成部分或间接的恢复斯大林名誉。谣传说很多元帅和将军在一封致中央委员会的联名信中提出了这一要求。1966年2月对希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的审判，实质上就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尽管国内外纷纷抗议，他们还是分别被判处七年和五年的劳改营监禁。

事态的发展更加引起了知识阶层的关注：中央委员会和

主席团收到了大量信件，反对可能为斯大林恢复名誉。一封由二十五名全国首屈一指的知识分子签名的信件影响最大，这些人中包括：苏联院士彼得·卡皮查、列昂蒂·阿尔茨莫维奇、米哈依尔·列昂托维奇、安德烈·萨哈罗夫、伊戈尔·塔姆、伊万·伊斯基，作家瓦连岑·卡塔耶夫、维克多·涅克拉索夫、康斯塔丁·帕乌斯托夫斯基、科尔内·崔科夫斯基、弗拉基米尔·田德里亚科夫，艺术家玛娅·普里谢茨卡娅、奥列格·叶弗列莫夫、P·D·科林、V·M·涅缅斯基、米哈依尔·罗姆、英诺肯基·斯莫克图诺夫斯基和G·A·托夫斯特诺戈夫。除第一批签名的二十五人之外，不久签名的还有：苏联院士A·科尔莫戈罗夫、A·阿利哈诺夫、米哈依尔·克努尼扬茨、鲍里斯·阿斯塔罗夫、P·兹德拉多夫斯基、伊里亚·爱仑堡、弗拉基米尔·杜丁采夫，艺术家G·丘赫莱依、瓦诺·穆拉杰里、伊戈尔·伊林斯基。这封信对权力层到底起了多少作用，人们只能推测。但是，二十三大上毕竟未提斯大林的名字，虽然对于二十大和二十二大的“路线”作了相当含糊的再阐述，以保留双方的行动余地：一方强烈要求对斯大林作进一步的批判；一方要求为他在政治上恢复名誉。毫不奇怪，二十三大后，围绕斯大林问题的斗争在继续。问题尽管尖锐，但争论相当谨慎。其中最主要的有：马列主义学院关于涅克里奇《1941年6月22日》和《苏共党史》第三卷的讨论，1966年10月中央委员会的意识形态问题辩论，1967年春天索尔仁尼琴致第四届苏联作家代表大会的信以及格里戈连科将军写的一些信件和声明。整个这场斗争的对立面是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主编的《新世界》和公开的斯大林主义者弗谢沃罗德·柯切托夫主编的《十月》两家杂志。这里无需对这场争论中的哪怕是最有力的事件进行探讨，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接近1968年

底，形势已经对新斯大林主义分子有利。1969年新年伊始，斯大林主义分子发起了一场引人注目的意识形态攻势。关于纪念斯大林九十周年诞辰的问题已经提交中央委员会讨论。诞辰虽是在12月，准备工作却早已开始。一种发行一千万份的1969年日历，在12月21日这一页背后注明了斯大林生日，还有一小段关于他的文字，主要写了他对社会主义斗争事业的“贡献”，只是委婉提及“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个人迷信”。很明显，是年春天已决定以相当大的规模纪念斯大林九十诞辰。虽然这些计划尚未公开，但事先通知了有关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些高级人士。例如打算在克里姆林宫附近的斯大林墓上为他立一座塑像，并在揭幕时举行一次有工人和退伍军人参加的集会；在马列主义学院将为纪念斯大林专门安排一次学术大会；《真理报》将发表一篇关于斯大林的长篇社论；莫斯科一家印刷厂奉命印刷大量斯大林肖像，国家照相馆也开始安排印制斯大林半身像，这些印刷品将在12月下半月出售；还准备出版一卷斯大林著作的选集。另有一些要把斯大林在莫斯科郊外的一所别墅变成他的纪念馆的议论。同时还在筹划某些“组织上”的变更，特别是撤消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的《新世界》总编职务，并且解散这个在苏联最负盛名的杂志编辑部。

1969年头几个月里，出现了种种谨慎的、但十分确定的策划恢复斯大林名誉的信号。例如一篇由五个人合写的，题为《列宁主义党的精神》的长篇文章发表在《共产党人》第三期上，旨在介绍苏共党史。这是自二十二大以来最直言不讳的一次替斯大林的辩护，自然引起了不少抗议。1969年9月，《十月》开始连载极端无耻的、其主编柯切托夫写的小说《你到底要什么？》。小说不仅呼吁为斯大林恢复名誉，而且毫不掩饰地号召恢复斯大林时期在党和国家占统治地位的一整套体系。柯切托

夫公开抨击斯大林死后的所有改革。以另一种方式为重新确立斯大林的政治和军事“声望”效劳的多集影片《解放》，在作家尤里·邦达列夫的协助下也摄制完成。

到1969年12月中旬，纪念斯大林的问题看来已成定局。将要登在《真理报》头版头条的长篇文章《斯大林诞生以来的九十周年》已经完成并得到批准，附在文章中的照片锁在《真理报》主编的保险柜里，同时将向各加盟共和国首都的报纸，以及各社会主义国家主要党报编辑部发稿，预定12月21日在《真理报》见报，其他各报第二天转载。然而，斯大林问题在其他党的领导层中也引起了辩论，波兰和匈牙利的党中央委员会则挺身而出，坚决反对发表这篇文章。有迹象表明：卡达尔和哥穆尔卡对莫斯科进行过非正式的紧急访问，试图劝说苏共中央不要批准为斯大林恢复名誉的稿件发表。他们警告说：这是灾难性的步骤，一旦发生，他们各自的党只能与之断绝关系，置身事外。无疑，一些西方共产党和南斯拉夫党也会作出类似反应，这确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严重威胁。1956年对斯大林的突然揭露是中苏意识形态论战的触发点之一，而1969年部分恢复斯大林名誉也可能形成苏联和许多西方党，乃至东欧国家共产党关系中的一条裂痕。尽管最顽固的斯大林派认为西方共产党的意见不足为训，完全可以不加理睬，但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已经形孤影子了。在纪念日前两三天，政治局又一次讨论斯大林问题，据一位消息灵通人士说，政治局以微弱多数决定取消为斯大林“纪念日”所做的大部分安排。斯大林墓上已经立好的半身像，在没有任何正式集会的情况下揭幕。原定在马列主义学院和格鲁吉亚举行的大会被取消了。《真理报》长篇文章也被撤下代之以一条内容迥然不同的短小注释。各加盟共和国首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当然立即接到了通知，但中央委员会的联络

官员显然没能给乌兰巴托打电话（乌兰巴托的时间比莫斯科早七、八小时），因此，在12月22日的蒙古《人民报》上出现了与原定口径相呼应的长篇文章和照片，一条注释还告诉读者，文章是从12月22日《真理报》上转载的，虽然《真理报》在那天刊登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冠以“在J·V·斯大林诞辰九十周年之际”的一小段文字，强调了斯大林“与个人迷信相联系的错误和堕落”，而不是他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贡献”。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曾将这篇短文装在一个特制的镜框里，象一张心爱的照片那样放在自己的办公桌上，直到他离开《新世界》编辑部的那一天。

对于所有执意要为斯大林恢复名誉的人来说，1969年12月的失败使他们就此一蹶不振。之后一些人为这一目的所作的种种新的尝试，诸如谢尔盖·特拉佩兹尼科夫、瓦西里·穆德扎万纳泽、伊万·舍夫佐夫、谢尔盖·什捷缅科、伊万·斯塔德纽克以及其他很多人，在国内国外的作为也都不成气候。另一方面，一些原仅在《真理报》上发表过的苏联人写的文章，也于1970年至1976年间在国外出版了。汇总起来，这些书就犹如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那篇令人欢欣鼓舞的报告一样，给予斯大林的神话以沉重打击。简言之，斯大林问题和给他恢复名誉的问题从苏联的议事日程上消失了，并且在苏共二十四大和二十五大上也未再提出。因此，可以预测，在1979年斯大林一百周年诞辰之际，苏联官方也不会有什么纪念。

但是，如果说当前已看不到给斯大林恢复名誉的危险的话——就连中国共产党近年来也不再坚持这点，那么另一种危险却仍然存在，那就是斯大林主义经改头换面又卷土重来。斯大林建立的假社会主义，其很多因素即使在苏共二十大

和二十二大以后也基本上未被触动，到了七十年代依然存在。因此，反对以各种面目出现的、公开和隐蔽的新老斯大林主义的斗争，仍然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第九章

结论：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

斯大林反复声明自己首先是列宁的忠实的学生，仅仅继承了导师的事业，在各个领域里的活动不过是实现着列宁的预见。斯大林的拥护者也重复着同样的说法，同时又加以补充，说斯大林是最好的、继承列宁遗志最坚定的学生。甚至有一些不太客观的苏联学专家也都觉得难以将斯大林主义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区分开来，他们一讲社会主义就认为社会主义是那种被斯大林主义篡改了的模式。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由索尔仁尼琴所广为宣扬的理论。在他看来，诸如“斯大林主义”这种东西根本就不存在，因为斯大林一贯追随列宁，不过是列宁遗志的“盲目而机械的执行者”^①罢了。这样一种看法，不仅对于那些企图从理论上否定各种社会主义的人来说甚为方便，而且对于那些赞成为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恢复名誉的人来说也很方便。然而这种看法错了。

有些时候，在区分斯大林主义和社会主义，斯大林主义和共产主义时，一些人采用了被曲解的形式。某些作者的表述，实际上说明他们满足于通过斯大林的存在来对马克思主义和共

^① 见A·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巴黎YMCA出版社1973年版）80页。
——原注

产主义提出疑问。格里高里·塔塔科夫斯基的杂文《群岛的正反两面》，就是此类推理的有趣例证：

“我们在一个完全矛盾的时代里生活过来了。举例来说，许多人认为斯大林对于俄国是一次巨大的灾难。从主观来说是这样，但是从客观上讲，他的存在是件好事。几十年来，所有持不同政见者为揭露共产主义所做出的努力，都不能同斯大林对此所做的贡献相比。斯大林用如此实际的手段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非人道本质，这到底是好事还是灾难呢？不错，这是一场灾难，因为千百万人因此蒙受不白之冤，但从另一方面说，不付出代价是不能得到正面结论的。我们付出了代价，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但这样一来就很清楚了，如果不是因为人类有容易忘记过去的特点，在斯大林以后，世界上就不会再有一个共产主义者了。是斯大林的‘功绩’使得所有马克思主义的伟大信徒们所捍卫的理论得以澄清，斯大林使世人看到这种理论付诸实践是怎么一副样子！……可惜，我们无法迅速改变世界上的看法。因此，还是有那么几个意大利人，或者法国人，或者瑞典人，坚信共产主义理想，猛烈攻击斯大林歪曲并败坏了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另一种体系是希特勒主义，当然它没有统治过那么多生命。从历史的角度出发，这个体系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件好事。为了使人类不去接受纳粹主义，就必须把它真正代表的东西来一次触目惊心的表演，而这正是希特勒所完成的。在我看来，一个善良的蠢人如果成为共产主义者，他的危害不知道要比一个凶残的暴徒、一个斯大林式的刽子手那样的共产主义者大多少倍。”^①

要驳倒塔塔科夫斯基这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带着赤裸

^① 《时代与我们》杂志，1977年第15期，第201—203页。——原注

裸的憎恶的理论是困难的，但他的方法被推到了近乎荒谬的地步，而这种憎恶就说明了这种方法所具有的逻辑上和历史上的缺陷。

把斯大林主义与列宁主义作比较，详尽分析其中哪些是继承的成分，哪些是背离的成分，需要另外作大量的研究。这里，我仅作了一些初步的观察。

首先必须指出，声名狼藉的斯大林主义体系不是一个人的发明创造。其发展受到很多环境与先决条件的影响，甚至包括了革命前的我国生活的某些方面的影响，也受到十月革命、内战、苏维埃政权最初六年的经验的影响。因此不用做概括性地全面归纳，我们也显然不会看不到斯大林主义在某些方面对列宁主义的继承，对这种继承所应做的是严肃的学术性的研究，而不应该去做煽动性的断言。总的来说，列宁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与十九世纪的“古典”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也正因为如此，列宁才提出要创建一个新型的党。列宁主义的很多内在的特点，是在社会主义运动得以发生和发展的俄国的具体环境下产生出来的。列宁主义也受到了总的国际形势的影响，其中包括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过渡、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等等。列宁的言论和行动也有很多是错误的，或仅在一个有限的时期内对于某些特定的情况而言是正确的。后来，列宁承认了其中某些错误，还有一些则被他所遗忘了。但仍有一些错误意见他一直坚持到逝世为止。例如，列宁在共青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共产主义道德的言论，就无法作为社会主义道德的基础，列宁说：“……道德是为破坏剥削者的旧社会……服务的。”“……共产主义道德就是为了把劳动者团结起来反对一切剥削和小私有制

服务的道德……。”^①

再者，甚至到1917年9月，列宁仍认为，一旦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苏维埃政府掌握了政权，大规模恐怖和内战是可以避免的。这一希望后来证明是不现实的。虽然，自1918年夏季开始的红色恐怖与内战，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于反革命暴力和干涉的本能自卫，但是这次恐怖也与第一个苏维埃政府，在实行其重大经济与政治措施方面所犯下的严重错误有着紧密的联系。政府的措施激起了俄国小资产阶级群众中绝大多数人的反抗，这就把苏维埃政权带到了灾难的边缘，迫使当权者求助于大规模恐怖。

对于恐怖的扩大化显然没有做任何纠正。但是我们应当记住，如果用一般适用于和平时期的法律、习惯，去衡量革命时代或是战争时期的行为，那就不可避免地要犯错误。

如果在敌人的猛烈攻击之下，士兵发生恐慌并放弃了自己的阵地，那么他们的指挥官，就会挥舞着手枪大喊“回去！”，这时很可能击毙三、四名士兵以警告其他。如果他用这个办法控制了部队，并使之回到原来的阵地或者守住了新的防线的话，那就不会有人认为这个办法是犯罪。因为不然的话，整个部队就会被消灭，其友邻部队也会受到影响。实际上，军事法庭应该有权将那些在关键时刻拿不出必要的果断措施的军官，交付执法队处决。但是，那些被击毙的不幸的士兵又有什么罪呢？是他们真的比别人罪行严重，还是因为他们比首先开始惊慌的真正罪犯靠近指挥官呢？完全可能，那些最先放弃阵地的人，在几个小时后的反击当中表现出超人的勇敢，第二天还可能受到部队领导，甚至受到那个刚刚枪毙了自己短命弟兄的军官的嘉奖。但是，如果部队指挥官在平时或演习当中向三、四名士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260页。——中译注

兵开火，那他就会被送上军事法庭。

以上这种考虑在很多方面适用于内战时期(1918——1920)的悲惨岁月，也适用于以捷尔任斯基领导的契卡，以及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领导的人民委员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不幸的是，当时有些情况使得红色恐怖成为防止苏维埃国家遭受全面失败，防止随之便会出现的白色恐怖的胜利的唯一手段了。索尔仁尼琴、沙发列维奇以及纳乌姆·科尔查文(根据他们最近的看法)都很清楚这一点，问题仅仅在于他们认为科尔尼洛夫和邓尼金比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更可取，白色恐怖比红色恐怖更可取。

但是，在内战的紧要关头作出的决定同平时时期作出的决定难道可以相提并论吗？1918——1920年间的红色恐怖，同斯大林在1929——1932年或1936——1938年间使国家遭受的恐怖难道可以等同吗？前者为的是拯救苏维埃国家，而后者为的是巩固斯大林的个人独裁。

一党制是在列宁的参与下建立的，革命后立即实行，并且一直延续到“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对言论和出版自由的限制也是如此。到新经济政策开始执行的时候，对于出版自由的某些限制才有所松动，当时可以看到非党办的刊物，以及私人出版社等。列宁亲自采取措施保护了中央委员会一些委员要求取缔的“路标转换派”^①的杂志《新俄国》。但是与此同时，列宁又在1922年下命令封闭了《经济学家》杂志，并将其主要撰稿人驱逐出境。《往事的回音》杂志的编辑谢尔盖·米尔古诺夫以及几位撰稿人，在1922年杂志被封后也遭到了同样命运。彼得格勒的《思想》杂志，也于同年被封，其撰稿人被放逐国外(在这批人当

① “路标转换派”运动的组成成员是苏维埃政府原来的反对派，他们在1920年开始寻求同布尔什维克和解，并欢迎新经济政策，把它当作俄国进入“正常”时期的标志。——英译注

中有杰出的俄国哲学家N·A·比尔加耶夫^① N·O·洛斯基^②、L·E·舍斯托夫^③和S·L·福兰克^④。

列宁死后，斯大林和在他左右的人继续推行对出版加以压制的政策。《新俄国》杂志终于在1926年被封闭；《往事》（创办于1900年）杂志于1927年被封闭。在1925年到1929年间，下列刊物都消失了：《俄罗斯同代人》、《同代人》、《新时代》、《自由生活》、《实话报》、《文学简讯》、《圈子》、《勺子》、《艺术生活》以及其他一些较为不知名的出版物也都消失了。到1929年，已经没有剩下一家可以用作反对意见传播工具的非党出版物或私人出版社了。人们还可以找到证据，将“特别书库”^⑤的出现归罪于列宁1920年1月签署的一项法令。该法令责成存有白卫党文献的政府各部，将这些文件交给教育人民委员部，供政府图书馆在限定的范围内使用^⑥。

人们还可以继续开列清单，列举一些在某种意义上属于列宁时期反民主倾向的、而体现在斯大林主义中的措施。尽管在这里仍然存在不同历史条件的问题，但是我们有理由认为列宁决不会走得象斯大林那样远。

以上不难证明，斯大林是如何巧妙地达到个人目的而运

① N·A·比尔加耶夫（1874—1948），俄国宗教哲学家，有过许多著作，如《历史的意义》、《在现代世界中人的命运》、《俄罗斯思想》等。——中译注

② N·O·洛斯基（1870—1965），俄国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直觉论、人格主义的代表人物。——中译注

③ L·E·舍斯托夫（1866—1938），俄国哲学家，非理性主义的代表人物。——中译注

④ S·L·福兰克（1877—1950），俄国的哲学家，原主张合法的马克思主义，以后赞同唯心主义，最后成为宗派哲学家。——中译注

⑤ “特别书库”存放被查禁的文学作品，几乎所有苏联大型图书馆中均有。进入这类书库有严格的限制。——英译注

⑥ 《列宁和文化革命》莫斯科1972年出版，第187页。——原注

用了布尔什维克党的两个不同特点：集权与纪律。当然，集权（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民主”）、严明的纪律、有效的组织形式，是革命前和内战时期列宁主义党的决定性因素。集权和党的纪律不仅是保证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武器，而且也是克服1918—1919年间的极度不稳定状况，以及1920—1921年间经济和政治危机的关键性武器。虽然到今天，过分集权带来的不良后果已经非常明显，但这并不等于说在起初就应避免集权。列宁坚定地认为，集权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必不可少的，但他从未主张党的组织形式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适用。组织形式应该随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对于这一点，没有人比列宁更清楚。在战争时期，一般公民有必要应征参加军事服务工作，并置身于军事纪律之下。俟战争结束，这些人回到正常的国内生活中后，就要服从另外的法律和秩序了。斯大林不仅没有对党的组织形式中的集权体制进行改革，反而将其扩大到了最绝对化的程度。这样做对于他的个人野心和他的一套班子可能是有利的，但是这绝对不符合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也绝对不能鼓励一个真正正义的社会的创造性。斯大林的所作所为就象一个罗马将军，不仅不按照罗马的法规在战争结束时遣散军团，反而带兵返回意大利，篡夺了罗马共和国的政权。

但在更多的方面，斯大林主义对列宁主义毫无继承可言了，而成为使用相同“马克思主义”词句的截然不同的两种政治现象。斯大林的政策根本没有反映列宁主义的目的。废止新经济政策，过急推行强制的集体化，对农村中的富裕农民和城市中的“资产阶级专家”实行大规模恐怖政策，用强硬的行政命令方法而不是通过经济手段实现工业化，禁止党内外一切反对意见，在完全改变了的历史环境下恢复“战时共产主义”的

政策，——斯大林这些所做所为都违背了列宁的明确指示，特别是列宁在1921年到1922年间的最后一些著作中的指示。早在1924年，列宁所明确阐述的建党方针，就被“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活动而违背了。大家知道，列宁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曾反复告诫中央委员会，要防止机械地增加党组织中的工人阶级成分。他担心那些“没有在工厂这口锅里吃过几年饭”^①的工人中的小资产阶级成分会淹没党。在十一次党代会筹备期间，列宁指出：领导的一项重要任务是严格把关，以防止人们轻易地混入党内，这可以通过延长预备期的办法来实现。但是，在列宁逝世后不久，便开始了“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的活动，并且在几个星期的时间内，就将两万五千名工人直接从工厂车间里接纳到党的队伍中来，甚至出现过整个车间整个部门中全部工人集体入党的现象。在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运动期间，工人党员没有预备期。1923年4月，第一次清党结束之后，党内共有三十八万六千名党员。仅仅过了一年，到1924年3月，十三次党代会的代表们就代表了七十三万六千名党员。

这里用不着再提三十年代下半叶党和国家的基层干部遭受到的大规模恐怖。从所有的反对派组织的成员和领导开始，有一百万名以上的党员在这次恐怖活动中丧生。这些党员都经受过内战、过渡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考验。用不着再提斯大林那种把全党置于权力和权威大得超出限度的、秘密警察的控制之下的作法；也用不着再提斯大林如何复活了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如何将许多苏联人民驱逐出家园的作法；用不着再提他的反犹政策，这项政策导致了犹太文化最杰出的代表在实质

① 这句话未见于已出版的《列宁全集》，但列宁的这一思想，请参考《列宁全集》第28卷，第42页；第29卷第393页；第30卷第45—47页，及第1e0—162页，第33卷第20—22页及第114页。——中译注

上的解体，以至于出现了把所有的犹太人流放到苏联边远地区的计划。不说自明，所有这些罪恶的政治行动，既没有任何与马克思主义共同的东西，也没有任何与列宁主义的共同之处。

很清楚，我在这里并不想把列宁描写成一个永远在政治上不犯错误，在政治斗争中从不使用残忍、利己手段的圣人。内战时期的大批信件和指示表明，在完全不必要的范围内使用的恐怖手段，是经过列宁批准的。在1918年的一份电报中，列宁命令诺夫格罗德地方当局“清除并处决那些引诱战士和军官酗酒的数百名妓女”。甚至内战结束之后，列宁仍提议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刑事犯罪法中，使恐怖手段合法化，他还支持把政治犯和反革命的界限定宽一些。

1918年春季，列宁曾写道：“如果德国革命仍然迟不‘诞生’，那么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学习德国人的国家资本主义，用全力采用这种资本主义，为了比彼得大帝更迅速地促使野蛮的俄国人迅速采用西欧成果，决不借用独裁方式，在反对野蛮势力时，决不拒绝使用野蛮斗争的手段。”^①在今天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经难以令人相信还有人能接受这样的观点，即认为反对野蛮主义可以使用野蛮手段。在1918年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也难以想象这种方法能够适用。列宁认为所有道德观念都是相对的主张，我们也难以接受，他曾说过：“……共产主义道德是为了把劳动者团结起来反对一切剥削和小私有制服务的道德，因为小私有制把全社会的劳动成果都交给了一部分人。可是，我国的土地已经是公共财产了。如果我从这个公共财产中拿一块土地来，种上相当于我需要的两倍的粮食，然后用这些余粮来作投机勾当，……难道我这是共产主义的行为吗？绝对不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7卷，第315页。——中译注

是，这是剥削者的行为。应该同这种行为作斗争。”^①这样一来，列宁就宣判一大批穷苦农民有罪，因为他们从事了不道德的劳动，更不要说那些仅仅因为占有一些多余的谷物，想拿到城里出售就被打上剥削者烙印的中农了。列宁后来很快改变了这种对待农民劳动和小私有者的态度，并且在新经济政策开始实行后不到一年时间里，提出完全修改布尔什维克对于这个问题的提法。

我们知道，在同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人的争论中，列宁往往过于激烈，甚至粗暴。而这些人中绝大多数毕竟还有真诚的信念，不应该被指责为有意识地出卖工人阶级的事业。列宁后来自己也承认，有些时候孟什维克是正确的。但是当别人责备他辩论方式极端粗鲁时，列宁却在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作了如下的回答：

“在统一的党的党员之间不能容许的事，在已经分裂的党的各个部分之间是可以容许的而且是必需的，对于党内的同志不能用这样的话来说，不能在工人群众中间不断散布对思想不一致的人的仇恨、憎恶和蔑视。而对于分裂出去的组织，就可以而且应当用这样的话来说。

为什么应当呢？因为既然发生了分裂，就必须把群众从脱离出去的组织领导下争取过来。人们对我说：你制造无产阶级队伍的混乱。我回答说：我是有意识地有目的地在跟着选举前夜分裂出去的孟什维克走的彼得堡无产阶级队伍中间制造混乱的，而且只要有分裂，我就永远会这样做。

我在圣彼得堡选举前夜对孟什维克进行了激烈的带污辱性的攻击，这确实使无产阶级中间相信他们并追随他们的队伍发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260页。——中译注

生了震动。这是我的目的。这是我作为领导左派联盟运动的圣彼得堡社会民主党组织的一员应尽的责任。……我当时向这样的政治敌人作了歼灭性的斗争。而且只要再发生分裂或者分裂再发展下去，我就会永远进行这种斗争。”^①

在今天的共产主义运动中，不大会有人再把类似这样的感情带到共产主义者同社会民主主义者之间的论战中去了（这里仅举一例）。并且可以肯定，列宁自己也不是一贯坚持这种原则，例如他曾在左派普罗什扬^②去世的时候写下了诚挚的讣闻。他在1918年写给普列汉诺夫的信中也表明了这一点。

毫无疑问，列宁曾狂热地投身于权力的争夺之中，但是这权力是无产阶级的权力，共产党的权力，工人的权力，而绝不牵涉个人权力的问题。列宁总是自愿地将个人利益和抱负置于党的利益之下，置于工人的和革命的利益之下。

另一方面，斯大林也狂热地投身于个人权力的争夺之中，但同时随时准备在这争夺过程中牺牲其他方面的利益，包括党的利益。无产阶级的利益和农民的利益。因此，斯大林时期不仅滥用权力的范围扩大了，而且在性质上也与列宁时期根本不同。这里也没有继承可言。

实质上，列宁和斯大林不论在为人上或是在政治上都毫无共同之处。斯大林为人凶残、不讲道德，他不论把政敌还是把党员，总之把一切人都看得一无是处。因为权欲熏心，他成了一个带有自卑的病态虚荣心的人，有进行恶意报复行为的嗜好。斯大林不仅在政治上有罪，而且在“有罪”这个词的本意上说也是如此。在政治斗争中，他不讲任何规则，在个人权力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413—414页。——中译注

② 普罗什扬（1883—1918），1900年参加革命运动，十月革命起义，曾于1917年革命后任邮电人民委员。——中译注

的争夺中就更是如此。可惜，正是由于他没有良心，才使他得以大大超过对手，因而他才取得了胜利。

而列宁就是完全不同的人了。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摘录出大量的，列宁的同志、朋友和那些公正地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所作的赞扬之词。但是在这里，我却宁愿援引对列宁和列宁主义持批评态度的人的观点。例如，美国的列宁传记作家路易斯·费舍尔这样写道：“列宁是一个独裁者，不过不是后来斯大林所成为的那类独裁者。对于他所认定的政治上的敌人，即那些对于共产党专制及其法令提出争辩的人，他尽最大限度猛烈攻击而绝少怜悯。而在布尔什维克权力机关内部，他对他的党内对手则采用疲劳轰炸，最后在辩论中取胜的办法，最坏不过给他们降级、撤职，有时也开除出党，偶尔也有将对手驱逐出境的时候，但从没有发生把他们送给刽子手，去坐地牢的事。他依靠意志的力量，依靠坚韧不拔、持之以恒的决心，依靠超人的学识，精明的才干，依靠有生气的辩论、实践观点和他的说服力实现了独裁。权力固然是一种有力的武器，而掌握在列宁这样精明的政治家手中，加之以他的威望和成功（他挽救了苏维埃革命），就足以压倒他在党内的对手了。他的敏锐的智慧给他的对手以至深的印象，他不屈不挠的决心使他的对手丧失信心。他们明白列宁是不可战胜的，他一旦做出决定就决不退让，而他又从未犹豫不决。他是强大的，他在政治上的甲冑没有因个人缺陷而产生裂缝。而这副甲冑由于他能够自我克制而加固了，没有人能指责列宁谋取私利。其他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托洛茨基、李可夫、捷尔任斯基、斯大林、加米涅夫、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之中，没有人具备列宁那样的自信心（哪怕是其中的一部分）——这是热衷于事业的结果。而在热衷事业的同时，他又能保持清醒。他坦白地承认

错误，因为他的地位很巩固。他欢迎批评，而这样一来，也就解除了他人的武装。”①

鲍里斯·苏瓦林早已同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分道扬镳了，他曾和列宁有过私人交往。七十年代初他曾写过如下的一段话：“在列宁的文章和演说中贯穿着一个值得称道的‘主导动机’，人们不免为之叹服：‘我犯了错误……’；‘我们错了……’；‘我在俄国工人面前是有罪的……’；‘这又是我的一大过失……’；‘我们在俄国犯过成千上万的错误……’；‘我们作了很多蠢事，并且现在还在继续作……’。

“……列宁关于‘职业革命家’的观点大概助长了后来的寡头政治的形成，但这还不允许我们把列宁与斯大林视为等同，前者无疑对许多问题负有责任，但这与后者的罪行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虽然可以肯定说，两个人中如果缺少其中一个，另一个人也就不会存在了，但是对两个人不能采用一种标准去看，特别是因为列宁没有丝毫的卑鄙动机和个人野心……除此之外，还应说明，列宁为人谦虚朴实，他是一个好儿子，又是一个好兄弟、好丈夫，是一个不知疲倦的、自觉的劳动者，他不喜欢抛头露面，受人欢呼。他不自私（这是在这个词的本意上说的）、廉洁、并且被自己的信念所激励以致狂热，他坚信应用于他的那半亚洲式国家的、或多或少是条条框框的马克思主义……他有复杂的个性，是一个普通的人，而与此同时又是最不平凡的人，在列宁主义狂潮的顶峰，他是肯定不会被认识或理解的，就是由于这个狂潮，莫斯科使全世界都黯然失色。”②

① 路易斯·费舍尔：《列宁生平》（纽约，哈泊和罗出版社，1964年），第524页。
——原注

② 见V·伏尔斯基为《人们熟悉的列宁》一书写的序言（巴黎五大洲图书馆，1972年版），第7页，第10—11页。——原注

他们对列宁的刻画有许多不准确的地方，在此我不仔细论述了。重要的在于，费舍尔和苏瓦林两人都在列宁与斯大林之间划了一条足够清楚的界限，不论是在政治观点上还是在为人上。

列宁主义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具体的条件下的应用。列宁根据二十世纪前五十年中，国际上出现的许多新情况，在很多方面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但是同时，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比起它的创始人来说，在某些方面要更狭窄，更片面。此外我们还应说记住经典马克思主义也肯定不是没有错误的。但所有这些都同斯大林主义没有关系。我曾接到一封一位老布尔什维克写来的信，其中有如下一段话：“在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保守倾向和势力开始出现。它们对社会主义革命进程的继续发展所起的作用犹如制动器，在很多情况下甚至起了反革命的影响。这种势力给人感受至深的一次展示就是斯大林主义。斯大林主义不仅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了官僚主义的总歪曲，而且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的歪曲。从这个完整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组织来看，这是一个假社会主义。”而这也就是我自己的观点。

我们既然不仅了解斯大林主义与列宁主义在实质上的区别，而且也了解了二者在理论上的相互背离，那么就要提出如何在二者之间划一条历史界限的问题。列宁主义在政治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时期是什么时候结束的？斯大林主义是什么时候开始占上风的？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报告中把分界线划在1934年，即在十七次党代会召开和基洛夫被暗杀的那年，尽管赫鲁晓夫从来没有实际使用“斯大林主义”这个词。德国《明镜》周刊的出版人鲁道夫·奥格斯坦在1974年的一篇文章中也持有同样的观

点，他说：“直到1934年，斯大林是在列宁主义逻辑上的连续性内掌管国家的，如果可以说是‘掌管’的话……我们无法知道列宁会如何做……很难说他能不能更好地对付如此艰巨的任务（集体化和工业化）。这不是列宁愿意不愿意的问题。任何人在一个以农民为主的国家里创立集体化的社会，他便无法中途把这样巨大的工作停下来。在革命后的头十年中间，他注定要不断加强恐怖措施，这就导致了国家没有个人能动性和党员不动脑筋的盲目服从。有些人认为比较仁慈一些的列宁会停止强迫集体化，他会以一种新的新经济政策来作为替代办法。但实际上这极不可能，因为这就好象一个人说了‘A’，就一定要说‘B’一样。①如果不那样做，列宁还能不能继续作为党的领导人便成了问题。这正是所谓的骑虎难下。”②

赫鲁晓夫的观点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考虑到他与他周围的很多人一样，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亦即集体化之后和工业化的初期爬到，或者干脆说是由斯大林提拔到党的领导岗位上来的。早在1928年，赫鲁晓夫就担负了乌克兰党的重要工作。1934年他成了中央委员，一年之内就当上了莫斯科区党委第一书记。因此，他属于斯大林在策划打倒党的“老干部”时所依靠的新一代人。

我们也可以理解鲁道夫·奥格斯坦的观点。因为他在简要列举了伴随集体化与工业化而来的残暴行为和灾难以后，又以绝对肯定的语气继续写道：“那些对于他的方法感到厌恶的人应该记住，是他使俄国经历了‘第二次革命’，其影响较之1917年的十月革命更为深远。他应该怎样去消除如此巨大的差距呢？

① 这是一个德国的成语，意思是事情既然开始，就要按它的规律做下去。
——中译注

② 见1974年2月11日出版的《明镜》第7期第90页。——原注

不降低欧洲水准，他又怎么才能提高亚洲水准呢……按照人们的‘阶级’属性去毁灭人与按照‘人种’属性去消灭人是一样的荒唐。但是情况对于斯大林来说，还不同于希特勒。斯大林缺乏克制，还不是出于他那亚洲的、暴君式的无知。试问有谁清楚地知道如何去创造一个新社会并使之团结起来呢？如果我们不愿付出高昂的代价（事实上是过高的代价），那么最好干脆留在原地不要开始行动。”^①

但是赫鲁晓夫与奥格斯坦将斯大林主义的胜利定在1934年是错误的。托洛茨基也同样不对，照他的观点，斯大林主义的胜利是1923年至1924年间的事，然而那时正是他自己在党内争论中被击败，丢掉了高级领导职务的时候。

美国历史学家斯蒂芬·科恩比较客观一些。他令人信服地指出了列宁主义、布尔什维主义与斯大林主义之间的区别，并主张把以布尔什维主义和列宁主义为一方，斯大林主义为另一方的主要分界线定在1929年。按照科恩的观点，通常那种继承的说法是没有客观依据的。他同意布尔什维主义已经包含了斯大林主义的“种子”、“根基”或者“胚胎”，但这既不说明继承性，也不说明二者有偶然的联系。布尔什维主义也包含斯大林主义的其他的“种子”、“根基”，它们也可以同样理所当然地在俄国的历史和文化的传统中，在内战中，在国际形势中以及其他事物中找到。继承论的支持者确信斯大林主义仅仅是列宁主义（在科恩的观点中，“布尔什维主义”与“列宁主义”是区分开来的两个不同的概念）的极权和权力主义的继续。这些历史学家没有看到，1929年以前和以后存在于苏维埃俄国的两个依靠权威统治的政权之间有着根本的不同。1929年以前，确有权力

^① 见1974年2月11日出版的《时镜》第7期第93页。——原注

主义的迹象，但只是从那一年开始，权力主义统治才显露到最极端的程度。强制性措施恶化成为一场反对农民的真正内战，在其二十五年的进程中，成千上万的农民遭到了血腥的屠杀，同时伴随而来的是民族主义的复活和对独裁者的偶像化。科恩指出，赫鲁晓夫掌权的时期常常在西方被称为“没有恐怖和过激行为的斯大林主义时代”。然而过激本身正好就构成了斯大林主义的实质，这也正是必须要解释之处。^①

我对这个问题的某几个方面虽然可能提出略有不同的看法，但基本上我和科恩持相同的观点。苏联社会在十月革命之后经历了不是一次，而是几次的根本变动。例如，1918年初形成的政治经济体系就同1918年末发展起来的体系有很大不同，后者也就是后来所谓的“战时共产主义”。1921年到1922年间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又带来了另一次转变，这是一个与“战时共产主义”大不相同的制度。所有这些变化都是列宁在世时发生的，也就是说是在列宁主义的范围之内完成的。

当然，由斯大林扩大起来的权力主义统治，有很多方面在列宁的时期就显露出来了，在某些方面这种现象的出现，可以说是列宁起了直接作用。一党制限制了普遍民主，后来限制党内民主生活和民主讨论也都是—党政治的明显例证。但这些绝非列宁主义所本来具有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列宁将苏维埃制度视为百家共存的制度，允许与工人有联系的所有政党（包括社会革命党右派和左派、孟什维克、劳动派^②和无政府主义

① 斯蒂芬·科恩：《斯大林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见《斯大林主义及其历史意义的论文集》，由罗伯特·图克尔编辑（纽约，诺尔顿出版社，1977年版），第11—13页。——原注

② 苏联大百科全书中指出：“劳动派”是一个于1906年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组成的政治小组，曾代表农民和知识分子参加第一届国家杜马，提出土地改革纲领。——中译注

者) 在苏维埃制度下自由竞争。甚至列宁把取缔一些党派, 而且不允许他们参加苏维埃政权也认为是某种暂时措施。列宁相信布尔什维克党会在竞争中压倒其他所有的党, 在大多数人实现了自己的要求以后, 肯定就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在十月革命以前及刚刚完成的时候, 他相信布尔什维克甚至可以在过渡时期的第一阶段用最小限度的暴力就能实现自己的统治。

这里我们不是要去探讨内战的起因或者是布尔什维克在内战之前犯下的错误, 但我们想指出列宁在晚期著作中很说明问题的那些思想。列宁在这些著作中把大多数作为内战产物的东西, 而且以前已成为我们政治生活中的一部分现象视之为暂时的事物, 例如, 这个制度的永久而独特的因素。斯大林要对野蛮的大规模恐怖、神化领袖、建立绝对个人独裁、甚至控制了党的无孔不入的警察机构负责, 因为这个政权的所有典型特征今天都应该与“斯大林主义”这个概念联系在一起。可以肯定地说: 十月革命的很多成就, 并没有完全被斯大林主义所摧毁, 假社会主义还没有能够把所有的社会主义因素从我们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彻底根除。

这里不必再作关于我们历史上不同时期社会主义与假社会主义之间关系的详细的、理论性的探讨, 我们就可以说: 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在实质上分道扬镳是在1929——1930年, 这是以斯大林声名狼藉的“自上而下”的革命开始的。一般把斯大林主义的倒台与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联系在一起, 而这又是一次自上而下的革命的典型。在斯大林时代成为我们生活中一部分的很多方式、规则和习惯今天仍然存在, 但是尽管如此, 如果简单地套用“没有斯大林的斯大林主义”的公式, 就无法了解当今的苏联社会。值得庆幸的是: 苏联社会已不是死

水一潭，并且我也绝不赞同那种认为这个制度已经是死亡将至的悲观论点。不过，我们的社会发展得太慢了，加之还不时地出现一两步倒退。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加速我们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向着民主与社会主义的紧密结合这个目标发展。